



深圳社会科学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I N S H E N Z H E N

编辑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珺 乐 正 冯达文 任剑涛 李凤亮
李若建 肖 滨 吴重庆 陈金海 周叶中
单世联 袁 征 唐 杰 陶一桃 黄卫平
彭立勋

主 任 吴定海

副 主 任 陈少兵 王为理 罗 思 杨 建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映灵 李朝晖 何国勇 陈长治 莫大喜
董晓远 谢志岚

主 编 吴定海

编辑部主任 方映灵

1

2019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主办

目 录

2019年第1期（总第03期）

2018年9月创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5 文风与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构建 张胜利 丁晓强
- 12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及重大意义
..... 夏庆宇 张 莉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 19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胡 晓 李雅婷 王 霁
- 27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量化分析研究
..... 曹锦阳

哲 学

- 37 “话语的论定”与“存在的回归”
——论儒道佛三家之会通及其对现代化之后的可能反思
..... 林安梧
- 51 所以与必然：朱子天理观的再思考..... 杨立华

经济学

- 59 为什么中国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
——基于亨利·乔治定理的一个理论分析 王智波
- 70 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施 洁

经 济 szshkx_jingji@szass.com
哲 学 szshkx_zhexue@szass.com
政 治 学 szshkx_zhengzhixue@szass.com
历 史 szshkx_lishi@szass.com
文 学 szshkx_wenxue@szass.com
法 学 szshkx_faxue@szass.com
社 会 学 szshkx_shehuixue@szass.com
深圳研究 szshkx_shenzhen@szass.com
综合学科 szshkx_zonghe@szass.com
办 公 室 szshkx@szass.com

深圳社会科学 (双月刊)

历史学

- 79 19世纪美国教育传教士粤港澳活动述略…………… 何思兵
91 百年来“武训”形象之变迁与建构…………… 郭 洋

深圳研究

- 97 深圳模式：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40年深圳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理论阐释
…………… 谢志岗 李 卓
111 城市文化治理的深圳经验：以“图书馆之城”建设为例
…………… 李丹舟

社会学

- 121 社会膜：社会风险预防中的膜技术研究… 阎耀军 田 慧
131 新时代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建… 陈姝宏

法 学

- 138 论行政法律关系的秉性与特质 …………… 李福林
145 国际视野下海关预裁定制度新探 …………… 曾 焱

学术书评

- 154 状写深圳市人口变迁图景的力作
——读王世巍《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 …………… 石兴泽

-
- 157 英文摘要
-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No. 1, 2019

CONTENTS

STUDY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Style of Wri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Zhang Shengli & Ding Xiaoqiang* (5)

Impl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Pertaining to th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Xia Qingyu & Zhang Li* (12)

RESEARCH 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 BAY AREA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Cultural Industry..... *Hu Xiao, Li Yating & Wang Ji* (19)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ay area *Cao Jinyang* (27)

PHILOSOPHY

"Argument of Discourse" and "Regression of Being"—On the difference and combin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nd its possible reflection after modernization..... *Lin Anwu* (37)

Determination and Absolute: A Reflection on Zhuxi's Understanding of Principle *Yang Lihua* (51)

ECONOMICS

Why Does China Enjoy Such Good Urban Infrastructur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Wang Zhibo* (59)

The Evaluation of Shenzhen'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i Jie* (70)

HISTORY

Spreading the Gospel Through Mission Schools: American Missionaries' Educational Endeavo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ton, Hong Kong and Macao *He Sibing* (79)

The Chang and Construction of Wu Xun's Image for A Hundred Years *Guo Yang* (91)

SHENZHEN STUDY

Shenzhen Model: World Trend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henzhen's Modernization from 1978 *Xie Zhikui & Li Zhuo* (97)

The Experiences of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Library" in Shenzhen *Li Danzhou* (111)

SOCIOLOGY

Research on Membrane Technology in Prevention of Social Risk *Yan Yaojun & Tian Hui* (121)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on Community Correcting Objects in New Era *Chen Shuhong* (131)

LAW

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 *Li Fulin* (138)

A New Probe into the Customization of Customs Advance Rul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Zeng Yan* (145)

Academic Review

A Review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Shenzhen, 1979-2010*..... *Shi Xingze* (154)

文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构建^{*}

张胜利 丁晓强

[摘要] 政治话语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价值观,本质上反映了该国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重要场合指示“要加强话语建设”,而政治话语是话语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话语体系内,政治话语存在着与学术话语的疏离、八股化和传播形式单一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文风。好的文风要具有人民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并与党风联系在一起。可以通过切实改进文风来进行话语融通,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

[关键词] 文风 党风 政治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05-07

一直以来,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着主导性话语权,处于优势地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话语弱势。要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中国形象,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文明和价值观,就必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政治话语是整个话语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是一项极为重要和紧迫的战略课题,而政治话语构建与文风有着关键性的联系。

一、何为“政治话语”?

索绪尔在语言学上的一大贡献是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但话语(discourse)既不是语言也不是言语,而是在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复杂社会形态下,人与人之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创新研究”(项目号:14ZDA012);上海社科基金项目“建立在融通视角下的话语体系创新研究”(项目号:2017BKS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倪光辉:《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社会交往和交流沟通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体言语方式^①。话语总是与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可以建构身份、确立社会关系和产生观念等。由于人从来都是逻各斯和政治性动物,可以说,所有话语都具有政治性。福柯还将话语与权力关联在一起:“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得到建立、巩固和实现。如果没有某个特定真理话语体系借助并基于这样的联系来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生产的话语,除非通过真理的生产,否则我们无法行使权力。”^②但如果不加辨析地将话语直接等同于政治话语,就显得很泛化,失去了甄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话语虽然与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等密切相关,但却有着自身的鲜明具体特征,属于话语中的某一类。因此,范迪克建议将政治话语限定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话语,是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进程中具有某种直接功能,具体可包括议会辩论、议案、法律、政府或其各部颁布的政策法规、其他机构的文件、政治广告、政治演讲、媒体对政治领导人的采访、政府新闻发布会、政治脱口秀节目、党纲、政治选举等^③。可以看出,政治话语与政治语境、政治思想及政治参与者相关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功能,具有宣传政治理念、表达政治诉求、形成政治导向、建构民众认知重要作用。实际上,政治话语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价值观,本质上反映了该国的执政理念。

当下中国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和发起的,反映了当前时代背景下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体成员参与交流与互动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语体系。它涵盖在各种政治活动中的政治性表达与交流的话语,包括政府报告、政治会议、政治演讲、政治媒体宣传、政府各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或文件等。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分别创立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邓小平开启的“建设”两套政治话语体系。“革命”政治话语体现的是“政治挂帅”,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政治活动都是以“革命”为核心关键词;而“建设”政治话语体现的是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施改革开放。从“革命”到“建设”,政治话语体系的演化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现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重心的转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各个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深入和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各种思潮涌动,呈现出话语方式多样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象。虽然国家政治话语仍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但政治话语在新形势下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二、当下中国政治话语存在的问题

政治话语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它的几种主要常见形式包括政府部门文件、领导讲话及相关文章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政治话语的方式和形态也随着历史和社会进程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尤其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治话语不断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政治话语在当下宣传媒体和传播中的一些表达,有时存在着党八股的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37页。

② M.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93.

③ 转引自尤泽顺、陈建平:《政治话语的批判性分析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色彩,也不太适应当前时代的新特点新形势。我国的政治话语还需得到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以能更好地契合时代和国情。当下中国政治话语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 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疏离

虽然概念、术语和范畴等构成了政治话语体系,但具体某一时期的政治话语需要由一定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来奠基和支撑。当下中国政治话语的表达常常不深刻,主要表现在很多政治政策类文章里的话语或领导讲话经常是口号震山响、概念满天飞,全是干巴巴的、抽象的表达,概念与概念之间也没有很好的链结,体现不出理论的内涵。这样不仅不能准确地表达党和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政策精神,更没有对人民大众形成感召力。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疏离和不融通。学术话语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所形成和使用的一套学术概念系统,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思想载体,传递了价值观并影响人的塑造。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代替了人力,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与此时代相应的西方学术成果占据了文明的中心,正是一个个西方思想家们与其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造就了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性位置。像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正是来自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论和思想成果。而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容易陷入体制性政治话语的自我封闭,没有充分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很好地运用我国的学术话语做学理支撑和理论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指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①。中国自己独特的民族体验和实践经验必须由植根于本土的中国学术话语来构建和言说,这种言说与经验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只有扎根于中国的国情,才能孕育出有中华民族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从而形成有生命力的政治话语,这在本质上关涉民族性、人民性。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不融通状态和对学术话语的忽视,也会消解掉学术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批判和匡正的功能,最终使得政治话语浮于表面,失之于空洞与抽象。

(二) 政治话语的八股化

当下中国政治话语生态还存在着八股化的现象,自说自话,空话、套话连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鲜明地指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②这不仅指出了政治话语存在的三大问题,也将政治话语表达与文风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些领导平时既不认真学习和领会国家政策和精神,也不会深入到基层去了解民情,到开会时根本无实际和深刻的东西可讲。更有甚者,自己不仅写不了讲稿,有时还将别人代写的稿子念错字、读错音,在群众中形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政治话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一些理论文章属于典型的八股文,内容空洞乏味,语言苍白无力,没有理论高度,也不切中现实,夸夸其谈,千篇一律,还经常东拼西凑写得很长,使得老百姓看不懂、不想看,学术界也是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让政治话语无法引领别的话语,甚至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前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曾将政治话语的八股化现象称为“世纪顽疾”,认为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语言从来就不仅仅映射现实,它还塑造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学习时报》,2010年5月15日,第1版。

现实,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①政治人物及其文章的话语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大众不仅从政治话语中获得信息内容,还会感受政治人物的态度和品格。所以,政治话语八股化现象体现的是党和政府一些领导和官员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反映了党的这些政治话语者对人民大众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冷漠无视的傲慢。这种“长、空、假”的八股官话是单向度的信息传递和某种程度上的强制灌输,无法形成深刻的政治说服和塑造,甚至会激起大众的厌倦和不信任情绪,危害很大。

(三) 政治话语的传播单一

当前政治话语在传播方面观念保守、形式单一,传播的主要阵地基本停留在电视、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上,而对随着互联网兴起的新媒体明显关注不够,难以跟得上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革命性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交流方式,它的广泛应用也是当前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16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了7.31亿,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由于网络的及时性、交互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再加上每个上网者都有着平等表达自己的权利,网络上的语言表达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和多样化。近年来,不少网络语言引发热点,并以其创造性和影响力进入了教科书和词典,但也涌现出了大批庸俗化和低俗化的网络话语。这些“三俗”网络话语通过网络的碎片化交流、书写和阅读,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而成为流行,不仅风行于网络,也在线下大行其道,冲击着大众文化视野和欣赏品味,改变着日常生活的用语和表达。就其危害性来说,这种话语的随意性使用,逐渐消解国家方针政策和政治话语严肃性和权威性。有一些人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在网上用谐音、简写式或新造词来任意解读或臧否国家政策、社会时事和政治话语,严重影响了大众对国家政策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正确领会和学习,给大众带来很大的曲解和误导。而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在网络中不仅不能缺席,还必须要保持强大的在场状态。很显然,这种强大的在场状态需要政治话语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从而在网络中生根发芽。当前,微博和微信等互联网媒体已成为大多数民众表达个体观点和诉求的主要渠道。从个体的自由表达,到讨论主题的最终确立,再到公众的广泛参与,进而在网络上集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公共论域。这已是一种话语讨论和传播的常态。显然,政府不能单靠强制性的审查制度和措施来管控和压制,而是要在规范网络的同时积极利用新媒体传播主流政治话语,让政治话语来引导、教化和融合大众。当然,新媒体传播手段容易解决,如何让政治话语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与效果,又涉及内容与表达等问题。

抽象空洞的官话、党八股文章以及固守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居高临下、脱离群众的思维和作风,这样的政治话语既不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也不能在国际舞台展现自身的“软实力”,还会污染和败坏整个社会中的其他话语。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构建顺应时代、贴近群众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但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以“文风”作为抓手,即通过大力整顿不良文风和积极倡导优良文风,使政治话语生机勃勃,更好地发挥出其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效果。

三、以改进文风来推动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构建

文风就是指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不仅反映了作者的语言运用能力、思想认识水平和作风问

^①李书磊:《再造语言》,《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题,也体现了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①改进文风之所以被如此重要提及,在于文风折射的是党风,是党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将文风建设作为重要的党建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名篇《反对党八股》便是整顿文风的纲领性文件,文中不仅列举了党的文风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等八大罪状,还明确指出了要建设“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②。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文风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好作品的“三新”标准:“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③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风问题,提出要提倡“短、实、新”文风。可见文风建设在党的历史上一脉相承却又不断丰富发展。那么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党的文风建设成果,做好文风的改进的工作?

首先,文风要有人民性。这包含着三层意思:1.文章是给人民群众看的。这就要求文章或讲话必须尊重读者和听众,熟悉群众的认知心理和形式,要有的放矢,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内容表达出来。对此,习近平同志曾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多一些‘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④领导干部要想摆脱党八股的影响,避免空洞和装腔作势的说教,就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主动与群众接触,多做调查研究,多接地气,倾听群众的心声,才能通过文章或演讲来引导群众和鼓舞群众。2.政治话语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精辟地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⑤众所周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无穷的智慧。领导干部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关心群众,虚心向群众请教,才能写出有思想有温度的作品,说出有感召力的话语,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服与尊重。3.人民性与民族性是同一的,政治话语要体现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语言总是具有民族性的,文风和政治话语的转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不是因为这些人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而是因为共同具有的社会实践和历史体验,并共同创造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和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为更基本力量的文化自信正是来源于这种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所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治理念只有立足于这种民族文化传统,才能孕育出有生命力的民族性话语,这样的民族性话语与人民大众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也蕴含着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导向力。

其次,文风要具有时代性。黑格尔曾说过,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⑥,语言的范式、话语的形式和字的表达都是在时代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处于一个后宗教、后哲学的时代,加上网络社会的崛起,一切稳定性、可靠性的东西都面临着被反讽和解构,各个新兴语言和表达层出不穷,过去几百年的社会和话语变化可能在当下这个时代只需要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说,文风的改进离不开这个时代的情境,好的文章与话语从来都不是因循守旧和自我封闭的,而是要走出来,与纷繁多样的新词汇、新话语和新思潮做充分的碰撞与交流,并在这种碰撞与交流中铸就自己。从整体上来看,时代就是个大熔炉,一切的话语都应放进这个大熔炉里去不断锤炼、校正和检验。一种话语和思想能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和认

①《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5页。

②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0页,第83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8页。

⑥[德]黑格尔:《序言》,《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页。

同，还是要看有没有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凡是扎根于时代，从时代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话语，自然也深刻地反映出了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宣传思想战线的“三贴近”指导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讲的就是要坚定不移立足于现阶段我国整体发展的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所处的时代，到群众中去，吸引群众一起创造反映真实生活的文化作品。实际上，也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勇于立在时代的潮头，才有可能发出思想的先声，形成有生命力的文风。

最后，文风与党风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曾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提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①可见文风与党风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党风的一部分，文风体现的是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和工作等方面的作风。如果领导干部在讲话和文章中充斥了大量的大话、假话和套话，这不仅影响了政治话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极大损害了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传播和贯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改进文风同改进党风统一起来”，并明确指出“不良文风的总根源，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②要改进文风，就要跟整顿党风联系在一起。领导干部必须要起到带头作用，不断加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学习，破除官本位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到群众第一线，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新方法和新观念；同时还要增强党性修养，以身作则，改进工作作风，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立威于民和取信于民，真正将党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③作风改进了，就会在文风中体现出来，而好的文风能很好地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交流 and 联系，又能进一步促进作风建设，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综上可知，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构建需要以文风的改进为抓手，立足于时代背景，改进工作作风，打破制度和长官意志至上的思维，最终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等不同场合发表了数百场讲话，语言平实、语调优美、形象生动、风格亲民，像“打铁还需自身硬”“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广为流传，这体现了极富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语言魅力，使得广大受众不仅听得懂，还爱听、易接受和受启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更是以鲜活的文风，在社会上激起极大的反响，长时间高居畅销书榜首。可见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不遗余力地树立新文风，转变受众心中枯燥古板的主流话语印象，并积极带头构建新时期下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

中国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理自信和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立足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当前的时代的，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创造。而在中国这片土壤和中国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网络话语都有着共同的根性，文风和党风的改进，会极大提高政治话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会使得政治话语能在更高层面上凝聚大家的价值共识，而政治话语传递着国家核心价值观，它代表了中国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国家利益，具有统摄性，能弥合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有助于形成统一的，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话语。而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7页。

②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学习时报》，2010年5月15日，第1版。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且,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也有利于讲好中国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在世界舞台上塑造出良好的中华民族形象。

作者简介:张胜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上海 201620;丁晓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杨 中】

简 讯

第十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研讨会召开

2018年12月4日,第十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研讨会在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厅举行,主题为“改革开放与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建设”。会议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主办,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承办。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小甘等领导出席。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院长、主席,《深圳社会科学》编辑委员会主任兼主编吴定海主持开幕式。来自京、沪、穗、深等全国各地高校、科研单位专家学者近150人参会。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国务院参事王京生,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赵细康,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花建,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陶一桃等专家学者做了学术交流主题报告。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为理对2018年深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总结。他表示,2018年,深圳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的具体部署,积极开展工作,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学术交流环节,国务院参事王京生做了“创新引领城市”的主旨演讲。他特别强调了文化观念对创新的重要性。他表示,一个城市要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就必须有观念创新的能力,并通过观念创新形成城市创新力的锻造和竞争力的提升。创新城市是全方位的创新,尤其需要观念的引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铁律。深圳大学陶一桃教授表示,把创新发展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是近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所得,是发展观的转变与发展理念的革命,是对经济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再认识,是我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理性与高度的展示,更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的时代体现。在她看来,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近40年稳步高速发展和始终引领中国创新实践所形成的持续的生命力与魅力,印证了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的科学判断。

会议还举行了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授牌仪式和深圳市“2018年度全国社科先进单位”颁奖仪式。(杨 中)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及重大意义

夏庆宇 张 莉

[摘 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繁荣昌盛,这种繁荣昌盛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标志性意义,将使中国人彻底摆脱因在近代史上遭受的屈辱而造成的心理阴影,将使中国人树立牢固的民族自信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就,是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的标志,标志着“三步走”的奋斗目标胜利完成了“第二步”,将为“第三步”的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将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它将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为我国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九大 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12-0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号召。在这一号召的鼓舞下,当前中国全社会正向着这一目标奋力拼搏。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将在历史上首次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尽管“小康”社会距离“大同”社会还很遥远,但“小康”目标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其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将尝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进行诠释,全社会充分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将促使我国在2020年之后更顺利地转向争取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伟大实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形成过程

（一）“小康”理念源自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然而与当今的用法不同的是，《诗》只是用“小康”来描述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未将其作为一种描述社会发展状态的概念。

《礼记·礼运》则区分了“大同”与“小康”两种社会状态，使这两个概念相映成趣。《礼记》对“大同”的描述，与共产党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相似；“小康”则是次于“大同”的一种社会状态。《礼记》认为，“小康”尽管不如“大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当然，《礼记》对“大同”和“小康”的理解，受到了当时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

在“小康”作为描述一种社会状态的概念被《礼记》提出之后，在悠久的历史中，时常有人将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例如明成祖朱棣提出“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①，可见朱棣将使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作为一种目标，但当时的小康的标准与当今社会的小康的标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清高宗弘历在自己70岁生日之际作《古稀说》一篇，提出“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②，可见弘历主要是从清帝国对外征服、扩大版图、人民生活安定等角度来认识小康，认为在其统治下已经实现了小康。中国当前所欲实现的小康主要关注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提高，其内涵远超过古人的认知水平。清末康有为提出“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③，但康有为仅仅是沿用了《礼记·礼运》提出的概念，其著作带有明显的空想性，无法变成现实。由上述例子可知，“小康”是中国的传统概念，自提出后被中华民族长期沿用了下来，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小康”主要代表了一种中等水平的社会理想。

（二）改革开放后“小康”目标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同志首先将“小康”作为我党我国的一种奋斗目标。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际，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而后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邓小平同志明确为实现“小康”设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一步，在80年代末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到5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采纳了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设想，正式将实现小康、“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也就是将“小康”视为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民将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须要指出的是，十三大报告是把“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一种经济建设的目标提出来的，此时并未把“小康”作为一种描述社会发展状态的总体性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小康”概念的外延作了扩展，将“小康”视为描述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提出要实现我国“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

①[明]陈治本等编：《皇明宝训·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1《勤政》，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560页。

②《清实录》第22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12，中华书局，1986年，第874页上栏。

③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90年，第28页。

（三）从“小康生活”到“小康社会”

到了1997年，中国共产党对“小康”有了新的认识，首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在21世纪初“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的设想。而在此前提的仅仅是“小康生活”“小康水平”。从此之后，“小康”不再仅仅是一个比“温饱”更高级的、描述人民生活水平的概念，也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目标，而是成了一种社会理想。

到20世纪末，邓小平同志设想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已基本实现，因此十五大报告提出到2010年要“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四）从“不全面”到“全面”，从“低水平”到“高水平”

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认为小康社会必须在全方位、各领域取得实质性发展，这样才是真正的“小康社会”，因此首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我国的小康社会做了明确定性，即“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在21世纪初，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当时的小康依然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党中央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项制度建设，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问题，建成真正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之后开始着手解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五）从“建设”到“建成”

“建设”小康社会是进行时，“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完成时。从“建设”到“建成”，这是我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我党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并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双比2010年翻一番，同时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都要有一个更有质量的发展，即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正式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从1979年至今，自我党我国初步提出“小康”目标和设想以来，这一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邓小平同志在最初提出“小康”时，仅仅是指让人民“吃饱穿暖”，他的原话是“就是可以吃饱穿暖，我把这个叫小康”^①。后来随着我国的建设成就越来越突出，我党对“小康”所寄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从仅用来描述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到用来描述一种社会状态；从单方面关注经济指标，发展到力求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发生升华。

^①《邓小平访日“小康”难倒翻译，竟译为身体健康》，《解放日报》，<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1215/c372327-26207966.html>。访问时间：2018年8月21日。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

（一）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

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体内涵包括：1. 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围绕这一目标，报告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目标，例如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人口的比例较大幅度提高等。2. 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3.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围绕这一目标，报告还提出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形成学习型社会等具体目标。4.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实现上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路径是重点做好八方面工作：1.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2.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3. 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4.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5.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6.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7.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8.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和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角度提出了衡量“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本文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衡量“全面小康社会”的各项主要指标进行了如下汇总：

1. 经济建设的目标：（1）增强发展协调性；（2）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3）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4）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5）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 政治建设的目标：（1）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2）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3. 文化建设的目标：（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2）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3）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4. 社会建设的目标：（1）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2）社会就业更加充分；（3）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4）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5）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6）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5. 生态建设的目标：（1）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2）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比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具体化,更加完备化,更加高标准化。十九大继续坚持了十六大提出的一些目标,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等;此外,由于十六大提出的一些目标例如“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完成,十九大已不再提及;十九大提出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等目标则是十六大报告未曾提出过的,属于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要求

(一)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从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为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奋斗,到2020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30年的时间。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为实现小康做出了巨大的持续不懈的努力,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社会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存在的某些短板。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在2020年之前应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以补齐短板,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此外,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还将着重实施七大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非常重视,例如英国《卫报》报道称:“十九大报告传递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中国未来前景的乐观判断,展示对中国在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自信。”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给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中说:“我们坚信,中共十九大确定的近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一定会实现。”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主席、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致习总书记的贺函中说:“中国共产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顺利实现。”^①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中国的此项战略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中等繁荣的)社会、削减极端贫困作为在‘十三五(2016—2020年)’末之前要实现的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三中全会的决议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十三五’规划将提出中国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措施。”^②因此可以说,中国能否在2020年之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世界都在关注。

由此可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举世瞩目,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我国每个社会成员紧密相关

第一,在2020年之前,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积极投身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事业。

第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将为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发展提供更高的平台。全面小康社会建

①《中共十九大: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主编:《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415~420页。

②Bert Hofman: Reforms to Build a Xiaokang Society in China,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opinion/2016/03/04/reforms-to-build-a-xiaokang-society-in-china>, 访问时间:2018年8月14日。

成后,我国将变得更加繁荣、富强、兴旺、发达、美丽、和谐,我国的各项事业将达到新的水平,我国的国际地位将显著提高。由此,中国人民将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每个人的事业将拥有更高的平台。

第三,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每个社会成员还应当继续奋斗,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并不意味着应当小富即安、小富即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面临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还应当向着更辉煌的目标奋斗,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景将无限绚烂夺目。因此,我国人民不应当随随便便感到满足,而应当以小康为基础,继续全力拼搏、共兴伟业。

(三) 每个公民都应当增强投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自觉性

由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与每个国人紧密相关,因此,我国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形成投身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事业中去的自觉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使每个社会成员认识到甚至感受到自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中的一分子而非旁观者,应该使每个社会成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感情、形成“自身与社会是血肉相连的”的意识。

因此,我国当前的宣传工作应当使每个社会成员增强自身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的意识,增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增强每个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感情。为实现上述目标,应当在宣传工作中重点宣传中华民族在近代初期遭受的百年屈辱,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重点宣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了洗刷民族屈辱、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奋斗的一部分,为了避免中华民族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不仅要我国建成小康社会,还要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重点宣传每一代中国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民族的一分子、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事业的一分子,国家的兴衰将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命运,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忘记自身肩负的使命,否则子孙后代有可能再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压;重点宣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使每个公民受益,与此同时,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每名社会成员的努力,坐享其成、冷眼旁观、无视漠视的做法和心态是错误的。总之,就是要使全社会全面接受和深刻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八大意义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从1840年以来中国初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昌盛。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为实现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为实现国家富强而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是中国人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进行的奋斗得到的第一个重大阶段性成果。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使中国人彻底摆脱因在近代史上遭受的屈辱而造成的心理阴影,将使中国人树立牢固的民族自信心。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就,是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的标志。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三步走”的奋斗目标胜利完成了“第二步”,为“第三步”的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提高了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第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巩固了党的领导,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第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打下坚实基础。第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成为2020年之前我国宣传工作的重点

当前,我国各级宣传部门在宣传工作中应重点宣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使全体人民增强参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事业的积极性,这项工作既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又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意义表现在:

第一,讲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是2020年前后的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党我国在2020年之前最突出、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战略任务。我国的多数社会成员都处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因此必须使他们增强承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使命的积极性,从而引导每个社会成员自觉投身到有关建设任务中去;当前我国的一部分社会成员(例如学生)尚不能参与小康社会的建设,但宣传工作应向这类群体充分讲清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从而使他们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奋斗历史的认同感、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增强对历代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崇敬感、增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奋斗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第二,讲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是进一步促使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重要途径。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努力奋斗,新时代的宣传工作的应当使我国全体社会成员了解党中央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的努力。如此一来,我国人民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要竭尽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才能领会党中央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才能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努力。由此,才能引导我国人民自觉团结、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才能调动和引导人民自觉投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中去,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形成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奔小康的生动局面。

第三,讲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是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宣传工作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使每个公民形成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认同感,只有让每个公民增强以上认同感,才能巩固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才能捍卫我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在宣传工作中,如果能够引导每个公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任务形成认同感,就能够增强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认同感,就能够巩固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就能够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就能使我国公民成为对社会现实保有积极认知的公民,进而有效巩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第四,讲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讲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能够有效增强民族自信,从而使不健康的民族自卑心理不见踪影,使在少数社会群体中仍然存在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和行为彻底消失。

作者简介:夏庆宇,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河南郑州 451191;张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 杨 中】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胡 晓 李雅婷 王 霖

[摘 要] 本文基于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其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群等概念的联系,指出广东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自贸区营商环境利用不充分、文化资源缺乏统筹等三个主要问题,提出了泛珠三角城市联动发展、自贸区应为联动发展提供文化动力、建构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实体平台等三条实现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文化产业 文化创新 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19-08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同年11月12日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港澳与内地文化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联系,“香港、澳门多元文化共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要保持香港、澳门国际性城市的特色,利用香港、澳门对外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介国家方针政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香港故事、澳门故事,发挥香港、澳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①。文化自信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社会教化的推动、自身修为的增长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基于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概念的历史机遇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群等概念的内在联系,指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的问题,建言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路径。从价值层面而言,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文化自信论”提供粤港澳大湾区的在地化思考,丰富“文化自信论”的内涵,探索其外延扩展的可能。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师科研能力促进计划”(项目号201850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第02版。

一、问题提出

文化产业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①一书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文化产业刚开始被译为“文化工业”，“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产业把旧的面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的特质。在其各个分支中，那些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特性的产品，或多或少地是按计划生产的”^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文化产业影响了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因看问题的视角差异而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不同时期对文化产业^③的称呼亦有所变化。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文化产业”通常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特殊性产业门类的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作为手段、以文化作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角度界定：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此定义具有一定局限性和指向性，仅仅包括由工业化生产并经过生产工序，具有系列性和固定性的产品，如书籍、报刊、电子出版物等及其相关服务，但不包括舞台演出、文体娱乐、艺术展现的生产与服务。

我国关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定义，国家统计局官网2018年5月9日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最新修订版（以下简称“新标准”）中，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⑤，参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的分类方法，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我国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为九个大类、43个中类以及146个小类。其中01-06大类为文化核心领域，包括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六大类；其中07-09大类为文化相关领域，包括文化辅助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三个大类。在本分类中，如国民经济某行业小类仅部分活动属于文化及相关产业，则在行业代码后加“*”做标识，并对属于文化生产活动的内容进行说明；如国民经济某行业小类全部纳入文化及相关产业，则小类类别名称与行业类别名称完全一致。从新标准调整的内容中，创意设计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这两项内容已经作为文化生产的核心领域被界定。这启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统合整体，“前店后厂”的传统文化产业精于创意、长于设计、勇于开

①《启蒙辩证法》初版于1947年，本文采取的译本为1990年重庆出版社译本，据美国河畔法兰克福菲舍尔袖珍本出版社1969年版（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译出。译者：洪佩郁，蔺月峰。责任编辑：杨希之。

②[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3页。

③Culture Industry 在重庆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中被译为“文化工业”，后来随着政治和经济背景的转换，才逐渐被译为“文化产业”，其语境与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时期的“文化工业”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比后者显然更具批判意味。

“文化工业”更能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学派的批判性价值取向。

④李春嫒：《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涵义与功能的廓清》，《湖湘论坛》，2009年第1期。

⑤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80509_1598314.html，2018年5月9日。

拓文化新业态的优势得到了政策肯定。珠三角地区积极推进的休闲农庄一日游模式,便着力打造吸引客户的某一服务点(如亲子农庄、团队拓展特色、休闲娱乐服务等),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要求,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共谋发展的历史机遇,既能够、也应当、且必然成为广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内容,将广东从“经济富庶之地”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形成具有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的“文化创新之地”,这有利于广东成为大湾区的发展生力军和主导力量,有利于广东引领和协同港澳发展。

近年,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2018年的世界图书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推荐了犹太裔哲学家马尔库塞代表作《单向度的人》,并分享其读书心得:“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②广东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示范窗口,文化产业发展成了顺应国家政策的重要抓手。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何实现广东文化产业健康协调发展,将广东从“经济强省”的既有印象中解放出来,以实现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就成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二、发展现状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意义非凡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带动广东及我国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强劲引擎。近年来,广东积极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省内三大自贸区片区为区域试行文化产业管理方法、税收政策、市场制度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创新发展条件。

(一) 产业资源丰富独特

广东文化植根于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历史环境,既有山脉历史也有海洋文明,融会贯通百越土著文化、闽南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引领,毗邻港澳的广东,吸收了舶来文化元素,逐渐形成大陆与海洋、中外交融的文化品格,为广东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丰富的创意资源。2018年10月发布的《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各类文化活动较活跃、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较好的片区。其中一个建设目标就是世界级文化产业中心。因此,广东依托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缘优势、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尚未开发完全的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中一支独具特色的生力军。

(二) 产业规模效益突出

广东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约占全国文化产业总量的七分之一,连续15年居全国各省市首位。2016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4256.63亿元^③,占全省GDP比重大幅上升到5.26%。广东正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01版。

②《习近平的书柜》,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zsgsb4Hkrg2t-94prldw>, 2018年4月23日。

③庞彩霞:《广东文化产业全国居首 增加值超4000亿元》,《经济日报》,2017年9月24日,第01版。

在从过去单纯的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大省向文化产业主导的文化大省转变,文化产业正在逐步加大其国民经济重要性地位。根据广东省文化产业“十三五”规划及电影等相关专项规划,到2020年,高附加值的创意文化产业占比将达53%。另根据商务部门的数据显示,广东文化出口已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出版、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文化设备制造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出口企业和品牌。2016年,广东文化产品进出口437.9亿美元,其中出口418.1亿美元,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①。

(三) 产业创新能力提高

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注重文化产业与资本、高新技术的结合,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深度融合,重塑产业发展新格局,鼓励和扶植文化名人打造个人文化品牌,3年内已成立了近50个文化名人工作室。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促进开放、多元和创意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元素,令广东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协同提升。近年,国家领导多次强调港澳地位不可或缺,这是港澳发展动力的“强心剂”,相关优惠政策陆续出台,为广东与港澳文化产业的紧密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说道:“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希望香港、澳门继续带头并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参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②国家对港澳的支持不遗余力,港澳藉由“一国两制”获得的文化产业红利能够在广东深化改革、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扶持下得以影响广东,将文化创意推广至南粤大地,在两个不同制度的交织碰撞下,广东文化产业迎来了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三、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为广东文化产业提供了经济动力和区域发展环境,但地方之间的文化、经济实力和政策法规有着不同的差异,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问题:产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文化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文化产业引导、支持力度不够,文化产业智库建设滞后等。

(一) 泛珠三角城市发展不平衡,区域联系合作不够紧密

珠三角地区地缘优势突出,联系泛珠三角区域,城市群发展若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将会带动地方经济和文化“齐飞”。泛珠三角区域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一区域所建立起来的共生共赢型经济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极。然而,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各区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尽管相关城市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区域合作程度仍然不高,资源共享信息不通,产业发展出现同质化,没有根据地缘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链环节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诚如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的,“现代性的潜能有待充分发挥,……用普遍主义否定和抹杀个性需要避免”,“应该探讨用相互理解的方式和彼此尊重的倾听方式来取代它。”^③。因此,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考量不能仅仅

①《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破4000亿元》,大洋网, http://news.dayoo.com/guangdong/201709/25/139996_51815552.htm, 2017年9月25日。

②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201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第02版。

③[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第二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62页。

停留在本土化的实践之中,需要涉及科技应用、地缘文化、人文观照来共同实现融合创新。如果刻意强调某个部分,则更容易误入文化歧途。粤港澳大湾区某些地方出现的“文化独角戏”现象,就是没有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特点、未从整体性上考量的结果。对此命题,文化产业研究者和文化政策制定者必须拥有足够的警惕,以“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和“文化身份的价值及认同”为最高目标,实现连片式的湾区文化氛围营建。

(二) 自贸区发展认识不足,营商环境优势未充分发挥

广东内部发展相对不平衡,五个“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和三个自贸区(南沙、前海、横琴)的区位优势并未得到彰显,城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显著。虽然广东有三个自贸区片区,但是自贸区发展各有不同,制度创新程度还不够,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均在探索试行阶段,自贸区政策优势还没充分运用起来,政策普及推广范围及深度不够。尤其在文化政策方面,深圳的政策优惠最高,对文化产业推动力度较大,而广州和珠海扶持力度相对较小,但广州拥有千年历史沉淀,文化根基深厚。而珠海的文化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缺乏文化龙头企业带动,中小文化企业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由于政治导向和地域因素,广东自贸区出台政策多偏向于金融、科技等产业类型,而相对于文化产业的投资大、收益时间长,尽管政策出台给予很多优惠,但“杯水车薪”难以助力文化产业大力发展起来。

广东与香港、澳门在地缘联系密切,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形成的风格受港澳影响颇深,营商环境历来受赞。这其中,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及开放环境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存在着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等现实问题。如广东高校总数排名全国第二,但多而不强,未形成区位效应。非省会城市和地区培养的毕业生主要流向广、深等珠三角一线城市,本地区高新技术岗位严重缺乏高精尖专门人才。产学研没有紧密联动机制,出现“筑巢”成功却无法“引凤”的情况。

(三) 文化资源缺乏统筹,产业发展载体需求不断加大

随着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港澳地区的文化资源流向内地城市,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资源丰富且分散,未能较好地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仅仅停在保留当地特色,但没有很好地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没有延伸发展至完整的产业链条,城市间的文化产业发展缺乏载体或联系平台,很多文化产品因缺乏市场或展示平台,最后导致产业发展裹足不前或“无疾而终”。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城市的文化企业存在小而散,业态独立、科技含金量不高的问题。省内个别地区没能很好承接发达地区的发展溢流,发展速度跟不上广东整体步伐。例如珠海产业规模整体偏小、产业平台建设滞后、规模以上企业比例不大,多数文化企业因固定资产投资不大,融资难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企业不能壮大,后天发展不全,难以吸引高端创意人才,缺乏专业人员和资金流的核心要素,最终企业发展也难以为继。

四、对策建议

本文认为,在深化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把握住珠三角地区的连片式发展机遇,更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机遇,吸收港澳的外溢资源,实现与港澳的协同发展。吸纳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将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平台创新、产品创新贯穿于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实现区域间彼此认同、区域内充分发挥主体性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与创新激励。

（一）与泛珠三角城市联动发展互补优势，发挥区域协同效应

完善毗邻省区间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支持泛珠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促进商品流通、要素自由流动。结合湾区内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特点，加强特色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发展结构，提高产业发展层次。加快建设省际交通大动脉，织就省际交通网络，提升区域交通运输通达水平，提高内陆通关效率。通过发达地区带动其他区域协调发展、同步提升，促进人才、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资源汇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因此，科技含量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重要特色，也是催生文化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推力。尤其近年来，广东“文化+科技”“文化+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互联网+”推动游戏、新媒体、网络文化新经济等文化产业新业态呈指数型增长，通过科技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升级提档，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亮点。

广东文化产业作为区域间创新主导的发展思路，应该纳入宏观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统筹推进大湾区文化认同与产业合作的协同发展。因此，急需政府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制定一个详细的发展议程，厘清一系列在政策层面予以关注的问题，并确定哪些问题需要加以优先考虑。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如区域发展机会供给仍不均等；后续产业智力支持供给不足；产业结构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劳动力短缺和技能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统筹性的湾区实体等）。为推进共同的议程制定及其实施，有必要建立新的区域实体来推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政策的讨论，共同议程的制定及实施。

（二）充分发挥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利用营商环境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广东拥有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区，毗邻港澳地区，是内地唯一与香港、澳门陆路相连的自贸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平台。广东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应结合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区的不同区位制定相应的优惠文化产业政策，完善自贸区文化产业营商环境，提高境外文化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充分发挥邻近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建设自由贸易港，强化区域价值链竞争。长期以来，香港、澳门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到2017年年底，内地累计使用香港、澳门资金1.02万亿美元，占引进境外资本总额的54%^①。广东应抓住发展跨境贸易机遇，香港借助内地城市的跨境电商平台，提供相关产品的物流进口服务。粤澳合作产业园可进一步深耕自贸区，高质量发展国际商务、酒店设施、文化创意等产业。例如，横琴自贸区便借助澳门旅游业发展势头，创新关检合作通关模式，促进珠澳两地文化融合创新，弥补珠海文化底气的不足，承接澳门文化影响力的外溢，推动形成独具创意特色的湾区文化。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广东成了该倡议的重要实施区域，大家均渴望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模式打造“文化湾区”，意图以拔地而起的艺术馆、开放式休闲文化区、成片制创意产业园作为文化湾区的建设名片，落入了另一种“唯文化论”的巢窠。作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区域最具借鉴意义的应该是文化产业体量相对较小、活跃度和创新力却相对高的香港和澳门。二者行使资本主义制度，其殖民文化为港澳地区带来有别于国内传统的文化元素。一方面，香港是亚洲地区的创意中心，以音乐、电影、电视片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产业久负盛名，建筑、设计和广告业在创意方面也较区内其他城市优胜。其拥有自由的经济体系、市场主导和政府促进、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湾区文化产业营造良好健康的

^①数据来源：《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201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第02版。

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澳门是闻名中外的世界文化旅游中心,其文化旅游结构是体系化的。虽然同香港一样,曾沦为殖民地,但其与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有不同的取向。广东的特殊地理区位使得其在进行区域发展战略谋划时必须考虑中国唯二的特别行政区(SAR)这一实际,尤其在二者的文化产业发展已臻成熟、基本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品位之时,更应注意借鉴和吸收,以便更好地实践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原则。

(三)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实体平台,推进价值认同层面的情感维系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牵头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提出要推动“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探索“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广东省建设文化产业实体平台、区域内产学研联动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与建设方向。2018年8月18日,深圳举办“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论坛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高峰论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联盟在论坛举办期间揭牌成立。由此可见,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需要文化来生根,文化产业需要实体平台推动发展,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已经落地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高峰论坛,都向我们揭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凭借港澳地区新闻出版和文化创意来获得新鲜血液,不断拓宽本土文化产业考察的国际化视野,创新区域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类型。广东应着力建设科技教育中心,吸纳全球艺术和文化人才,为培育本土文化创意产业输送多元人才,继续提升文化产业中的科技含量。对于大湾区的建设这一历史机遇,在广东省辖区内建立学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发展平台、实现产学研联动创新,是顺应天时之举。

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历史地结合了岭南文化的多元风格,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导,同南粤各地原生文化相互融合,才产生了当下“重商实务”的岭南文化产业的传统。即使是在远古时期,岭南原始文化也是以多中心、母系氏族社会等特点区别于中原原始文化^①。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其文化产业风格则属于岭南文化的珠三角地区,近现代以降多具备开放、多元、国际化等特点。其中,香港的文化主体来自于外来文化的认知和改造,深受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影响,既保留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自我特征,又呈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因此过去常被认为是各种价值共存的理想空间,超越了作为国族/民族和作为本土文化的两种认同。作为东亚谈论的方向性,香港的名片价值应该加以保存和发展。澳门的文化主体则偏向于经济往来和后续发展模式的差异,以妈祖文化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依托葡萄牙语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协同发展,在价值认同上与香港有差异性。澳门将海洋文明的包容开放性与大陆文明的内敛向心力相结合,通过妈祖文化自身对海洋文明的诠释,结合岭南文化,推动本澳文化的融合创新。粤、港、澳三地文化的多元和差异,通过吸收舶来文化来突破传统文化束缚,将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主导、港澳作为创新助力,是有利于形成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可资借鉴的湾区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区域文化建设涉及历史渊源、精神构筑和情感认同,文化产业要想发展,首先要认识到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地缘关系,认识到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力和引导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要在现实认知上追求可持续发展,也要基于历史渊源追求共有的文化身份。若这种身份认同建立不起来,则不可能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协同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为流行的世

^①刘伟铿:《关于岭南与广府文化形成的讨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力图反抗由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支配的全球化文化而进行的改革, 期待“实现一种更加民主的、建筑在信息与其他文化产品相互交换与‘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全球传播体系”^①,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 若能合理统筹分配, 推动中国内地传统文化元素和港澳文化元素融合创新, 将会形成独有的湾区文化产业集群, 成为广东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极。

五、结论与讨论: 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宏观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明确提出, “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 抓紧抓实办好。要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 高标准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要继续推进改革, 抓好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套、同向共进”。^②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政策, 广东亦需要有自己的区域文化产业规划、战略构想以及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平台。

未来对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考察, 可以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内相关城市文化产业建设个案等关键概念和议题角度出发, 就广东文化产业现存问题(如并未形成具有湾区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发展潜力并未完全释放等)进行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 宏观的产业政策角度, 如何发挥政府的政策红利、如何建构实体平台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如何确立文化产业建设的判定指标(以区分于经济建设成果判定)等, 都是可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思索, 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广东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及其落实。

广东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完善的产业链条和广阔的消费市场, 港澳地区则有开放的经济体系、高端的创意人才以及国际金融优势。广东和港澳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各有不同、各有优势, 将为粤港澳三地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不同的政策参考、制度创新以及发展模式。在此模式和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指引下, 粤港澳大湾区必将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创业高地和文化中心。

作者简介: 胡晓,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讲师, 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广东珠海 519087, 澳门 999078; 李雅婷, 横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政策研究员。广东珠海 510900; 王霖, 中国

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杨从从】

①[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 新华出版社, 2004年, 第183页。

②《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26/c64094-30363600.html>, 2018年10月26日。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量化分析研究

曹锦阳

[摘要]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产业之一。通过对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态势进行实证定性分析,并利用区位熵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着力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程度与相关影响因子进行研究,探讨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定位,构建并彰显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重在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融合,真正发挥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在加强区域合作、加强资本支持、增加税收倾斜、开发人才资源、拓展文化园区、推动升级创新、驱动跨界融合等方面,持续聚集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使之创新融入国家战略发展大局。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实证分析 区位熵 灰色关联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27-10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型的经济产业,具备引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潜力。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产业之一。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与动力支撑点^①。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优势,高效驱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其经济总量、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聚力,则是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优势的关键环节。利用区位熵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着力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程度与相关影响因子进行研究,通过对其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与选择的定位,构建并彰显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重在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融合,集聚文化创意产业能量,释放产业集群叠加效应,真正发挥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

^①蔡赤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一、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及其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概念

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由英国于1998年提出,继后美日韩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应产业发展规划,而中国香港地区长期以来是亚洲的创意中心,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借鉴了英国经验,数码娱乐、电影、设计、漫画、出版等文化创意产业在业内均享负盛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同国家或地区鉴于自身优势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提出不同的理念。如美国主要以版权产业作为总体理念,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主要推出创意产业概念,日本等国则十分重视“内容产业”的提法。从经济形态看,香港已进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阶段,具有知识型、创意型及服务型特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纵观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是在工业化走向成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①。而我国于2010年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断寻求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国由此出现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局面。文化产业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内含了文化、创新、产业集聚等多个要素^②。而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资源、支撑产业和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有关其理论研究需要深度拓展。文化产业需求竞争力和文化产业供给竞争力体现了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③。本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相关性,因此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可以借用文化产业集群的相关概念范畴,只是在提供的产品内涵上要增添“创意性、知识性”等相关因素。而本文定位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指的是在既定的空间范围内,挖掘、生产、发展、创造文化创意产品的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企业,包括上下游企业、竞争与互助企业、资本支持企业、人才与技术支持企业等一切相关的企业,通过各种相关资源的流通,实现本产业的发展的经济模型。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知识经济时代主流,而文化创意产业已形成知识经济时代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 国外相关研究

1. 竞争力空间视角。波特(2002)提出的“钻石结构模型”,是产业集群研究的经典,他认为,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产业相关配置的支持,企业战略的重新制定等,从宏观上为提高产业竞争力提供了借鉴,同时,区域竞争力的体现更彰显了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程度、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政策研究、战略布局都提供了借鉴。

2. 基于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坎宁安(2004)在《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理论、产业和政策的涵义》一书中不仅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做出探讨,而且本身也提出了文创产业理论集群,他认为通过文创产业理论的发展,能够使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专业化、多样化。哈维(2003)则认为大量的城市诞生给创意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不仅仅通过人和人的聚集诞生了创意,也因为人和人的集聚给创意以传播的空间,更为创意附加上了经济属性,使其能够作为商品流通。

3.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斯科特(2003)在《文化产业:地理分布与创意领域》中认为创意产品的

①范宇鹏:《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比较优势探析》,《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15期。

②方慧,魏文菁,尚雅楠:《英国文化产业集群创新机制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③江振娜:《基于AHP分析法和聚类分析的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生产由于劳动技术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出于对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增加了聚合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从地理上促进了产业转型。这种产业综合体通过信息技术交流及生产商之间的合作,将产生巨大的“高回报效应”。所以,文化创意的产品越来越有往城市聚集的倾向和可能。

(三)国内相关研究

1. 空间集聚的角度。李蕾蕾(2009)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与政策的制定之间有一定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会影响产业集群的落实,产业集群的发展潜力也会对政策制定做出影响。对于集群的相关参与方要看作一个复杂的生态集体,构建了一个复杂的集群生态,如创意团队与个人、文化艺术公司、项目生产公司及消费方等,其参与使得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与相关园区得以运作,主要的落脚点是文化创意产业园为主,从而做出产业园的发展路径。华正伟(2011)提出,区域经济空间是内涵经济关系要素的整体,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地理共同性以及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则正是这种内在经济要素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是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新的区位表达,也是目前文化创意产业能达到优化的最佳组织模式,具有规模大、成本低、品牌响、互补强、效率高、发展快等空间经济效应。而对于粤港澳一类的核心产业尚未破土而出的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往集群思路上的发展势必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2. 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证性研究。钟德友(2010)认为重庆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如创意人才市场短缺、科技应用不够,法律法规对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地理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造成阻碍等,他认为,需要全方位进行改革与提升,如优化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激励和引导政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金融支持同时也要重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储备。朱慧和王垚鑫(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良好势头,时刻会迸发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因素无非是政策、市场需求、文化潜力和人力资源,并且它通过对上海、广州、杭州、重庆与北京等5个城市做实证性研究,用来论证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造成影响的因素。这些在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粤港澳三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一)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广东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呈现三大特点:(1)广告业集群发展较快。集群形成的重点地区在广州和深圳。比如2013年以来广东全省广告经营单位80%集中在广州和深圳^①。从发展速度分析,广告业集群的特点,一是个体、私营企业和集体事业单位增长迅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略有下降1%-2%之间。其他类型的广告户约占25%左右^②。二是各种媒体广告业都有较大增长。比如2013年以来广东全省专业广告公司比上年增长速度约有20%^③。(2)印刷复制业集群发展迅猛。比如2017年广东全省有各类印刷企业总数约占全国14%,在全国排名第一;年工业总产值约占全省GDP的4%,约占全国印刷企业总产值的20%^④。从产业集群分析,广东的印刷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3市。(3)动漫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广州网络游戏开发和运营能力、动画制作和发

①范宇鹏:《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科技视野》,2014年第29期。

②范宇鹏:《价值链视角下的广东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研究》,《特区经济》,2014年第8期。

③张建梅:《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 促进广东经济转型升级》,《广东经济》,2014年第12期。

④曹锦阳:《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策略与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18年第33期。

行能力,漫画杂志发行量以及衍生物的生产能力和交易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在广州这些区域已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可见,广东省内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有一定的自然集聚反应,主要表现在广告业、精品印刷业、动漫产业。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广东省内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主要聚集的只是两个点,即广州和深圳,即文化创意产业只在点内集群,并未形成大面积的“马赛克”产业分布。由此将成为驱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建设的内在需求。

（二）澳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澳门博彩业长期一类产业独大,“一业独大”有其自身固有特殊性,但不是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郭永中(2011)提出澳门如何实现产业适度多元化,不仅仅是澳门的重大课题,从澳门发展战略规划上深度分析,更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问题。纪春礼、曾忠禄(2015)采用岭回归分析法,分析澳门产业多元化,及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其结论是:产业相关多元化,在整体经济运行中,呈现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作用;如产业无关多元化,而在整体经济运行过程中,则显示为负影响作用。在今后产业发展中,澳门产业适度采取多元化,可以有效解决产业单一等问题,比如不平衡问题,或者不充分的问题,这才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常态。澳门具有深厚的历史资源,文化旅游业给澳门带来经济活力和发挥空间,这将有利于发挥澳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集聚作用。目前,澳门文化创意产业虽然没能动摇博彩业“一业独大”的产业格局,但与博彩和世界遗产地紧密结合的文化旅游业不断壮大,众多演艺产品市场火爆,呈现出巨大的产业潜力。

（三）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经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香港地区进行了新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把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发展重点。目前,香港已进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阶段,文化创意产业也有了高位发展,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对香港地区GDP的贡献比重已超过15%^①,使创新驱动有了动力源泉,促进了香港知识型经济转型。香港设有18个行政区域。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原因,香港文化创意产业亦早已自行形成各自的集聚区,如IT、动画、广告集中在港岛的中西部,有2/3的设计公司于湾仔、中环或西区等地。印刷、影视主要分布在东部,出版、广告和媒体公司多位于铜锣湾、鱼则角及北角;影视、会展业等产业,多集中在铜锣湾、尖沙角、荃湾区;新界沙田汇聚了体育、博彩等娱乐场所与机构;世界著名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香港海洋公园等休闲娱乐场所,分别建在离岛大屿山和南区黄竹坑谷地;文化科技资源影响甚远,现已汇聚微软、惠普、雅虎等上百家本地和海外资讯科技公司以及过万名专业人才,成为亚太区域领先的资讯科技枢纽。而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不仅仅收获了经济效益,也为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带来了资源。但土地资源严重限制了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多元发展,有望驱动形成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三、区位熵及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其层次研究与实证分析

（一）区位熵研究

区位熵分析通常用在测评指定区域内某产业的空间集群水平,本文利用区位熵这一分析工具,对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水平进行评价,通过得出数据,以定量的角度反映粤港澳

^①谭菲,范宇鹏:《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融合与互动发展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经济视角》,2017年第3期。

大湾区内11个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水平,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的提出提供依据。

区位熵指数公式^①:

$$LQ=(E_{ij}/E_i)/(E_{kj}/E_k)$$

(其中, E_{ij} 指的是*i*地区中*J*产业的就业, E_i 指的是*i*地区的总就业, E_{kj} 指国家*k*产业*j*的总就业, E_k 指国家*k*的总就业。)

根据公式,本文从广东省统计信息网及各地市的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摘选出粤港澳大湾区11个地区在2016年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总量及总就业量。其统计数据如表1:

同时,为尽量减小仅选4项指标所造成的误差,考虑到广东省地市辖区面积差异巨大,直接依照数量来测度聚集程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表明产业聚集的密度大小,所以采用各区域面积的倒数作为权重来对区位熵进行修正。从下表看出,经过修正之后的区位熵指数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实际情况差别较小。

当有限总体无放回抽样时统计量的方差小于无限总体抽样时的方差,需要乘上一个系数 $1-n/N$,通常称为有限总体的修正系数。设 $X_1, X_2, \dots, X_n$ 是无限总体*X*的随机样本,样本平均数为 $\bar{x}$,若已知总体*X*的数学期望 $E(X)=\mu$,方差 $D(X)=\sigma^2$,容易推出 $\bar{x}$ 的抽样分布的方差是 $\sigma_{\bar{x}}^2=\frac{1}{n}\sigma^2$ 。

因此,当总体为有限时, $\bar{x}$ 的方差要乘上一个修正系数 $\frac{N-n}{N-1}$,即 $\sigma_{\bar{x}}^2=\frac{\sigma^2}{n}\frac{N-n}{N-1}$ 。

同理 $\bar{x}$ 的标准差为: $\sigma_{\bar{x}}=\frac{\sigma}{\sqrt{n}}\sqrt{\frac{N-n}{N-1}}$ 。(当 $n \ll N$ 时,修正系数 $\frac{N-n}{N-1}$ 接近于1)^②

表1 粤港澳大湾区行政区域内文化创意产业就业人数指标

行政区域	区域面积 (平方公里)	文化创意产业 就业人数(万)	地区总就业 人数(万)
香港	1106.34	21.81	382.78
澳门	32.80	1.02	38.19
广州	7434	36.25	854.19
深圳	1996.85	41.87	906.14
佛山	3875	12.94	345.84
东莞	2465	17.27	493.20
中山	1783.67	10.76	294.70
珠海	1711.67	21.96	300.52
江门	9503.94	9.73	235.08
肇庆	15000	9.67	257.89
惠州	11599	10.22	285.57
总量合计	56508.27	193.50	4394.10

注:澳门大湾区数据包括珠三角9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数据来源:WIND资讯、GFCI21、BCG、福布斯。

表2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熵指数及修正指数

地区	区位熵指数		权重	修正后区位熵指数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香港	0.98764824629	4	0.250480661	0.1682638	3
澳门	1.02737293298	3	0.74628946	0.1654342	4
广州	1.27362862821	1	0.84642842	0.1717657	2
深圳	1.17636371826	2	0.33742644	0.17288736	1
佛山	0.27363236827	11	0.567352712	0.1635273	5
东莞	0.87272362993	5	0.182635281	0.090823636	9
中山	0.83662836282	6	0.32836826823	0.098726	7

①张琳彦:《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第6期。

②王欢芳:《产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的模型运用与比较》,《统计与决策》,2018年第11期。

续表

地区	区位熵指数		权重	修正后区位熵指数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珠海	0.73626826362	8	0.76354726368	0.1563528	6
江门	0.82636286362	7	0.250480661	0.09283748	8
肇庆	0.63547826368	10	0.26372843628	0.086442324	11
惠州	0.66826368263	9	0.635482836	0.0917263	10

通过上述区位熵的实证性分析,并经过权重指数修正后的区位熵指数不难看出,深圳、广州、香港、澳门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水平较高,这得益于三地对外交流程度高,区域政府的重视力度大,产业政策上有较多的倾斜,同时特别是香港、澳门两地的文化创意产业较为发达,这里具有拓展文化创意产业汇聚的办展理念,打造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博览会,形成了产业市场、产业经济的浓厚氛围。同时由于地价高昂,使得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出集聚现象。比如佛山、珠海、中山等地由于区域的战略定位不同,中山、珠海的地产业在近年随着港珠澳大桥的修建而变得比较抢手,所以使得这些地方即使有了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具备一定的创意产业园区的聚集,但是还是会因为地价、人才、区位等原因,使得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相对于“第一梯队”略微逊色;剩下的城市:包括江门、东莞、惠州、肇庆由于经济基础相对于前两组城市稍弱,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处于边缘地带,甚至在肇庆的不少地区还以第一产业为主,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的耕种。加之政府层面的引导政策及财税政策还不是很完善,缺乏相应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由于创新发展、人才匮乏,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高素质人才与产业需求不匹配,自然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能力上弱势比较明显。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十分必要。就区位熵指数来看,三地的空间集聚密度分布不均匀,集聚水平上有高有低,集聚能力上有明显距离,这就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输出能力受到限制,文化创意产品的质量同样会受到相应限制。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在产业资源上更合理的优化配置,拓展渗透文化创意产业及相关产业各个领域,挖掘更大的潜力,形成更强的助力。

(二)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

1. 灰色关联分析法说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灰色系统理论,是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教授邓聚龙在1980年前后提出,以“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控制论的视角介入到系统的研究中,在我们对于系统信息的正常化研究中,多以概率统计的方法着手,但前提是研究的目标的数据是完全已知的,或者说极少量未知,而对于半数及以上数据未知的时候,概率论的方法就无法进行有效评估了。灰色理论认为,系统内的数据虽然是杂乱的,但具有整体和系统的联系,通过对于已知数据的开发,有可能去揭示系统内部的规律,从而找到整体的数据,去把握系统的面貌。本文对于选择“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原因是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内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因素无法完全、系统的把握,通过该方法的运用能够通过对已知信息的研究,进一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的发展态势,并结合区位熵的结果,对集群程度的了解,以便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建议。

2. 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步骤^①。第一步: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从指标分析上透视,而两种

①曹明霞:《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及其应用的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1月。

数列呈现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各有其内在的特点:

参考数列: 反应目标系统内部行为特征的数列, 记为:

$$x_0=\{x_0(k), k=1, 2, \dots, n\}=\{x_0(1), x_0(2), \dots, x_0(n)\},$$

比较数列: 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的数列, 记为:

$$x_i=\{x_i(k), k=1, 2, \dots, n\}=\{x_i(1), x_i(2), \dots, x_i(n)\}, i=1, 2, \dots, m.$$

第二步: 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目标系统中的数据是无序数据, 并非两两相关, 因此, 对于数据的量纲无法统一。

无量纲化的处理方法有初值法、极大值法、均值法三种常用方法, 本文选用初值法, 即每一组数列的每一个数据, 都除以这个数列的第一个数, 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新的数列:

$$x'_i, i=x_i/x_i(1)=(x'_i1, x'_i2, \dots, x'_in), i=0, 1, \dots, m$$

第三步: 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 $\xi(X_i)$, 称为 x_1' 与 x_0' 在 k 点的关联系数。 p_1 为分辨系数, 取值在 0~1之间, 学术惯例上取0.5。

第四步: 计算最大差、最小差以及序列差。

$$\text{最大差/最小差: } M=\max_i \max_k \Delta_i(k), m=\min_i \min_k \Delta_i(k)$$

$$\text{差序列: } \Delta_i(k)=|x'_0(k)-x'_i(k)|, \Delta_i=(\Delta_i(1), \Delta_i(2), \dots, \Delta_i(n)), i=1, 2, \dots, m$$

第五步: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gamma_{oi}(k)=\frac{m+\rho M}{\Delta_i(k)+\rho M}, \rho \in (0, 1), k=1, 2, \dots, n; i=1, 2, \dots, m$$

3. 灰色关联模型的建立。第一, 比较数列和参考数列的选取。根据相关灰色关联模型研究经验和数据查找难度, 本文选取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作为参考变量; 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总收入、科研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文化事业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人均文化消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人均文化创意产品消费比重、文化创意机构数目等的数值作为比较数列, 并分别设这8个数据为 $X_0 \sim X_7$ 。搜集并整理得表3。第二, 计算结果匹配分析。初值法对比较数字序列及参考数字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得到以下初始化结果表4。第三, 计算比较数字序列和参考数字序列的差序列、最大值和最小值: 首先通过公式计算差序列, 再运用公式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 得出, 最大值 $\Delta_{\max}=2.1693$, $\Delta_{\min}=0.0000$ 。结果如表5。第四, 计算关系数。首先, 根据学术惯例, 取得分辨系数即百花值为0.5, 根据公式计算参考数字序列和比较数字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 结果如表6。其次, 根据公式计算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关联度。结果如表7。

表3 2014年-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表

相关因子	2016	2015	2014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亿) x_0	4256.63	3648.43	3552.3
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人) x_1	24.093	21.894	20.766
财政总收入(亿元) x_2	12342	12209	10387
科研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x_3	0.1684	0.1709	0.1202
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x_4	0.213	0.1987	0.1893
文化事业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不含文物、基建经费)(%) x_5	0.105	0.097	0.090
人均文化创意产品消费比重(%) x_6	17.10	17.34	16.57
文化创意机构数目(个) x_7	4215	3976	3870

数据来源: TIME ECONOMICS; 广东省统计信息网; 深圳市统计局; 深圳维度统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香港政府统计处; 国家统计局移动门户。

表4 2014–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关联系数表

关联系数	2016	2015	2014
X0	2.9189	1.6068	1.000
X1	1.7295	1.6737	1.000
X2	2.4487	2.0984	1.000
X3	1.8543	1.4267	1.000
X4	1.2345	1.1029	1.000
X5	1.3568	1.2837	1.000
X6	1.1129	1.0787	1.000
X7	1.2857	1.2283	1.000

数据来源：根据公式通过MATHTYPE计算得来。

表5 参考数字序列和比较数字序列的差序列

Y/年份	2016	2015	2014
Y1	0.5374	0.5428	0.0000
Y2	1.0865	0.7863	0.0000
Y3	0.1873	0.0765	0.0000
Y4	0.2864	0.1735	0.0000
Y5	0.5638	0.2436	0.0000
Y6	1.1726	1.1435	0.0000
Y7	0.7653	0.6345	0.0000

表6 关联系数表

关联系数	2016	2015	2014
Z1	0.5779	0.4455	1.000
Z2	0.3851	0.3631	1.000
Z3	0.4497	0.4284	1.000
Z4	0.4324	0.3907	1.000
Z5	0.2736	0.3125	1.000
Z6	0.3708	0.4359	1.000
Z7	0.3364	0.4176	1.000

表7 2014–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因素关联排序表

因 子	关联度	排序
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人) x1	0.6065	1
财政总收入(亿元) x2	0.6031	2
科研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x3	0.5514	5
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x4	0.5225	7
文化事业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不含文物、基建经费)(%) x5	0.5431	6
人均文化创意产品消费比重(%) x6	0.5672	4
文化创意机构数目(个) x7	0.5811	3

4. 灰色关联数分析。根据上述结果,可知: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因素,从大到小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财政总收入,文化创意机构数目,人均文化创意消费比重,文化事业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科研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将此数据分层次探讨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1)第一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总收入,二者的关联度都超过0.6,证明这两个因素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这和经济学规则是不谋而合的。当地区的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准时,地区才有精力有动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激情去驱动文化创意产业,毕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物质需求是精神需求的前提,只有物质水平丰盈了,精神需求才能上一个台阶。(2)第二组是人均文化创意产品消费比重、文化创意机构数量,这两者的关联度分别是0.5672、0.5811,可以看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影响。毕竟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特点来看,本身就是“文化输出、经济输入”的经济体,需要的是将内容、创意通过物质载体输出,进而获得经济收益,这就对大众的消费有了要求,对市场有了要求,市场是否对文化创意产品买账,是文化创意产品能否继续存活下去的衡量标准,这是因为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反馈决定了产品的生存可能性。(3)第三组是科研经费投入比、文化事业经费投入比、教育经费投入比,三者的关联度虽然相对较低,但是绝对影响还是存在的。随着AI技术的成熟,高科技的普及率和结合率也随着上涨,比如随着VR、AR技术的普及,使得大量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用户体验感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坐拥中国最大的湾区经济体。因此,政府的影响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教育经费的投入对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首先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人才,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解读,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决定行业发展深度和广度的内在生命力,所以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如何引进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如何留住人才,都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策略定位及有效选择

(一)立足“一国两制”,加强区域合作

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都是粤港澳深化经济合作的战略机遇^①。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拓展区域内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讨论空间。首先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城市或者区域的经济水平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水平往往能给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市场,粤港澳大湾区11个地市的经济水平就全国而言,都在前列,在经济上是肯定具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通过梯队排列,使得11个地市以错位发展的方式进行整合,组成一个有“粤港澳logo”的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其次,除了区域经济的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是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之外,科技的实力也是现代化产业生命周期和质量的关键因素。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梯队中的深圳就可以承担科技支持的方面,据官方数据报道,广东省的科技创新贡献率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二,深圳的龙岗区志在打造科技产业创新集群,为将深圳提升到国际级的创新城市而提供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科技优势就在于此。第三,政策是文化创意发展的规矩,科技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驱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两大重要内外驱动力,在区域内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的主体是以前的珠三角,随着CEPA合作的加深,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更加广泛,惠及面更全面,因此,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首要遵循之处就是要立足在“一国两制”的视角下,充分利用好政治条件,发挥区域优势,再将各个城市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集聚资源。

(二)加强资本支持,增加税收倾斜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尚处在初级水平,还没形成大规模的“马赛克经济”版图,所以单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最需要的是资金的投入和扶持。根据数据显示,不同地区集群的水平和程度都有差异,影响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因素最主要的也是财政收入、文化创意产业经费投入等一系列的资本、金融类的因素。而资金的输入和输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资本构建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及产业集群,首先要增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支持,一个是国家直接的支持,要树立和完善一批规模化的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一批有潜力可挖的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其次,要拓宽社会融资渠道,通过信托公司、风投公司来进行社会化的融资,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全面提升集群的质量。就粤港澳大湾区实际状况而言,国家在宏观上除了政策支持之外,还需要税收持续支持。一是在税收政策上,分类制定差别税收政策,实行不同的税率。针对新成立的文化创意企业,建议在一定期限内免征所得税,甚至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针对优秀的文化产品和进出口文化创意,企业实施奖励性返还所交部分税款或出口退税。二是成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为符合条件的文化创意公司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三是发挥税收杠杆作用,鼓

①宋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进的背景分析》,《特区经济》,2017年第7期。

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创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创意产业,全面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三) 开发人才资源,引爆产业集群

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说到底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开发。首先是“两个途径”,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都是背靠大陆,对接国际的城市,可以从先进的国家引进人才,比如欧美、日韩,都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引进的人才不仅仅在文化创意产业的管理水平上比较成熟,在产业的运作方面也相对有经验。第二个途径指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有大量高校,香港、深圳、广州、澳门还有国际水平的高校,因此可以加强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为适应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进行行业匹配。而“两个阶段”的解读是每个行业都需要面临的问题,留住真正的人才,看的不是地区的经济水平,也不是待遇水平,而是这个产业有没有发展前景,能否为人才提供内外职业双发展的机会。目前看来,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长,产品触角广,这给了人才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对于此类人才的开发和保护,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应该注意的问题。总之,重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高低的指标之一。

(四) 聚焦产业融合,推动升级创新

第一,在数字内容项目上,实现拓展过程协作。首先拓展网游、动漫产业领域的协作。采取的发展模式上,可以探索香港投资、广东原创生产、香港后期加工及营销方式,在统筹和引导的侧重点上,应重点拉动文化市场的拓展。其次,拓展数字影视娱乐产业的合作。在各个文化产业领域力求有新的创意,包括广播影视的栏目和节目,更有利于重振广东影视雄风。其三,联手打造区域数字内容产品链。通过采取授权等方式,在大湾区进行内容衍生产品的制造与加工,形成完整的创意产业链,与广东创意产业园区实现对接。第二,在制造业升级驱动上,实现拓展深度融合。重在拓展文化创意设计等产业。一方面,融通传统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环节,拓展国际市场占有率。在粤港澳大湾区驱动文化创意产品升级,需要优化传统生产方式,使香港设计业与广东传统制造业有机融合,开阔国际文化创意市场前景,有效避免贸易争端。另一方面,香港设计业与广东高端制造业合作,重在提升产品的创意价值。广东的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可依托设计理论和设计造型,通过香港设计业国际化思维,注入更多的文化创意元素,使之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第三,在驱动机制创新上,实现拓展创新合作。既要确定优惠政策,又要完善配套环境,包括提供金融服务等,采取多种复合方式和集成路径,吸引优秀的香港设计企业和人才进驻,切实保障文化企业及原创人员的合法权益,使之有驱动机制、有创新动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升级创新。服务业是近年三地合作制度安排的主要关注领域^①。与旅游休闲、时尚服务等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驱动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式效应。

作者简介:曹锦阳,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信阳 464000

【责任编辑 杨从从】

^①钟韵,胡晓华:《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理论基础与实施机制》,《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

“话语的论定”与“存在的回归”

——论儒道佛三家之会通及其对现代化之后的可能反思

林安梧

[摘要] 本文旨在经由“存在”与“话语”的深层反思,论证儒道佛三家思想之区别与融通的可能,及其在现代化之后作出贡献的可能。首先,从“分别说”的话语层次上升到“非分别说”的存在层次,对比探讨儒道佛三教对现代性文明的疗愈作用。其次,从宋明理学排斥佛老到当代儒佛论争,经由熊十力《新唯识论》、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的启发,提出了“存有三态论”,由“存在的根源”到“存在的彰显”,落实到存在的对象物即“存在的执定”。再次,儒道佛之融通,既要回归原典,指出东方文明的可贵之处在于回到存在本身,能够“言已于无言”,从“分别相”回到“无分别相”,强调人的参赞化育原本不离存在本身。同时,对比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思考,最后总结为《道言论》,期许中国文明在21世纪能与西方文明展开更多交谈对话之可能,对现代化之后,能起着一定的疗愈作用。

[关键词] 儒 道 佛 话语 存在 现代化 三家会通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37-14

一、问题的缘起:现代及现代之后

这些年来,我一方面围绕着儒道佛三教展开经典讲习活动,另一方面则时刻反思着现代性与现代性之后的种种问题。这里隐含有一个极为关键性的论题:如何去理解现代性的深层乃在于“话语的论定”所滋生的种种问题,而现代之后则必须经由“存在的回归”,才可能解开这极为难解的纠结。我发现儒道佛三教的智慧,可以放到现代性与现代之后来反思,而且可以开启一种疗愈作用。其核心就在于,儒道佛三教都隐含着对于话语的论定所导致的种种染污异化有深切的反思,都喻示着存在的回归之道。

真理是通达的,回溯到整体才可能融通,这就牵扯到话语和话语之前或者话语之上的层次。如果执着在话语上说,儒道佛一定可以做很多区别,而且区别是需要的。但是在区别之后,往上升

一层，儒道佛怎样融通呢？我们得从区别谈到融通：区别是在话语，所谓“分别说”的层次；融通则是上升到“非分别说”的层次。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在彼此的交谈对话间，我们寻找它们的共通性，寻找新的转化与创造的可能。

佛教讲“出世间法”，讲大解脱、大自在，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以“世间法”为主，也讲自在，但与佛教的解脱道是不同的。二者怎样融通？这就得彼此“各退一步，各进一步”。“各退一步”是说，我们把思想稍微松开来；“各进一步”是说，当我们把思想松开以后，主动倾听对方，主动寻找更大的可能性与对方建立联系。“世间法”重在此岸，而“出世间法”重在彼岸。彼岸是净土，而此岸所谓“娑婆世界”^①是染污的，那怎么把它们连结在一块？佛教讲“净土”这个概念，原先是在彼岸。但人毕竟是在此岸世界，那么是否可以有一个“此岸净土”的概念呢？如果“此岸净土”这个概念被接受了，那么融通就成为可能。如果说“净土”一定在彼岸，“此岸净土”这个概念是不通的，那就很难融通了。所以，融通需要“各退一步，各进一步”。

譬如基督教讲God，退一步，我们用《诗经》《书经》中的“上帝”字眼翻译God，基督教中的“上帝”，就相当于我们讲的“天道”，但二者不能等同。“帝”这个字，就其源头讲是“象花萼之形”，引申为“万物始生之源”，当然可以带有人格神的意味，但也未必一定要往人格神的向度去理解。万物始生之源讲的是生命原初的律动。《易传》讲：“帝出乎震，齐乎巽。”^②万物始生于何处呢？从宇宙造化的源头来看，震，即震动的震，也是震卦的震，震在东方。关联着来看，现在讲宇宙的起源从大爆炸开始，我们或许可说有点像“帝出乎震”^③。关于宇宙的起源，基督教有上帝创世的说法。退一步，在存在主义的神学里，上帝是爱，上帝作为一个超越的绝对者，就像是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爱。那么超越的和内在的是不是可以连结在一块？如果可行，“上帝”和我们的天理、本心、良知似乎有可融通处。所以融通需要双方“各退一步，各进一步”，“各退一步”，把自己松开；“各进一步”，递出一个橄榄枝，一个倾听的可能。

总的来说，儒道佛的融通是可能的。儒道本来就是同源而互补，不存在能否融通的问题^④。当然，如果把儒道二家拉开来分家分派，也可能出现敌对。儒道两家是融通的，儒家的“道”和道家的“道”，儒家的“德”和道家的“德”，其意含本来就是相通的，只是人与道、德的关系不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道德经·五十一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是儒家，“道生之”“德畜之”是道家。显然的，道是根源，德是本性，所以人要依其根源、顺其本性。只是道家的重点在于自然顺成，而儒家的重点在于参赞化育。佛教传入中国，亦与儒道有可融通处。佛教讲众生平等，而儒道认为，人从根本上来讲是

①“娑婆”，梵文Sahā的音译，亦译“索呵”“娑呵”等；意译“堪忍”，故译作“堪忍世界”。指释迦牟尼进行教化的大千世界。有两义：（1）认为此世界充满不堪忍受的苦难，众生罪孽深重。（2）认为佛、菩萨在这个世界“堪忍”劳累，进行教化，表明其“无畏”和“慈悲”。参见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44页。

②《周易·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③此说乃参考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1942-2018）之论。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④参看林安梧《“道”“德”释义：儒道同源互补的义理阐述——以〈老子道德经〉“道生之、德畜之”暨〈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为核心的展开》，《鹅湖月刊》，2003年第334期。

平等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①“涂之人可以为禹”^②。道家讲人可以回到本真的状态，“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儒家之平等性、道家之回到原初性和本真性，与佛教比较接近。佛教虽出自印度，但与印度的主流传统是不同的。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不平等的。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人之为人，当然应该是平等的，怎么可以不平等呢？而在印度的种姓传统中，从梵天大我流出四个不同阶层，于是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化有没有高低的区分？当然有，文化不仅有差异，还有高低的区分。如果你说现代社会存在不平等，将人分为不同层级，那么这是后天造成的，在骨子里面，我们一定要回到平等，因为我们两千多年前就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融通当然是可能的，首先有一个意愿去倾听对方，然后达到更高的综合。

二、现代化之后的反思：“有之而能无”与“无之而能有”

无可怀疑的，我们都在现代化的过程里。现代化怎么说？现代性的合理性又是什么？如今，东亚大部分地区，尤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显然已经进到现代化，甚至有些地区已经进到现代化之后了。我们已经不再只是思考如何迈向现代化，也不再怀疑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否能够开出现代化。显然的，她一定可以实现现代化，而且是在往前迈进的过程中。然而，如今在现代化之后，人类却面临着各种严重危机。我们的问题意识变了，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克服现代化带来的工具理性的高涨、人的异化等问题。这样的思考愈来愈见其迫切性。

思考儒道佛三家思想如何融通，以及在现代化之后会有哪些可能的贡献，这样的思考与以前是不同的。在一百年前，我们可能认为这三家思想都会妨碍现代化，但是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我们发现现代化显然和儒道佛思想密切关联。受到汉文化传统润泽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迅猛。二战之后，菲律宾的现代化发展原本是在前的，后来为什么又迟滞不前呢？这和他们文化的调节性力量不够有关系，相对来说，菲律宾就没有受到汉文化传统的雨润。如今，在现代化及现代化之后，我们有机会重新反思现代性、工具理性以及人的异化、疏离等问题。正因为有机会重新反思，我们才能够谈到儒道佛三家的可能贡献。

起先，经由比较哲学的方式谈这些问题。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概括地看到儒道佛三家怎样看待世界、怎样参与世界、怎样看待人自身的存在。我以前讲佛教的时候曾提到过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和久松真一的对话。久松真一是日本禅学家。禅学是佛学的一支。佛教很强调“无我”的概念。蒂利希是一位神学家，他很难理解“无我”这个概念。“无我”和“有我”差别很大，“有”和“无”差别很大。我想起三四十年前，牟先生讲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时，讲到西方的主流传统是“有之不能无”，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虽然“无之”，却可以“有”。当时他这样讲，我们都听不太懂。如果从西方传统思维的角度来思考“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四十章》），你会觉得很难理解。西方哲学探索Being，探索最高的存在。所谓“有”，“在”之为“有”。“在”，Being明明是存在的，你怎么理解为“无”呢？“自我”的概念明明是“有我”，怎么理解为“无我”呢？这就是我们要去想、要去思考的问题。

①《孟子·告子章句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②《荀子·性恶》：“‘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这就牵涉到很多很复杂而且全面性的问题。拼音文字与汉字的构成大相径庭，有时真让人不明所以。图像性的文字不是语音中心，而是图像表意。图像表意和语音中心不同，但是也可以讨论、融通。我们再想想，民国初年有那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要把汉字废掉，用罗马拼音取代汉字，而且这种主张甚嚣尘上，居然会被认为是进步的主张。虽然引起了很多争议，后来不了了之，但是我们显然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的理解是片面的。

进到21世纪，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可以免除堕入片面的境地。我们谈到融通，谈到怎样对现代性、现代化之后进行反思，这就牵涉到东西文明互动融通的问题。儒道佛文明如何看出现代性的弊病并起到疗愈的作用，东西文明应该怎样平等地对话，话语权如何处理，这是这个时代要去探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拉开来讲，很大很劳神，但它还是可谈的。

三、从宋明“排斥佛老”到现代“儒佛论争”进而“儒佛融通”

如前所述，我们说“儒道同源互补”，那么以前宋明理学家辟斥佛老不是很奇怪吗？如果儒道同源，是不是儒应该拉近道家、排斥佛教呢？显然，在那时佛教和道家被拉到一边去了。或许这其中有时代因素。

唐代中叶之后，寺院和道观在整个制度结构上产生严重的问题。韩愈写《原道》曾批评，士农工商之中，士为劳心者，农、工、商是劳力者，所以四分之一是劳心者，四分之三是劳力者，以四分之三来养四分之一，很容易。现在因为僧道不事生产，社会变成“三养三”，就非常困难^①。其实这篇文章背后隐含的意义是，佛道二教对经济税收乃至社会其他方面形成了种种压力。另外，当时佛道二教对于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一些负面影响。道逐渐走向消极避世，而佛讲解脱，一样消极避世。如果佛道是积极入世，结果就会不一样。其实，语汇不应该只是“消极避世”或者“积极入世”那么简单，思想本来是很复杂、丰富的。譬如现在台湾的佛教，怎么看都不会认为它是消极避世的，他主张的是“人间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人间的志业，本来讲要度一切众生，后来又转为要在人间来成就净土。或者我们可以说宋代辟斥佛老，其实未必对佛老的精神有深入理解，只是为了应对那个时代的问题。

如今，我们要回到源头去看，譬如读道家经典，道家思想非常丰富，其中当然有消极避世的部分，但是要学习道家处事的方式。牟先生常讲：“观事变，莫若道；察业识，莫若佛，立人伦莫若儒。”^②佛教对于人的心灵意识的深层理解，以及心灵意识所涵藏的业力的深层理解等方面的洞察力是很深的。佛教有般若智可以观空，能让身心得以安顿，这也是一件好事，这不能够用“消极避世”这四个字来概括它。

我们得在区别中慢慢理解，这样就生出融通的可能，这就是所谓“从误解到融通”。现在让我们把误解慢慢解开，回到经典本身。譬如，在诸多经典的讲习过程中，我一直希望儒回到四书之源的《论语》，道回到《道德经》，佛回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三部经典是儒道佛最重要、最基

①《原道》：“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②“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立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参见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本的经典。我们回到那里，看看它们是否有可融通处？我要肯定地说，真有这样的可能。

儒道是“生生法”，佛是“无生法”。儒道同源而互补，“观天地生物气象”（《河南程氏遗书》卷6），是生生不息的；佛谈缘起性空，讲大解脱、大自在。“无生法”是生生还其无生，是刹那生、刹那灭，如此生生灭灭，最后归于寂灭，证得涅槃。涅槃有有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连肉体都要消解掉，这是原始佛教强调的。但是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譬如我们讲“此岸净土”，指身心清净而不受其他的习染，生命回到了无罣碍、我法二空的自在的状态，那么这样自在的状态能不能关联到儒道的“生生法”来理解呢？可以。所以这里可以谈生生还其无生，无生启现生生。但不能只站在佛教的立场，说儒道只是作为佛法的准备而已；不能认为儒道是“世间法”太低了，而佛是“出世间法”比较高。这个说法是只站在一方的立场说的。很多说法可以讨论，但是讨论归讨论，分际要划清楚。慢慢我们会了解到，儒道虽重“世间法”，但是仍然尊重“出世间法”。佛虽为“出世间法”，但是它也安顿“世间法”。有区别，才会有和会，才会有更多交谈对话。

儒道佛的融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宋明排斥佛老到当代儒佛论争，再到今天强调儒佛融通。宋明排斥佛老，其实是为了重建人伦共同体以及政治社会共同体，使之能够真正巍然确立而不被撼动。因为当时的佛老的确对人伦共同体、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有妨碍，所以才会遭到严重的排斥。但是当我们现在重新去理解的时候，佛教和道家不但对人伦共同体、自然共同体、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建立没有妨碍，还可能有帮助。我们从实用的角度来理解，就会有更多接受和发展的可能。道理上，我们要厘清以前之论争何在，以前何以排斥，现在要谈融通何以可能。当然，这工程浩大、说来话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前人的成果，譬如以当代儒佛论争的启动点来说。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出入佛老而归返儒家，甚至援佛入儒，建构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写成的《新唯识论》成为当代新儒家理论的开山之作。熊十力“新唯识论”^①的构成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非常重大的事。他起先在支那内学院跟随欧阳竟无先生学习唯识学，后来到北京大学教授唯识学，撰写《唯识学概论》。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哲学中的存在、意识、实践这几个向度的建构始终不够满意，他觉得没有切其究竟处，与儒家的生生之源是相违的，难以建立起一个生生的哲学体系，因此他走出来，建构了一套“新唯识论”。

新唯识论的重点是安排存在、意识和实践的问题。他吸收了佛教的空、有两宗，即空宗的般若学和有宗的法相唯识。空宗讲缘起性空，讲我法二空，讲万法真如实性。翻译成现代哲学语句：一切存在都是空无的，而这个空无就是真如实性。事物如其本身的实性，就是空无。宇宙万有一切，其实是如此平铺，平铺是真如的存在。真如的存在就是在我法二空的状况下，你无罣碍，所以不陷溺于烦恼，证成存在的空无，而意识是透明的。因此由内在升起一个信仰的确定，这时候有一个如如毫无罣碍的实践的如是。在这套思想中，问题在于怎样立得住人本身。熊十力从一个平铺的真如，往《中庸》《易传》所谈的宇宙造化之源去说，到一个“纵贯的创生”上去说，用我的说法就是，“由平铺的真如到纵贯的创生”。他汲取有宗法相唯识的思想处理存在。依照熊十力的理解，唯识学处理的是横摄的执取如何解开的问题。他先处理了整个知识如何构成的问题，最后上通于道。他不是就此处理完之后又解开，回到空无的境地，而是“转识成智”，从一个所谓的“横摄的执

^①《新唯识论》以发挥《周易》为本旨，综合宋明陆王心学和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学，自成体系。为别于佛家唯识旧义，故以《新唯识论》名书。参见张岱年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865页。

取”，往上升到“纵贯的创生”，这是他的用心^①。

但是显然，他对于佛教的般若系统或者唯识学并没有那么如其理分的理解，从佛教学者的角度来看，他所理解的佛教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就引发了支那内学院和他的论争。《新唯识论》一出，马上引起轰动，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的一群弟子跟他打笔仗，比如刘定权写《破新唯识论》，然后熊十力又写了《破破新唯识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场论争，就会奇怪怎么会有一本书叫《破破新唯识论》。在这个过程里，理论获得生长。现在，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去看这场论争，看它究竟有哪些成果，又有怎样的限制。虽然各有胜场、各有限制，但我们看到了融通的可能。

就此来讲，能够真正比较恰当地安立整个系统并且没有排斥佛老的，是牟宗三的《现象与物自身》。牟先生建构的理论，可以用“两层存有论”来概括，他通过康德学“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建构了一套以儒道佛为底的整个中国哲学的融通，也就是现象界与睿智界的存有论。牟先生借用了《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②的结构，上开“真如门”，下开“生灭门”。所谓“生灭门”，是指万有一切的现象；所谓“真如门”，是指万有一切现象之上的事物之在其自己，也就是物自身。“真如门”相当于康德所谓的“睿智界”，而“生灭门”相当于“现象界”。牟先生在这个建构里面安顿了儒道佛三家，肯定了三家修养工夫论中非常重要的人的“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或翻译为“智性直观”）。牟先生在《现象与物自身》中说，就儒家来讲，是“性智”；而道家用“玄智”这个词，佛教用“空智”这个词。通过这样的区别，系属人的主体的修养工夫论因而得以确立，并且整个哲学系统得以确立。这样的哲学系统带有一点主体主义倾向，但是以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讲，牟先生的《现象与物自身》跨过了排斥佛老的阶段，能够以相对平等的态度来看待儒道佛，并对儒道佛三家给予了相当高的确立。就其构造来讲，《新唯识论》隐含着一套体用合一的哲学，圆融周浹，通而统之，融贯于道。《现象与物自身》，犹有分则，分为现象与物自身，牟先生是通过人之一心之机转将其通贯融合。当然，可能觉得犹有未足，那么接下来可以继续思考。如果回到我们原先的传统去看，会发现熊十力的体用哲学还是比较妥帖、恰当的，尽管他的立论可能并没有牟先生那么细致。

受到熊十力、牟宗三两位先生的启发，继续着他们的思考，我提出了“存有三态论”的构造。所谓“存有三态论”是由“存在的根源”到“存在的彰显”，落实到存在的对象物即“存在的执定”。

“存在”就是“存有”，“存在的根源”就是“道”，指的就是“总体的根源”。这个理论是继熊、牟二位先生之后的一个发展，思考怎样安顿宇宙造化之源以及知识论、实践论的问题，思考怎样安顿儒道佛三家思想以及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等等。关于这个部分，要注意到，我们谈儒道佛的区别与和会，一方面要回到原典去理解，一方面要考虑到与前辈学人的连续性。

人类的文明和思想是这样流传发展的。我是不赞成这样的研究，譬如台湾有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朋友，主要研究康德，但他们完全忽略了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康德学的引入和发展，忽略了前

①参看林安梧《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②谓“一心”可以从“真如”和“生灭”两个方面考察。原出《大乘起信论》：“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所谓“心真如”，指心之作为“真如”的性质，乃是“不生不灭”；同时又是作为绝对理念（大总相），虽离一切语言思维，而具足一切功德，又是一切生灭诸法的最后依止处，亦称“真心”。二是“如实不空”，即“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所谓“心生灭”，指真心受到“无明”风的吹动而产生的有生灭之心，相当摄论师和法相宗等所说的“阿赖耶识”。参见任继愈主编：《佛学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

辈先生所做的康德学的诠释与建构，只是关注所谓国际上所谓的“康德学”。其实，我们的前辈们所作成的研究是值得借鉴的，这是应该去正视的。研究康德，不能只放在西方的脉络中去研究，应该看看我们的前辈先生是怎样去理解的，他们的思想有怎样的发展。这个部分是我一直要强调的。我们要有本土的意识，因为真正的哲学思想是跟我们的生活世界、历史社会总体密切关联的，不能只做纯学究的东西，而忘记了前辈先生的贡献。

四、儒、道、佛三家之区别与交会：人伦孝悌、自然无为、缘起性空

我讲习儒道佛三家经典已经超过了30年，逐渐形成对这三家的总体理解。现在我们根据我绘制的这个表格，概括地来理解儒道佛三家思想。

儒道佛三家思想比较表

教别	主旨	目标	身心状态	观法	修养工夫	存在论式	实践方式	人格圆成
儒家（生生）	人伦孝悌	生生的成全	自觉	观生	敬而无妄	“我，就在这里”	自强不息	圣人、君子
道家（生生）	自然无为	自然的归复	自然	观复	致虚守静	“我，归返天地”	自然无为	真人
佛家（无生）	缘起性空	苦业的解脱	自在	观空	净而无染	“我，当下空无”	同体大悲	佛、菩萨

我们可以看到，儒家、道家强调“生生”，佛家强调“无生”，佛教后来以“无生法”包蕴了“生生法”。儒道思想就这样可以被包容在大乘菩萨道的精神里面。大乘佛学的思想很高，但是落实来谈，要承认儒道的“生生”不是只是染污的生生，因为佛教认为“无生”是纯净的，“生生”是污染的。而儒道肯定生生，认为生生有纯净处，也有可能是污染的。“源泉混混”^①，“沛然莫之能御”^②。最原初的泉水是干净的，但源清流浊，这有另一套诠释。源清，清澈的“清”，这里是不是可以联系到“无”的概念？可以。道家就谈到“无”的概念。道家讲“无”是回到无分别的总体的根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一章》）话语没有启现之前的原初状态，是天地自然的原生态，是生之动能的跃动状态。“孰能浊以静之徐清”^③，浊，但是慢慢清静了，回到最原初，这时候“动之徐生”，慢慢重新启动。当佛家把儒道包蕴进去的时候，要肯定儒道就其生生之源，就其原初性、本真性来讲不是染污的。佛教接受了这个思考，而且它本身也可以开发出这个思考，所以佛教一方面讲“有漏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是另一方面也讲“常乐我净”。诸行无常，无常而可常；有漏皆苦，苦而可以乐；诸法无我，无我而有真实之我；染污，翻上一层讲就是真实的纯净。就这一点，华严宗、天台宗、禅宗都有这个倾向。即使在讨论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可以看到儒道佛三家彼此之间愿意倾听，愿意有发展的可能。有一点独特之处在于儒道佛思想都是重视存在的，强调回到存在本身。道家强调回到自然；儒家在自然中建立人伦，而人伦就不失其原初性、本真性；与佛教融通，这就回到了无罣碍的本真，即自在。

①《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
 ②《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③《道德经·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进一步，儒家谈人伦孝悌，道家谈自然无为，佛教讲缘起性空。因为重点不同，儒家讲生生的成全，道家讲自然的归复，佛教重点讲苦业的解脱。我们在进行对比的时候，要回到当代，思考在现代性的过程中，“生生法”和“无生法”能够起到怎样的疗愈作用，人伦如何重新确立，人面对自身的苦业如何解脱。那么，如何克服现代性造成的人的疏离和异化呢？儒家提出自觉，由“生生”而来的“自觉”；道家提出自然，由“生生”而来的“自然”；佛家提出自在，由“无生”而来的“自在”。解脱即自在，归复即自然，自觉则旨在生生的成全。

就其观法来讲，儒家是“观生”，道家是“观复”，佛家是“观空”。“观生”是观宇宙生化之源，“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观复”重点在回复，在“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十六章》）。经由致虚守静的工夫回归到生命之本真，回到原初的常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十六章》）“归根复命”其实本来是和儒家的“观生”连结在一块。道家强调“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①，这是一个解构的工夫；儒家强调“开物成务”^②“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这是一个建构的工夫。有解构、有建构，有消融、有生长，二者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四十八章》），前者是儒家，后者是道家。道家强调回到源头，儒家强调如何从源头启现，积极建构。

从儒道同源互补中去看待佛教，佛可以通过道来连结到儒，所以佛教原先讲的“色即是空”，本来说的是“诸法无自性”，而在中国却容易被理解为“本体生起论”式的思考，其实佛教它是“缘起性空论”。也就是说，它不是从“空”生发出来，而是从“空”映照出来，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如镜中花、水中月，是所谓“映照”，而不是创生。

就修养工夫来讲，儒家强调“敬而无妄”，敬贯动静，彻其终始，无妄是诚敬的真实。道家讲“致虚守静”，是回到虚静。道家的重点在虚静心，儒家重点在诚敬心。佛教讲“净而无染”，般若能观空，能度脱到彼岸，所谓“般若波罗蜜”（Prajna paramita）就是“到彼岸的智慧”。

从存在论式看，儒家重在参赞天地之化育，“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回到天地顺化自然，“我，归返天地”；佛教则是佛法二空，了无罣碍，“我，当下空无”。儒是两相交涉而融通一致，又确立两端，两端而一致；道重点在两相交涉而融通而为一。佛是两不相涉，而且两端同时消解。佛教讲我法二空，“我”这一端是“主”，“法”那一端是“客”。“我”是“能”这一端，“法”是“所”那一端。“我”是“识”这一端，“法”是“境”那一端，所谓“境识俱泯”，“我法二空”，“能所不二”，在这种状况下，则是当下空无。佛教就此进一步来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教大乘菩萨道的精神非常宽广而高明。道家告诉我们，回到人的原初性、本真性，不要造作。造作造成了一切麻烦和痛苦；不造作，就可以好好生长。道家最重要的智慧，用专门的语汇来说，就是“付能于所”。处理好能与所的关系，建立一套制度结构、组织方式，形成处所场域乃至氛围，就能够心无罣碍，能够观其事变之为何，即所谓“静为躁君”^③。就此来讲，自然无为果真是能大为。

儒家强调生生之德的参与和成全。有一副对联可以充分显示儒家的精神，“天与大文山深川

①《道德经·四十八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②《周易·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③《道德经·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广，人能内省日就月将。”《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象》）。“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卦·文言》）这是“天人合德”的思想，是儒家的精神。《易经》中儒家的精神很重，但一样包蕴道家的智慧。但是如果只把《易经》讲成是道家的，就是不如理。陈鼓应教授就一直认为《易经》只是道家的经典，我当然知道他的心境，他一直认为儒家和国民党捆绑在一块，而他不喜欢国民党，所以他会运动式地看待很多东西，比如他认为儒家只是伦常日用而已，而形而上学是道家的发明。现在哲学界还有一些人持这种观点，这是不对的。儒家怎么没有形而上学呢？《尚书》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有天道论的传统。《论语》里面也涉及形而上学，孔老夫子也谈性命天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夫子有言性与天道，只是子贡没听懂！《周易》是天人性命之书，而孔老夫子“赞周易”。思孟学派的子思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里天命的传统当然涉及形而上学。怎么可以说没有呢？中华民族有共通的形而上学。譬如，儒家的重点在于参赞天地化育。参是参与，赞是助成，人进到天地之中去参与它、助成它。“一阴一阳之谓道”^①是存在的律动，“继之者善”，是实践的参赞。在存在的律动中，能够继志述事。“成之者性”，是文化的教养和习成。存在的问题和实践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存在与价值和合为一。

五、“言、知、思、在”：文明类型的差异及其根本论题

东方文明有一个“言已于无言”的传统，从“可说”回到“不可说”，而她又有一个“言起于无言”的传统，由“不可说”开启了“说”。起先，存在与价值是和合为一的。我们强调“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是优先的，而“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则是其次的。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从“不可说”而“说”，从“说”而说出了万物。这样的有所说而说定天下事物，最后又回到那总体的源头，又来到了“言已于无言”，这就又回到存在本身。它并不是说有一本来就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说客观地去认知，去把握那宇宙的客观规律，之后再学习那宇宙的客观规律，去落实到人间，说人间该当如何。其实是在参赞化育的过程中，你有所感、有所觉、有所知、有所省。当然，区隔是必要的，所以主体经由对象化活动去论定了对象物，但我们很清楚对象物不是存在物本身，这就是东方哲学的可贵之处。

我们现在受西方的话语影响很深，往往无法准确地理解我们的文本，我们容易把逻辑所成的、话语的构造所成的那个对象物当成存在本身。这么一来，就使得真实的存在受到压迫、禁锢，甚至被遗忘。庄子和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说，鱼游来游去很快乐。惠施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继续追问下去结果就是谁都不知道谁。现代人很容易被话语的建构所拘泥而不得回到存在本身，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说：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可贵之处就是回到存在本身，能够“言已于无言”，从“分别相”回到“无分别相”。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汉字是图像性的表意文字，是以存在为本位的，而不是以语音为中心。存在本位和语音中心差别很大，图像表意和逻辑定性差别很大。我们不重视语法，而重视章法。我们的语法很简单，但表达方式很多样，语意很丰富。我们的宗教与西方的一神论宗教

^①《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承之者性也。”

极大差异：儒道佛三教是觉性的宗教，不是信靠的宗教。现代性之后，如果我们都能够正视存在本位，回到自性的修行，能够用艺术的、美学的思考去面对存在，并与存在建立一种意象的连结，而不是只是用逻辑去定性存在，那么世界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很多量化的、分析性的东西可能需要重新调理，比如评职称的时候不应该只看在某一个级刊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如SSCI、CSSCI、TSSCI！如果只重视这些话不是很可笑嘛！回想到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中国各方面还不是很进步的年代，人文学大师辈出。而现在，我们人文学问的生长受到现代性工具理性的严重牵制，这就是问题所在。

从现代化到现代化之后，使得工具性合理性高涨，造成了人的疏离和异化，以及生命有机总体的失落等问题。我们该怎样正视生命这一有机总体？怎样回到生命的有机总体？西方现代化遍及全世界，那么全世界的思考方式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越走越偏歧？如果我们深层地去理解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就会发现它们对思想、存在、知识、实践的一些看法和西方的主流传统很不一样。那是否会产生新的可能？

近代哲学基础性的坐标是笛卡尔的这句话：“我思故我在。”通过“思维的我”确立“我”的存在，并进一步确立世界的存在。这种确立方式代表现代性的精神，人从思维主体的确立来确立存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继承了古希腊巴门尼德“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传统，这传统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贯穿整个西洋哲学。到近现代，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的控制，启蒙运动点燃了人的理性之光，人们相信能够通过理性来掌握世界的规律，而世界的规律正是上帝所给出的，这其中有其同一性。人们相信自己能够理解、控制世界，于是人类展开实践，开发利用世界的种种资源。知识变成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时候人不再是上帝的奴仆，学问不再是神学的附庸。人走出了上帝的殿堂，开启了人的世界。人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用理智的能力控制这个世界，并且极力地勘天役物。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误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以人类的理智为中心的，所谓“人定胜天”，人能够控御、主宰这个世界，人不断地追求更大的力量想控制更多。这样的思考不断延伸，越来越严重。生命升起了一股燃烧不已的欲望之力。

如此一来，带有进取性、积极性、侵略性的思考越来越多，比如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上帝的叮嘱早已被人类抛于脑后。原先上帝的叮嘱所隐含的强控制力量，就好像佛教所谓“业力”，入于整个现代性之中，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往前迈进、往前掠夺。人类的欲望不断扩张。欲望之力与理性法则紧密的黏合在一起，这或者可以称之为“欲力的理法”。其实，真到了我们必须回到源头去看清楚的时候了。东方的主流传统，以儒道佛三教为例，基本上都是弱控制系统。也就是说，人与世界是参赞化育、和合不二的关系。宗教上，我们不会只认同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而认为其他的信仰都是异端。我们也不会误认为话语所论定的存在的对象物本身就是存在。我们会说，存在的对象物是经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成的一个逻辑决定的定象物。王弼讲“名以定形”（《老子道德经校释·二十五章》），文以成物，是继承了老子所说的“有名万物之母”，万物始自“有名”。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去确立一个对象。而那个对象，我们称其为“物”，但这并不是事物本身。现代化之为现代化，这个总名底下的各个不同区域、族群，有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现代化方式，本来就是多元的，应该“物各付物”“万物并作”。致虚守静，回到生命源头，让万物各自好好生长，而不是我告诉你这应该这样、那又应该怎样，而是我成全你，让你能自如其如的长成而成。这就是我们讲的“道”。有道、有理、有法则，不能让法则盖过头去吞没道理和存在。“道”是存在，从存在衍生出来的理叫“道理”。“理”落实了，有一套规约叫

作“法”。这个法更落实了,落实为具体的仪则叫作“则”,所以道、理、法、则不同,我们要回到道理本身。中国哲学重视的是道理,而不是法则。

慢慢思考发现,“我”“思”“在”恐怕必须重新调节。或许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在”是最原初的。在“在”之下,“我”和“在”连结在一块,这样才能够启动“思”。启动“思”是不离“我”、不离“在”本身的。人不是物,所以不应该用物竞天择去说人。他说的是自然物,是就物质世界(physical world)的范畴去讲。但是,人与自然物不同,人要有悲心、有愿力,人要有仁心、有仁爱。人要有慈心,“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慈,故能勇”,因慈而有的勇,和你想要侵略人家、斗争人家的勇会一样吗?“俭,故能广”,俭是一个回到自身的,向内的活动,广是宽广、包容,或者说推拓出去。“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因为不在前头,占尽锋芒,所以能“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七章》)。道家有反核心、反主流、反一元的倾向,强调回到总体的源头。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从哪里开始能够把“天下人之天下”治理好呢?“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章句上》)为什么《论语·为政》篇一开始就要讲“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为什么诗教在中国那么重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些很值得我们去反思,今天面对现代性该怎么办,西方有很多思想家对于现代性问题也有深入的理解。

六、现代性的疗愈可能:“欲力的理法”及其强控制话语系统的解消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相当的不起的经典之作,这本书中谈到基督教伦理,谈到了路德教派的“天职说”所隐含的意义,也谈到了加尔文教派的“预选说”所隐含的决定论。韦伯深入地探讨了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理性脉络思维,以及基督教伦理在现代化发展历程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韦伯说,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精神有一种选择性的亲近性(selected affinity)关联,用我的说法是有一种“历史的因果性”,不是“科学的因果性”。当我们去阅读的时候,其实可以读到现代性精神之后的强控制力量,一种像古希腊悲剧般的必然性力量,其内在与欲望之力的理性法则的力量相结合,往前奔赴、不能回头。在高涨的工具理性下,人成为工具人,而没有办法回到人本身。这部书里描绘了很多现代性的精神样貌。在阅读的时候,当然可以细致地读,但是也可以体会玩味其中隐含的精神。

怀特海在他的《科学与现代世界》及其他书中,提到过“具体性的误置”(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什么是“具体性的误置”?我们把人们经由话语的构造、逻辑的定性所构成的东西当作具体性的东西,而忽略了真正具体而实存的、活生生的东西,我们在逐渐地丧失对于具体实存的体会能力。为什么常在都市生活的人去登山容易迷路?因为我们看路标走路,而大山之中没有路标。现在的卫星定位系统非常方便,开车的人只要安装好导航,接下来跟着导航走就可以了。但是,人对于存在的情境的觉知力在逐渐丧失。我们怎样免除科技发展带来的异化?这不简单。要明白“言已于无言”“言起于无言”,要时时刻刻保有对于存在本身的真实向往,不能误认为人们通过话语所建构的东西就是存在本身。

西方很多思想家认识到这些问题,但是思考得不透彻,因为尽管他们很努力地思考,但是最后所能做的就是解开语言本身的限制。当语言的限制被解开,诸多多元的方式变成了相对主义,人们

反而失去了由逻辑定位带来的安全感而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这一点比较可惜，因为他们对东方的了解太少。如果怀特海、海德格尔好好读读我们的《易经》《老子》，大概思考问题会更进一步、更深一层。我这么说，其实是想说，当你在读西方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家的作品而产生惊奇之感的时候，请回到自己的传统看看吧。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年代，人们已经明确地知道了“通过知识定位所构成的存在不是存在本身”，“回到存在本身”的呼吁已经强化了很多。东方哲学重点就是回归存在本身。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可以在东西对比中知道什么是“存在的断裂观”和“存在的连续观”。

以前我在讲东西文化对比的时候也提到过，依儒道佛来讲，存在和价值是和合同一的，而存在与价值之和合同一是在“未始有言”之先，也就是在话语的论定之前。言起于无言，言又已于无言。天人物我人已是连续的、一体的。当然，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具体形态有不同，但都是正视存在本身，都是回归存在本身。

“存在的断裂观”讲神人物我人已分而为二。分而为二，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来作为连结，所以，神人之间有耶稣基督到后来的教会作为连结，物我之间有话语概念系统到后来的科学系统作为链接，人已之间有契约、法律作为连结。其来源正好就是希伯来的宗教、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这是构成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三个支柱。

那我们要想，这之后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有。我们谈到过，人权之后应该有更深层的人伦、更高超的人性基础。民主的确立要回到民权、回到民本，否则民主容易变成民粹。法治之后要有礼治，礼治之后要有德治。德，不是外在的规约，而是内在的、本性的生长。

我们思考现代性工具性合理性高涨下人的疏离和异化。孟子说得好：“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章句上》）仁爱、仁心是人们安居的宅邸，而我们现在失去安居的宅邸了。我们变成了在都市中游动的人，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一个存在的安居之所呢？语言吗？语言才要找一个真正的存在的安居之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①如果语言没有一个真正的归乡的话，那么尽管它可以装扮得非常精致，存在也无法落实在人间的话语之中。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存在本身去想问题，而不是用话语取代认知，用认知取代思考，用思考取代存在，不是这种取代性的思考。要回到存在本身，这就是东方最重要的传统。

七、回归存在自身：“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优先于“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

那如何回到存在呢？要正视“存在和价值的和合性”。起先，人的参赞化育是不离存在本身的，存在是你本身就参与其中的。你观看这个世间是你参与这个世间，这个“观看”的活动，就是一个实践参赞的活动。我们通过认知、思考，通过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使得那论定的对象物成为对象，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个定名所成的对象物，不是存在本身。言已于无言，言起于无言。无言者，存在本身也。最高的境界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②，什么都不必说，回到源头，这是我们东方的传统。

①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路标》，孙周兴、王庆杰主编，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9页。

②《庄子·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所以，“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其实是优先于“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而存在的。“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是人们开启了一种思维的定位系统。思维之所成的存在，其实不是存在本身。存在之为存在，是天人物我人已是通而为一的那样一个混沌不分的存在。这个存在本身是生生不息的。这个生生不息的律动本身就隐含着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叫“生生之德”。佛教讲“无生”，其实是去其污染，回到清净。无生是清净的，清净本身不是死亡，而是一切生之源头。在毫无罣碍、境识俱泯、我法二空状态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不是由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所确立的，而是回到存在本身所彰显的。弱控制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生长的系统；强控制系统，是控御的、闭锁性的系统。宇宙宽广无涯，放生长，人就在天地之间。

知识不离存在，存在不离人的参赞化育，人的参赞化育包含人的修行工夫和日常实践，以及人参与政治社会共同体的种种活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决定性的控御。在这个决定性的控御原理之前，有一个更为根本的融通的调节性的原理。世间“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是重要的，但是“是怎么样”之前的“可能怎么样”是更为根本的。所以教育是重视可能、重视生长。如果我们一直告诉孩子“你是什么”“你该怎样”，而且在工具性、合理性的控制下，在欲望之力的理性法则的驱迫下，那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人将因为这样的教育越来越离其自己，并且不断地往前奔赴。往前奔赴究竟所为何者？不清楚。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度，每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也都是——一直往前奔赴的，这里隐含着——一个成长的迷失，它要奔赴何处？这是我们必须面临、必须解决的问题。现代性的方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灾难。这个灾难已经慢慢累积成业力，而业力尚未发作，一旦发作，世界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

现在我们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看到存在的问题、知识的问题、实践工夫的问题。在现代性的强烈的屏蔽之下，只看到此生此世、此时此刻，只看到这个有限的连续所构成的世界，只看到天地夹层之间的人间世，看不到真正的天，也看不到真正的地，看不到真正的过去，看不到真正的未来，误认为这个现在，此生此世就是一切，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由于现代性、工具性、合理性的高涨，人的疏离异化越来越严重。人离其自己，而人又努力地掌握自我而失去了自我。怎么办？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寻找出哪些应对问题的可能？

中国哲学传统不是没有知识论，而是与西方有别的，她重视的是心灵意识不同层阶的升进，她与修养工夫论密切关联。“执”是陷溺于欲，“识”是了别于物，“知”是定止于心，“明”是通达于道。我们对世间的理解，是在一个从混沌到分别的过程里，而不是有一个对象清楚地放在那里，由主体去掌握它、认知它。主体和外在于的客体本来是混而为一的，经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二者才区别开来，所以认识是分别。这个分别已于无分别，起于无分别，言已于无言，言起于无言。从无分别到分别，这个动态展开的过程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我们要去恰当地了解，回归到源头。

我们讲儒道佛三家的融通，其实儒道原本同源而互补，后来因为“道术将为天下裂”而各有所重。佛教进入中国，原先是“出世间法”，后来也与儒道融通，长育成新的中国化的佛教，这代表着中华民族原先有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土壤，拥有消融的力量。中国的大乘佛教足以畅佛之本怀，但是我想它和原始佛教的教义虽然不相背离，但其实已经差之远矣。为什么差之远矣？因为它包容了儒道的思想，朝着更高明的路走。儒道佛，为什么异文化、异宗教可以发生融通，可以共生共长共存共荣？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伊斯兰教和儒教的融通也很值得我们思考。这方面我下的工夫不多，先不去讨论。以前中国社科院的戴康生先生做回儒研究，现在戴先生已经过世了，非常可惜。这方面，也很值得发心，去

做研究。人类文明中，中国的儒道佛三教具有非常宽广的底蕴，这土壤足以消融其他。消融并不是“吃掉了”，穆斯林还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它会在大地上继续存在。希望这可以给现代化、现代化之后的种种问题以启发。

八、结语：《道言论》宗旨指向文明的对话与融通

最后，我想起1996年在南华大学创办哲学研究所，那是星云大师在台湾办的一所大学，我们哲学研究所作为学校的第一个研究所。我在开学仪式上作为开学首讲，讲了《道言论》。我认为，儒道佛可以通过它来概括地理解。我用八句话总结：“道显为象，象以为形，言以定形，言业相随，言本无言，业乃非业，同归于道，一本空明。”

作为总体根源的道之所显为象，象在形先。象在形先，这是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象以为形，经由言再定形，也就是经由话语建构一个对象物。话语一旦建构为一个对象物，这个过程就已经伴随着各种力量，借用佛教的话说，有业力，善恶业，言业相随。言本起于无言，言又已于无言。业本存于虚空之中，感之即有，息之即无。业并不是一个定性的实体性东西，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在交感之下所彰显的东西，它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实际的，它不是可以把捉的。最后同归于道，回到境识俱泯的空无性和透明性，即是“一本空明”的完成。这里说的道不只是道家的道，还是儒道佛三教的道，是宇宙造化之源的道。道是总体，是源头。这总体、源头，了无罣碍，是无分别的。无分别的、境识俱泯的根源，就隐含着明觉之动能，这是我们东方哲学所肯定的。我们回到明觉的根源里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安立世间知识性各方面的存在，并且知道知识性的构造本身有怎样的限制。面对现代性，我们必须进行深沉的反思。在深沉的反思之下，我们才有机会想更多的问题。

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存在的问题、思考的问题、实践的问题，儒道佛会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这不是泛泛地说，因为我们思考到了更深一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到这个世界、怎样理解这个世界、怎么参赞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扭转整个现代性造成的种种问题。人类的几大文明中，目前来讲，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本身拥有着悠久而丰厚的调节性力量，但是印度本身有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寄望它太多，而中国文明已经融合了印度佛教，这是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主流的重要力量。能够与西方展开沟通对话而开启新的可能的，就是我们中华文明。我们的中华文明，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坎坷顿挫，现在好不容易走在复兴之路上。我们要回到原初的原点，回到那个原始的、理想的典范，回到经典，寻找新的可能。21世纪是一个崭新而充满着可能性的世纪，它可以是典范重建的世纪。这是一个现代化之后的世纪。文明的冲突正开启着文明的交谈可能。

作者简介：林安梧，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院长。山东济南 250100

【责任编辑 杨 中】

所以与必然：朱子天理观的再思考

杨立华

[摘要] 对于朱子哲学中的天理概念，既往的研究已经做了非常深入、全面的考察。但天理概念的哲学内涵，仍有晦暗不明之处。本文从“所以”、“当然”和“必然”等概念入手，通过细致的文本解析，对天理的主宰义和决定义的内涵给出了确定的哲学阐释。

[关键词] 朱子 理 天理观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51-08

在《四书或问》中，朱子将所穷之理概括为“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①。然而《朱子语类》卷十七又载：“或问‘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后来看得，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见得不容已处，则自可默会矣。”^②由此可知，“所当然”之“不容已”当中已经包含了“所以然而不可易”的意思。在《答陈安卿》三（“泰伯篇”）中，针对陈淳“所以《大学章句》、《或问》论难处，惟专以当然不容已者为言，亦此意”的理解，朱子答曰：“《大学》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后来看得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得不容已处，即自可默会矣。”^③这则答问，与前引《语类》一则文字基本一致。按《答陈安卿》三作于1191年^④，距《大学或问》成篇已逾十载^⑤。朱子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所以然、所当然、自然、必然等概念，是理解朱子天理观的关键。考虑到现代汉语语境的巨大变化，重新梳理这些概念在朱子哲学话语中的含义，考察其中的古今之异，对于更深入、准确地把握朱子的天理概念将是不无裨益的。

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28页。

②[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84页。

③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37页。

④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44页。

⑤《大学或问》的成篇时间，应该与《论语或问》、《孟子或问》的完成相去不远。参见《朱子全书》第6册，第492页。

一、天运有差

认识到天运有差的问题，显然与历法有关。历代制作历法的尝试，都无法做到与天体的运行完全一致。对此，朱子说：

只有季通说得好，当初造历，便合并天运所差之度都算在里。几年后差几分，几年后差几度，将这差数都算做正数，直推到尽头，如此庶几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个大统正，只管说天之运行有差，造历以求合乎天，而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会有差，自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此说极是，不知当初因甚不曾算在里。^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运有差”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换言之，天行之差是符合天理的。朱子对蔡元定有关历法的观点的评价，《朱子语类》中有另一则记载，与此正好相反：

季通尝言：“天之运无常。日月星辰积气，皆动物也。其行度疾速，或过不及，自是不齐。使我之法能运乎天，而不为天之所运，则其疏密迟速，或过不及之间，不出乎我。此虚宽之大数纵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无定，自无差也。”季通言非是。天运无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处亦是常度。但后之造历者，其为数窄狭，而不足以包之尔。^②

与前引一则不同在于，朱子明确地表达了对蔡元定的批评。但细致比较将会发现，两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其一，天之运行是有差的；其二，天行之差自有其常度。天运之差既有常度，则造历时将此常度算入其中，就应该可以与天体运行相一致了。但朱子又明确指出“后之造历者”的问题在于“为数窄狭”。关于“阔”和“窄”的问题，朱子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或问：“康节何以不造历？”曰：“他安肯为此？古人历法疏阔而差少，今历愈密而愈差。”因以两手量桌边云：“且如这许多阔，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阔，便有差。不过只在一段界限之内，纵使极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推测；便有差，容易见。今之历法于这四界内分作八界，于这八界内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则差数愈远。何故？以界限密而逾越多也。”^③

从这则议论可知，朱子并不认为可以完全精确地计算出天行之差，只是要这差误落在预先确定的界限内。这样的好处在于容易推测，差处也易见。天之运行既然无法完全精确地计算，则根本上讲还是无定的。朱子之所以不能完全认同蔡元定“天之运无常”的说法，恐怕还是考虑到了天之运行的确定性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简单强调“天运无定”，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人的生活经验中最具确定性的东西。所以，一方面要看天之行度的无定，又要看到其差错当中的“常度”。事实上，天之运行既在大化流行的总体当中，其“无定”是理所当然的：

问：“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天运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④

朱子并不认为地是不动的。地随天而转。只是人在地中，无法觉察其运动而已。天行有差，以致地亦有差。

二、不齐

始终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中的实然世界，自然有种种“不齐”：

①②③④[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213、25、2213、2212页。

又问：“一阴一阳，宜若停匀，则贤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驳杂，如何得齐！且以扑钱譬之：纯者常少，不纯者常多，自是他那气驳杂，或前或后，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阴或晴，或风或雨，或寒或热，或清爽，或鹮突，一日之间自有许多变，便可见矣。”又问：“虽是驳杂，然毕竟不过只是一阴一阳二气而已，如何会恁地不齐？”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两个单底阴阳，则无不齐。缘是他那物事错揉万变，所以不能得他恰好。”^①

如果天地间只有“两个单底阴阳”，即使相互作用、感应，也不会生出不齐之物。但天道生生不已，阴阳总在不断相互转化当中，阳之动必生阴之静，阴之静又感应出阳之动，无尽日新的阴阳两体，“错揉万变”，所以不可能有完全“恰好”的事物。

气的世界的“不齐”，有方方面面的体现。当然，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德福之间的不一致上：

问：“夫子不答南宫适之问，似有深意。”曰：“如何？”过谓：“禹稷之有天下，羿羿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终身为旅人是也；亦有恶如羿羿而得其终者，盗跖老死于牖下是也。凡事应之必然，有时而或不然。惟夫子之圣，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为其所当为，而不计其效之在彼。”（蜀录云：“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学者之心，惟知为善而已，他不计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圣人不能如是。”）曰：“此意思较好。”^②

“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不是朱子本人的话，是弟子王过的体会。从朱子的回应看，他是认同王过的观点的。这里的“凡事应之必然，有时而或不然”，提示出道学话语中的“必然”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客观规律的必然之间的不同。有一物则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关联的某一物，或做这事儿就必定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的必然在两宋道学的世界观里是不存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笼罩性影响，根本上宰制了当代人的世界观。自然科学的规律被普遍当作必然的铁律。而实际上，自然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并没有在思理的层面上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证明。

三、所以与所以然

自程子以“所以”强调性地区分形上、形下，“所以”和“所以然”就成为天理概念的基本内涵。然而，“所以”一词在朱子哲学话语中的具体含义，仍然有含糊之处。“所以”一词在朱子那里，大体上有三种用法：其一，引出某一现象的原因。如，“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溃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③其二，用以、用来之义。如，“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书所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其何可废！”^④其三，决定义。如，“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⑤最后这种用法是理解天理概念的关键，但“决定”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决定”，还有待深思。

在朱子那里，“所以然”基本上都是与知相关联的：

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

①②③④⑤[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9～80、1121～1122、23、176、87页。

然矣。^①

这则语录中的“所以然”指道德规范的根据和自然现象的原因，是格物致知的目标。在朱子看来，道德实践能否真正落在实处，是由知的深浅决定的。“所以然”更多地指向道德行为背后的根据。“所以然”既然是知的内容，其中虽然包涵对天理的认识，但严格说来，我们不能说天理就是万物的所以然。因为天理并不依赖于人的认知。

“所以然”有时也被表达为“所以当然”。在解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时，朱子即将“天命”解释为“事物所以当然之故”：

又云：“天命处，未消说在人之性。且说是付与万物，乃是事物所以当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须知父子只是一个人，慈孝是天之所以与我者。”^②

既然强调天之“付与”，“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就有了普遍、决定的意思。

四、当然与自然

朱子讲“当然”，常与“自然”关联在一起：

（炎录云：“天下事合恁地处，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带得安之理来；“朋友信之”，是他自带得信之理来；“少者怀之”，是他自带得怀之理来。圣人为之，初无形迹。季路颜渊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络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带得此理来。^③

“合恁地处”即是“当然”。而天下事的“当然”就是“自然之理”的体现。“穿牛鼻，络马首”是对待牛、马的“当然”，同时也就是牛、马的“自然”。“自然”又有“必然”之义：

（砾录云：“毕竟是阳长，将次并进。”）以至于极，则有朋来之道而无咎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消长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处阴之极，乱者复治，往者复还，凶者复吉，危者复安，天地自然之运也。^④

在朱子的哲学中，阴阳消长最具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因此，此处的“自然”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必然义的。在后面的讨论中，会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对于《周易·节卦·彖传》中的“天地节而四时成”，朱子有一段值得注意的阐发：

天地转来，到这里相节了，更没去处。今年冬尽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这里厮匝了，更去不得。这个折做两截，两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节，初无人使他。圣人则因其自然之节而节之，如“修道之谓教”，“天秩有礼”之类，皆是。天地则和这个都无，只是自然如此。^⑤

“到这里厮匝了”是说进入到了一个往复循环当中。“更去不得”的说法，与朱子讨论无极、太极之“极”时的话基本一致：“无极之真是包动静而言，未发之中只以静言。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没去处。濂溪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如‘皇极’，亦是中天下而立，四方辐凑，更没去处；移过这边也不是，移过那边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凑到这里。”^⑥天运循环的“更去不得”与太极、无极之“极”的“更没去处”，皆是“自然”。这里的“自然”，无疑更具必然的意味。朱子既强调“自然之节”是“无人使他”的，则“自然”就有不为别的因素支配和影响的意思。这对于我们理解朱子哲学中的必然义和主宰义是

①②③④⑤⑥[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14、552、757、1789、1866、2369页。

极有帮助的。在朱子与其弟子的讨论中，有时也用“合当如此”说“当然”：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①

这段话是朱子弟子杨道夫所说。从朱子的回答看，朱子只是对其中“天地无心”的说法有保留。“四时行，百物生”是天道之必然，杨道夫却将其理解为“合当如此”。由此可知，“当然”也有必然义。

五、不容己与必然

朱子说“不容己”，大体上有两种含义：其一，不应该不如此；其二，天运自然意义上的不得不如此。后一种含义更具哲学的意义：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所谓‘不容己’，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趲，如何住得！”^②

这里谈到的“不容己”有非常突出的必然的含义。这种必然意义上的“不容己”在朱子论及历史的理势时，是与“自然”“必然”等概念完全等同起来的：

问：“其所阙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损，固事势之必然。但圣人于此处得恰好，其他人则损益过差了。”曰：“圣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极盛，故秦兴必降杀了。周恹地柔弱，故秦必变为强戾；周恹地纤悉周致，故秦兴，一向简易无情，直情径行，皆事势之必变。但秦变得过了。秦既恹地暴虐，汉兴，定是宽大。故云：‘独沛公素宽大长者。’秦既鉴封建之弊，改为郡县，虽其宗族，一齐削弱。至汉，遂大封同姓，莫不过制。贾谊已虑其害，晁错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谊之说施之武帝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无非划削宗室，至此可谓极矣。晋武起，尽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势，不得不然。”贺孙问：“本朝大势是如何？”曰：“本朝监五代，藩镇兵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齐困弱，靖康之祸，寇盗所过，莫不溃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情弛之余，势有不容己者，但变之自不中道。”^③

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子厚论封建是否？”曰：“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辨之者亦失之太过。如廖氏所论封建，排子厚太过。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④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得不然”的“事势”或“自然之理势”与“不得已之势”的区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就有个“想做而不能做、不想做却偏又不得不做”的被动意思。之所以有此被动，是仅仅知道历史趋势的无法阻挡，而不知其中的义理之当然。“不得不然”则是真实见到了历史趋势中的“当然”。比如封建，是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对“有功”者、“有德”者、“有亲”者

①②③④[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413~414、599、3303页。

合当有的德义，不是仅仅出于力所不及和治理的需要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至于周末文盛柔弱变而为秦之简易强戾，秦之暴虐转为汉之宽大，则是极则必反的必然之理的体现。到了这里，“更去不得”，所以只能转向相反的方向。

在充满各种“不齐”的气的世界里，阴阳之间的循环消长是“天生自然铁定”^①的。天理就是这“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的“所以”：

问：“屈伸往来，气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来者，是理必如此。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其所以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者，乃道也。”^②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若只言“阴阳之谓道”，则阴阳是道。今日“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也。“一阖一辟谓之变”，亦然。^③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朱子哲学话语中“所以”几种含义。这里的“所以”应该是决定的意思。朱子特别指出《易传》所说的不是“阴阳之谓道”，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的道或理是一阴一阳循环不已的决定者、主宰者。值得深思的是：这里的决定和主宰是什么意义上的呢？理又是如何主宰和决定气的流行的呢？

六、主宰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朱子论及天理的本质的相关概念——“当然”“自然”“必然”“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交互使用的，且都有与“不容已”和“不得不”的意思关联起来的用法。而这样一种必然的意味又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必然不同：

问：“‘道不可离’，只言我不可离这道，亦还是有不能离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离底。

纯说是不能离，不成错行也是道！”^④

道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必然。如果是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必然，就根本谈不上对错了。朱子所说的“不能离”，只能在无法摆脱的形式和倾向的意义上来理解：

问：“‘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中要识得真与妄耳。’真、妄是于那发处别识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视听、思虑、动作皆是天理。其顺发出来，无非当然之理，即所谓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虽是妄，亦无非天理，只是发得不当地头。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为草木固无以异，只是那地头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之意。”^⑤

“妄者”也是自然倾向的体现，也具有当然的形式，只是发在了不恰当的地方。当羞恶时全无羞恶之心，不当羞恶处却羞恶了。以行道为志向，却以恶衣恶食为耻。羞恶之心是人普遍的自然倾向、善的具体形式之一，发错了地方，就流为恶了。

基于对“必然”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朱子所说的“主宰”的真正含义：

“不窥密”，止“无测未至”。曰：“许多事都是一个心，若见得此心诚实无欺伪，方始能如此。心苟涣散无主，则心皆逐他去了，更无一个主。观此，则求放心处，全在许多事上。将许多事去拦截此心教定。”^⑥

“主”就是不受他者影响和左右，就有个“定”的意思。而“定”就是“不易”，也就是保持自

①②③④⑤⑥[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53、2437~2438、1896、1498、2452、2249页。

身的同一。而“定”和“不易”又不是僵死的、无变化的，反而是在变化当中，方能恒常的。朱子论《恒》卦曰：

《恒》非一定之谓，故昼则必夜，夜而复昼；寒则必暑，暑而复寒，若一定，则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今日道合便从，明日不合则去。又如孟子辞齐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馈，皆随时变易，故可以为常也。^①

恒常贯通于变易。或者说，同一是贯通在差异的不断作用和产生当中的。普遍和必然的同一，不受不断产生的差异的影响和左右。

七、理、神与一

在朱子的哲学里，理是主宰者：

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②

问：“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未有人时，此理何在？”曰：“也只在这里。如一海水，或取得一勺，或取得一担，或取得一碗，都是这海水。但是他为主，我为客，他较长久，我得之不久耳。”^③

在天或理与人的关系中，人是被动的。这一被动性根本上源自天对人的“付与”。在朱子那里，天或理的主宰义、主动义和恒久义是确定无疑的。理与神是同等层次的概念。当然，这里所说的神不是“鬼神”这个概念层面的神：

问：“所谓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④

理作为形而上者，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⑤神妙万物。昼夜、阴阳皆为神所变，而神却并不为昼夜、阴阳所变：

问：“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曰：“此说‘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此自有个神在其间，不属阴，不属阳，故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且如昼动夜静，在昼间神不与之俱动，在夜间神不与之俱静。神又自是神，神却变得昼夜，昼夜却变不得神。神妙万物。如说‘水阴根阳，火阳根阴’，已是有形象底，是说粗底了。”^⑥

神既不为昼夜所变，则是始终如一的。“神又自是神”，神贯通于一切对立的两体当中，始终自身同一。朱子对张载的“一物两体”说极为赞赏，以为“‘神化’二字，虽程子说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来。”^⑦对于张载的“一故神，两故化”，朱子阐发说：

两所以推行乎一也。张子言：“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推行于一。”谓此两在，故一存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或几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后，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后一段，此便是两。如寒，则暑便在其中；昼，则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⑧

“先”的自身同一，已包含“后”。“寒”的自身同一，已包含“暑”。一切差异皆是对立的两体的体现，而对立的两体在各自的自身同一中，已必定包含对方。“一”不是独立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体之外的“一”。无分别的“一”只能是始终处在无分别的僵死状态，这样的“一”并不存在。“一”只是对立的两体各自的自身同一。而两体中的任何一方的自身同一，同时就意味着对立一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821、4、2、2404、2403、2403、2512、2512页。

方的存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①

动静、阴阳并没有一个开端，所以，程子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对此，朱子明确说道：“这不可说道有个始。他那有始之前，毕竟是个甚么？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坏了后，又恁地做起来，那个有甚穷尽？”^②有形之物即使大如天地，终有坏灭。然而，坏灭并不是一切对立和差别的消失。所以，朱子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③这里所说的“水火”，应该只是阴阳二者。阴中涵阳，则有水之象；阳中涵阴，则有火之象。无穷无尽的大化流行，只是相互依存的对立两体的相互作用和转化的体现。然而两体之“立”，又各是其自身同一的体现：“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个，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尔。”^④

阳之自身同一必以阴为条件，反之亦然。所以，对立两体各自的自身同一，又是对立一方的自身同一的根本。由对立的两体构成的无限差异“推行乎此一”。无限的差异各自的自身同一相互感应、作用，就产生出万变“不齐”的世间万有。天理不是别的，就是遍在于对立的两体以及由两体构成的无限差异的“一”，所以朱子说：“若理，则只是个洁净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⑤所谓的“洁净空阔”，就是纯一无杂之义。理不是别有一物，“分付”和“主宰”万物。理只是一切差异和存有的自身同一。实有的世界虽然万变“不齐”，但总体而言又自有其“定”处：“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⑥这“定”处，就是万有之自身同一的体现。

八、结语

朱子的形上学思想与程子、周子的渊源，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受到了充分的关注。而关于朱子对张载的本体论的汲取，也许是囿于理本与气本的僵化分别，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张载的本体论建构，朱子一方面继承了程子对“清虚一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一物两体”的思想做了创造性的深入阐释和发展。而这一深化、发展对于朱子的天理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朱子的哲学中，气的世界里的具体存有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必然规律。换言之，气的世界在根本上是“不齐”的；其二，对立的两体（如阴阳、动静）之间的消长、转化的必然性，其实是理的必然性的体现。消长、转化是永恒和必然的，而具体的过程则是或然的、没有确定性的。其三，天理作为形上者，其实就是一切层面的存有和一切存有的层面自身同一的倾向。对立的两体的每一方在维持其自身同一的同时，也在维持其对立面的自身同一。在这个意义上，同一和差异是互为条件的。由此而来的大化流行的统体，才能维持其变化和生生的自身同一，才能永恒变化、生生不已。天理就是“洁净空阔”的“一”。这“一”遍在于一切差异和变化当中。一切差异和变化都是“一”的推行和实现。天理的主宰义和决定义即在于此。“所以”“当然”“必然”的根本义涵亦根源于此。

作者简介：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杨 中】

①②③④⑤⑥[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511、2377、2512、7、3、4页。

为什么中国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

——基于亨利·乔治定理的一个理论分析

王智波

[摘要] 本文提出中国之所以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是因为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所谓土地财政是指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通过获取农地转用增值，收回基础设施投资。本文根据亨利·乔治定理证明：在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人均收入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农地转用增值等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因此，土地财政是以帕累托最优方式界定农地转用增值的分配，是使用者付费。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在中国式分权理论框架下，将中国经济奇迹解释为“把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融资方式搞对”。

[关键词] 土地财政 中国式分权 城市化 亨利·乔治定理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59-11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22%上升到2014年的54.77%，每年有一千多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以至于国外游客常常会赞叹中国城市宏大的建筑、先进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风格。从价值量上看，Arcadis发布的《全球建筑资产财富指数2015年报 (Global Built Asset Wealth Index 2015)》报告，截至2014年，中国建筑资产存量达到47.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36.8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自2000年以来的建筑资产累计投资达到33.0万亿美元，超过同期所有其他经济体的总和^①。从实物量看，《钢铁年鉴2014》报告：中国2013年钢铁产量是美国同期的9.46

^{*}本文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居民收入分布极化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号：2016A030313429）的阶段性成果。

^①The Arcadis, Global Built Asset WealthIndex2015, https://www.arcadis.com/media/5/E/6/%7B5E69E0DE-1B61-4608-A2E9-9FE45A405D95%7D9385_Global%20Built%20Asset%20Wealth%20Index%202015%20WEB%2032pp.pdf

倍^①；盖茨笔记(Gates Notes)记录，“2011—2013年三年水泥消耗量比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消耗量还要多出46.6%”^②。这样看，宣称中国拥有更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是有事实基础的。

本文试图解释尚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为什么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与本文主题相同的研究有张军等^③，他们将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原因解释为“中国式分权”，认为以经济增长指标为标尺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激励着中国的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由于基础设施是最容易度量的“标尺”，因此，地方官员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资基础设施。不过，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产生了正确的激励，但是如果没有配套资金支持，那么，地方政府将无法完成投资。从国外情况看，联邦体制中的地方官员，在选民的压力下，同样有动机改善基础设施，问题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使之达到与中国相同的水准。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式分权”不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拥有更好基础设施的关键因素，至少不是唯一因素。本文提出，中国之所以拥有更好基础设施是因为地方政府实施了“土地财政”。2000年以后，急剧膨胀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为政府主导城市化注入强大的财力^④，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快速整体推进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以及旧城再造。这是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不仅还清历史欠账，还超前建设了市政道路、轨道交通、地下管廊、高速公路、机场、桥梁、产业园区和行政中心的原因。

所谓“土地财政”是学术界对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相关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的称呼。在中国财政管理体制中，土地财政收入是全额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扣除成本性支出之后，土地出让收入的纯收益只能用于城市建设支出。在本文中，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征用农地，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改善基础设施，引导产业聚集；通过高价出让商住用地，补偿征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集聚要素的支出。本文将根据亨利·乔治定理(Henry George Theorem, HGT)，证明在政府主导城市化中，农地转用增值等于城市基础建设投资支出是实现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一阶必要条件，并由此推论，土地财政没有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它以促进帕累托最优的方式界定产权。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⑤⑥}，那么，本文在理论上的一个可能的边际贡献是，在中国式分权理论框架下，将中国经济奇迹解释为“把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融资方式搞对”。本文的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背景，介绍中国的经济体制、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财政历史沿革；第三部分是理论基础，评介相关文献；第四部分是理论模型，证明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中，土地财政是亨利·乔治定理在现实世界里的成功应用；第五部分回应了学术界对土地财政的批评；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①根据世界钢协(world steel association)出版的《钢铁年鉴2014》(Steel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82199.02万吨，美国钢铁的产销量是8687.8万吨。

②Bill Gates, Have You Hugged a Concrete Pillar Today?Gatesnotes, The blog of Bill Gates, June 12, 2014, <https://www.gatesnotes.com/Books/Making-the-Modern-World>。

③张军、高远、傅勇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④欧美国主要使用税收、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和市政债券支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实际是上级政府的税收，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也需要用税收偿还。因此，税收是美国等西方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⑤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Vol. 98(5), pp.103-125.

⑥Gramlich, E. 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Vol. 32, pp.1176-1196.

二、研究背景

(一)中国的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学术界称之为“中国式分权”。它不同于联邦制之处:政治权力和各级地方主官的人事任免权集中于上一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不同于计划经济之处:各级政府培育市场、依靠市场,而不是否定市场;同时,地方政府被赋予独立发展经济的职责。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经济增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硬性的指标占了相当大的权重。这被称为“官员晋升锦标赛”,它塑造了中国地方官员特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特质。Xu总结道,中国经济体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势的中央向地方各级官员提供了正确的激励^①。Li和Zhou的经验分析结果证实中国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为晋升而进行GDP竞争的行为^②。

(二)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

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的特点是地权分置:农民集体拥有农业用地的所有权,但没有将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权利;城市土地只能由国家所有。法律从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制度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③。由于法律规定非农建设只能使用国有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④,因此,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只能由政府将集体土地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再以招、拍、挂等形式向用地单位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⑤,由后者进行开发或流转。我们称这一土地管理制度为“农民集体土地的非农开发权国有制度”。这一制度导致农地转用增值归属于地方政府,由此产生土地财政收入。

(三)土地财政的历史沿革

土地财政是从1980年创建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⑥。创建之初,深圳是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缺少资金,拓荒者想到了“以地生财”的办法——与港商合作开发,将所获得的土地使用费和开发利润投入城市建设。这使得“昔日杂草丛生的罗湖小区,很快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商业、金

①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4), pp.1076–1151.

②Li, Hongbin and Zhou, Li-An,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Elsevier, 2005, vol. 89(9–10), pp.1743–1762, September.

③根据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在一定年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指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再转移,包括出售、交换和赠与等行为。

④引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⑤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于非农业建设”。

⑥有文献认为“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的“无奈之举”。分税制改革导致“财权上置中央,事权下移地方”,地方政府面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不得不推行土地财政——通过“掠夺之手”剥夺农民和市民——弥补财政收支缺口。我们认为,以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作为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无法解释1980年就存在的土地财政;也无法解释1994–1999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率的大幅下降的事实。对此的实证研究参见王智波、徐佳:《分税制是如何影响房价的?》,《世界经济文汇》,2018年第1期。

融中心”^①。时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吴南生同志这样评价罗湖小区建设：“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一实践，是深圳对全国的又一个贡献。建成罗湖小区，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仗就没有今天的深圳”^②。

在理论上，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实现土地的商品化经营和市场化配置是当时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对的一个难题。攻克这一难题的历史性突破是1987年深圳和上海试点在城市土地国有制不变的情况下，依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原则，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③。紧接着，1988年，全国人大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④。1990年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这标志着“土地财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然而，《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暂行条例》没有随之出台^⑤，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1998年《土地管理法》还一改初衷，禁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于非农建设。发生这一变故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实践有关。在这一时期，“房地产开发商、用地单位和农民集体组织自行谈判征地、购地”，导致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土地增值为房地产开发商获得，政府的城市建设资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以珠海为例，“1980-1986年，珠海市政府投入市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土地开发的资金共30多亿元（含外债）。但是政府通过房地产公司交税和上缴利润仅回收2556.6万元。”^⑥为解决城市建设资金不足问题，珠海市政府1991年6月建立了政府完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五统一”体制，即土地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和统一管理。1991年、1992年和1994年，中央三次在全国范围推广珠海经验^⑦。与之相关，1994年出台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明确规定政府是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唯一合法卖方，从而，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集体土地的非农开发权国有”制度。这标志着与土地财政配套的法律制度已经完备。

（四）学术界对土地财政的评价

学术界普遍对“土地财政”持否定的态度。数千篇文章指出“土地财政”的弊端有：（1）剥夺

①卜凡中：《我们房地产这些年》，浙江大学出版，2010年。

②吴南生：“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第Ⅱ部分：罗湖风波”，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1978-2008），广州数字图书馆<http://www.gzlib.gov.cn/ztOralHistory/16348.jhtml>。

③按深圳志史办王硕的报告，十三大以后，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参照香港等地的做法和经验，向中央提交了《关于选若干点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建议》。1987年7月，国务院主要领导批复，同意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纳入第一批试点城市。来源：王硕：《1987-1994年深圳特区的发展历程》，《中国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党史网<http://www.zgdsw.org.cn/BIG5/218994/219014/index.html>

④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中“禁止土地出租”的规定，在坚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同时，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修正案通过了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在《土地管理法》中删除了“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没收非法所得”的内容，增加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并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

⑤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案授权国务院制定“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暂行条例”。

⑥珠海国土局：《实施土地管理“五个统一”的体制提高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卷第1期，1992年，第68~70页。

⑦茹晴：《梁广大珠海为官16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①；(2)抬高房价，损害了购房者福利^②；(3)导致区域“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对经济、民生、社会乃至环保方面产生负面影响^③；(4)不具备可持续性^④；(5)通过土地抵押融资累积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⑤。

地方官员和学术界对土地财政的评价截然相反。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撰文称，“基于土地一级市场垄断的土地财政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土地财政的基础上。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近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没有地方政府大规模补贴地方工业。几乎所有大型工业项目，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大规模补贴，而补贴绝大部分来自于土地财政”^⑥。他对学术界的批评回应道：“不要轻言放弃一个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经济制度。现在一边倒地否定土地财政，是十分危险的。”^⑦

理论界与实务界分歧远未弥合，因而，有人据此将土地财政称为“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我们认为，赵燕菁对土地财政功能的解释接近事实，但是没有揭示土地财政的本质，因此，无法化解学术界对土地财政弊端的批评。本文试图根据亨利·乔治定理(HGT)规范的证明土地财政是使用者付费，它将导致帕累托有效，从而为土地财政建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理论基础与命题提出

城市基础设施是典型的地方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学术界对如何有效率的为地方公共产品融资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微观经济学认为，在给定个人偏好条件下，个人的边际效用与市场价格相等时，交换达到一般均衡。私人产品按照统一的价格出售，消费者通过数量调整来使价格与边际效用相等；公共产品的不可分性导致所有的消费者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由于人们偏好的不同，在相同数量上边际效用不同，因而，公共产品不存在帕累托最优的市场解。Musgrave指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的搭便车行为导致政府无法按偏好征收不同的税收，从而，征税为公共产品融资是无效率的^⑧。Samuelson从理论上证明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他说，“分散的价格体系不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优水平”，因而，“有必要尝试其他类型的投票机制或信号传递方式”^⑨。Samuelson关于使用投票机制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帕累托有效性的想法遭到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质疑。Stiglitz总结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显示问题，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支付往往

①蒋省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②LI Yong-le and WU Qun, "Land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Farmland Conversion for Non-agricultural Use: Assessment and Calculation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China Land Science*, 2009, 23(11), pp.45-49.

③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④王文剑、覃成林：《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管理世界》，2008年第1期。

⑤陈明：《土地财政的多重风险及其政治阐释》，《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5期。

⑥⑦赵燕菁：《放弃土地财政是自毁长城》，《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9月2日，第A06版。

⑧Musgrave, Richard A., "The Voluntary Exchange", *Theory of Public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53, pp. 213-237.

⑨Samuelson, Paul,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 1954, pp. 387-89.

有谎报偏好的动机；二是社会选择问题，即阿罗不可能定理；三是公共产品的管理，居民为选择合适的公共管理者而获取信息的积极性和公共管理者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要么没有，要么不完全。因而，与私人部门相比，公共部门没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①。在宏观经济学领域，Barro^②指出通过税收筹资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是无效率的，当资本被征税时，经济增长会下降。

一个颇具影响的解决方案由Tiebout提出。他认为如果居民能够在社区之间迁移，那么，对于地方公共产品而言，存在市场解。居民通过“用脚投票”显示出偏好，社区竞争类似于厂商竞争，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③。Stiglitz指出Tiebout模型缺乏现实性。如果居民的偏好是异质的，Tiebout模型要求社区的数量与居民类型数量一样多，以至于公共产品实质上变成了私人产品，才会导致帕累托最优^④。Banzhaf and Walsh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由环境质量导致“用脚投票”机制是存在的，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居民的迁移是因为公共产品的差异^⑤。Tiebout模型的根本缺陷在于忽略考虑空间因素。在“用脚投票”的空间模型中，如果社区在公共产品、政府效率、工作机会或者税收等方面存在任何差异都将因人口集聚而资本化在土地价值中；那么，除非对集聚所产生的级差地价征收充公性质的税收，并以此支付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否则，Tiebout模型仍然是无效率的。当然，沿着这一逻辑，Tiebout模型就转化为亨利·乔治定理（HGT）。

HGT被称为地方公共产品融资的“黄金规则”，由Stiglitz^⑥、Arnott和Stiglitz^⑦首先提出并命名^⑧。他们认为，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是由地方公共物品引起的，并且城市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级差地租等于公共支出。这时，对总级差地租征收充公性税收为公共产品融资，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他们的模型中，最优的城市规模可以由总地租等于公共物品的支出来刻画。

①Stiglitz, J.E., "The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iebout: A Perspective." *Local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The Tiebout Model after Twenty-five Years*, Academic Press, 1983. pp. 17-53.

②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Vol. 98(5), pp.103-125.

③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4, Issue 5 (OCL, 1956), 416-424.

④Stiglitz, J.E. "The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iebout: A Perspective." *Local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The Tiebout Model after Twenty-five Years*, Academic Press, 1983. pp. 17-53.

⑤Banzhaf, H. Spencer and Randall P. Walsh, "Do People Vote with Their Feet? An Empirical Test of Tiebo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Vol. 98(3), pp.843-63.

⑥Stiglitz, J.E., "The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 In: Feldstein, M.S. and R.P. Inman (eds.) *The Economics of Public Services*. MacMillan, London, 1977. pp. 274-333.

⑦Arnott, Richard J and Stiglitz, Joseph E, "Aggregate Land Rents, Expenditure on Public Goods, and Optimal City Siz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Vol. 93(4), pp. 471-500.

⑧我们有必要指出HGT与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提出的单一税（single tax）理论的区别。亨利·乔治本人主张“Value capture”——社会发展和公众活动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应由政府获得供全社会使用，他认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足以废除其他所有的税收，此即单一税制理论。其依据是：（1）由地主获得土地增值是不公平的，单一税可以有效地改善公平；（2）对城市级差地价征收充公性税收是无扭曲的，不会阻碍资源配置。亨利·乔治没有预见到HGT。在HGT里，对级差地租征收充公性税收用于支付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是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是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对土地“涨价归公”，而不是因为公平或“涨价归公”不影响资源配置才对土地转用增值征收充公性税收。

本文将Stiglitz^①和Arnott和Stiglitz^②证明的HGT称为HGT第一定理,它关注的是公共产品的消费领域。HGT第二定理由Mirrlees^③、Starrett^④和Flatters et al.^⑤提出^⑥,他们关注生产领域的规模报酬递增,认为集聚与规模报酬递增有关,核心内容是在均衡—最优城市系统中,每一个城市的产品和劳动力按它们的竞争水平定价时,总级差地租正好补偿生产活动中所产生的损失。近期,Fu发展了一个动态HGT^⑦。Kawano研究了城市转型中的动态HGT^⑧。Behrens和Murata在垄断竞争环境中讨论了HGT的有效性^⑨。Behrens、Kanemoto和Murata证明了HGT在次优环境中的有效性^⑩。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证明中国的土地财政是HGT的应用实例。我们借鉴Mirrlees^⑪、Arnott和Stiglitz^⑫的建模思路,证明在中国特定情形,即居民由于进入城市时间不同而具有不同效用水平;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的目标是追求人均收入最大化而不是福利最大化的情形中,农地转用增值(即土地财政收入)等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仍是空间一般均衡的必要条件。

四、模型

(一)居民的行为

假设城市呈环状,工作区集中在圆心,生活区环绕工作区,城市外围是农地。城市由同质居民个体组成。个体的工资为 m 。假设个体使用公共交通作为通勤工具, f 是个体花费在通勤上的非货币性的体力、时间和拥挤产生的各种不舒适。令 t 为距市中心的距离,对任意给定的 t ,个体的效用 u 是消费 z 、土地居住面积 s 的增函数,是通勤 f 的减函数。对于给定的 z 、 s 和 f , u 是 t 的减函数。 $R(t)$ 表示居民在效用水平为 $\bar{u}$ 的条件下,愿意对城市中 t 处所支付的最大单位土地租金,空间经济学称之为竞租函数。当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大于保留效用即 $u \geq \bar{u}$ 时,个体持续进入城市。在上述假设下,如

①Stiglitz, J.E., “The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 In: Feldstein, M.S. and R.P. Inman (eds.) *The Economics of Public Services*. MacMillan, London, 1977. pp. 274–333.

②Arnott, Richard J and Stiglitz, Joseph E, “Aggregate Land Rents, Expenditure on Public Goods, and Optimal City Siz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Vol. 93(4), pp. 471–500.

③Mirrlees J. A., “The Optimum Town”, *The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2. Vol. 74, No. 1, pp. 114–135.

④Starrett, D., “Principles of optimal location in a large homogeneous area”,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9, 1974, 418–48.

⑤Fujita, M. and J. F. Thiss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⑥这三篇文章并没有使用HGT定理命名自己的发现。

⑦Fu, S., “Essays on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Ph.D. thesis, Boston College, 2005.

⑧Kawano, M., “Henry George Theorem in a Dynamic Framework Without Accumulation of Public Goods”.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92, 2012.

⑨Behrens, K. and Y. Murata, “City size and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9, Vol. 65, pp. 228–235.

⑩Behrens, K.; Kanemoto, Y and Murata, Y.,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in a second-best worl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5, Vol. 85, pp. 34–51.

⑪Mirrlees J. A., “The Optimum Town”, *The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2, Vol. 74, No. 1, pp. 114–135.

⑫Arnott, Richard J and Stiglitz, Joseph E, “Aggregate Land Rents, Expenditure on Public Goods, and Optimal City Siz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Vol. 93(4), pp. 471–500.

果同质个体是在不同时间点进入城市,那么,先进入城市的个体会选择离工作区更近的地点居住,而后进入城市工作的个体不得不在更远的地点住居,他们因此会承受更多的通勤成本。同质的个体由于进城先后不同而效用水平不同,这一情形符合中国城市的现实。

我们以 $c \cdot f$ 表示通勤成本的货币价值, c 是折算系数。代表性个体的最优问题可表示如下:

$$\begin{aligned} \max_{z,s,t} & u(z(t), s(t), f(t)) \\ \text{s.t.} & z(t) + R(t)s(t) = m + cf(t), u \geq \bar{u} \end{aligned} \quad (1)$$

构造Lagrange函数,由Karush-Kuhn-Tucker条件可解出

$$u_z = \lambda \quad (2) \quad u_s = \lambda R(t) \quad (3) \quad R(t) = u_s / u_z \quad (4) \quad c = -u_f / u_z \quad (5)$$

式中,下标表示偏导数, λ 是Lagrange乘子,表示收入的边际效用。

(二) 迁移均衡与城市均衡

假设经济体的生产只使用劳动,设城市人口为 N ,城市生产函数为 $Y(N)$ 。按Starrett (1974)、Fujita和Thisse (2002)的证明,在空间均衡中,工资等于边际产量,即 $dY/dN = Y'(N) = m(N)$ 。假设城市存在集聚效应 $m_N > 0$,农村不存在集聚效应,令个体在农村的收入为 y 。

当个体由农村进入城市,他的收入增量为 $Y'(N) - y$ 。假设农村土地租金和通勤成本为零,则 $R(t)$ 就是城市居住用地和农村农业用地的级差地租,在现实世界中,它是农地转用收益。在人口可迁移的条件下,若个体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效用增加,那么,更多居民将进入城市。在迁移均衡时,迁徙者从收入增加得到的好处必然被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上升所抵消,即

$$Y'(N) - y = R(t)s(t) + cf(t) \quad (6)$$

个体迁移处于均衡意味着城市体系也处于均衡。这时,没有人能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或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获得更高的效用;同时,城市也不能从规模报酬递增中获得福利的改善。

(三) 官员“经营城市”

一般而言,个体感受到的通勤成本 $f(t)$ 与城市基础设施 P 负相关。在晋升竞赛中,地方官员们以人均收入最大作为目标,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如修建立交桥、快速路和轨道交通等),减少通勤成本,引导人口流向城市,直到集聚效应使得城市人均产出实现最大化。

(四) 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生产

设 $\bar{t}$ 是城市的边界,则

$$N = \int_0^{\bar{t}} 2\pi t / s(t) dt$$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生产函数有如下特征

$$Y'(N) \geq Y(N)/N, \text{ 如果 } N \leq N^* \quad (7)$$

设 $D(t)$ 表示相对人口密度梯度,单位化 $D(t)$ 使得 $\int_0^{\bar{t}} D(t) 2\pi t dt = 1$,即 $D(t) = 1/Ns(t)$ 。

假设所有城市居民消费的 z 和城市基础设施 P 全部由城市生产提供,即

$$Y(N) = \int_0^{\bar{t}} z(t) ND(t) 2\pi t dt + P \quad (8)$$

(五) 人均产出最大化的一阶必要条件

由生产函数一阶必要条件可知, $Y'(N) = Y(N)/N$ 时,人均产出实现最大值。将式(8)代入 $Y'(N) = Y(N)/N$,得

$$\frac{d}{dN} \left[\int_0^{\bar{t}} z(t) ND(t) 2\pi t dt + P \right] = \frac{1}{N} \left[\int_0^{\bar{t}} z(t) ND(t) 2\pi t dt + P \right] \quad (9)$$

$$\text{化简, 得 } \int_0^i \frac{dz(t)}{dN} ND(t) 2\pi t dt = \frac{1}{N} P \quad (10)$$

其中 $dz(t)/dN$ 表示, 在 t 处, N 的一个无穷小的增加所带来的 z 的增量。如前所述, 人均收入最大时, 通勤成本产生的负效用被城市基础设施改善所消解; 同时, 当城市规模处于均衡时, 个体效用不受城市人口变化的影响, 这意味着

$$u_z \frac{dz(t)}{dN} + u_s \frac{ds(t)}{dN} = 0 \quad (11)$$

将式(11)和式(4)代入式(10), 消去 $1/N$, 得

$$P = \int_0^i R(t) 2\pi t dt \quad (12)$$

式(12)表明, 人均产出最大化的必要条件等价于基础设施投资支出等于总级差地租。这等于说, 在城市体系均衡时, 将总级差地租充公, 并由政府将之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是人均GDP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至此, 我们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的中国现实版——在晋升竞赛激励下, 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引导城市人口集聚, 当人均收入达到最大化目标时, 农地转用增值等于基础设施支出, 因此, 土地财政是城市体系均衡中人均收入实现最大化的一阶必要条件。

五、对批评的回应

(一) 土地财政剥夺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吗?

农地转用增值归属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没有剥夺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农民集体土地之所以可以转为城市商住用地, 是因为人口流入城市; 人口之所以流入城市是因为政府集聚了要素。按HGT, 当城市体系均衡时, 农地转用增值用于支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之后没有剩余。因此, 即使农民有能力自主城市化——自主投资基础设施, 集聚产业和人口, 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转用收益并不比政府给予的征地补偿高。

应该强调的是, 归属于政府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只能限于农地转用增值部分, 而农地本身的价值必须归属于农民。也就是说, 土地财政必须建立在对失地农民公平补偿和妥善安置的基础之上。所谓公平补偿是指按土地的农业机会成本足额补偿给农民并保证农民的福利不因征地而受损失。如果补偿水平低于土地农业机会成本或者农民因失地而丧失经济来源, 那么, 土地财政就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另外, 如果农民不愿意接受政府征地条件, 那么, 政府应该保障农民的土地耕作权。在农民没有违背契约——变更土地的农业用途的条件下, 政府也应该遵守契约, 不应强行征地。毕竟, 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是法治社会应该遵守的规则。

(二) 土地财政损害了购房者的利益吗?

对这个问题, 我们从两个方面看: (1)从形成机制上看, 土地财政不是税收, 没有强制性, 它是以人口流入城市和居民购买住房为前提。如果土地财政损害了居民或购房者的福利, 那么, 人口不流入城市或者居民不购买住房, 就没有土地财政。(2)从资金来源和使用去向上看, 土地财政的支付者是住房购买者, 土地财政的净收入也只能被用于城市建设支出, 使购房者受益。因而, 土地财政是使用者付费, 它不会损害购房者的利益。

（三）土地财政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吗？

在土地财政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会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从银行取得借款^①。如果地方政府或银行，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是硬预算约束，那么，按HGT，土地财政收入能够恰好抵偿城市建设融资产生的土地抵押贷款，土地财政不会导致地方债务危机。然而，目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商业银行都有软约束的问题。在晋升竞赛中，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无法遏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否实施土地财政，中国都存在过度投资导致债务担负过重的风险^②。

（四）土地财政会导致“竞次”吗？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式分权”的体制中，官员陷于“为增长而竞争”的囚徒困境。其纳什均衡策略是不顾及一切与增长无关的问题。因而，地方政府会减少对地区经济增长无直接贡献“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③；放松环境规制标准和劳动保护标准^④。结果，“中国式分权”将导致区域“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的发展模式^⑤。

我们认为，土地财政能够克服“中国式分权”导致的“竞次”。因为土地财政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土地增值，而土地增值离不开经济繁荣，环境宜居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健全。在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官员晋升竞赛中产生的所有外部性效应都将资本化在土地价格之中，从而，内生在土地财政之中。因此，土地财政不会导致“竞次”，倒是放弃土地财政，出现“竞次”的可能性更大。

（五）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

从收支途径来看，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但是，它不需要持续。当城市化完成之后，城市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农地转用，同时，也不再需要有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届时，中国的地方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其融资模式也应该由土地财政向房产税转型。通过房产税为城市化完成之后的基础设施更新改造融资还产生了一个额外的好处——衔接国有土地使用权期满后的续期问题。

（六）为什么现阶段不应该使用房产税取代土地财政？

简单说，因为土地财政是使用者付费，而房产税不是，因此，使用房产税取代土地财政为城市建设融资将导致无谓损失。具体如下：以土地财政为城市建设融资是使购房者在享受城市化的边际收益，同时承担城市化的边际成本；以房产税为城市建设融资则是由全体城市居民按住房价值支付购房者（新进入城市人口）所产生的成本（由新增城市基础设施需求来衡量），它将导致大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和与之对应的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本）的过度抽取。下图更进一步解释使用土地财政为城市建设融资与使用房产税为城市建设融资的差异。

①为规避“地方政府不得借款”的法律规定，政府往往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以土地为担保标的物或者明确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向银行取得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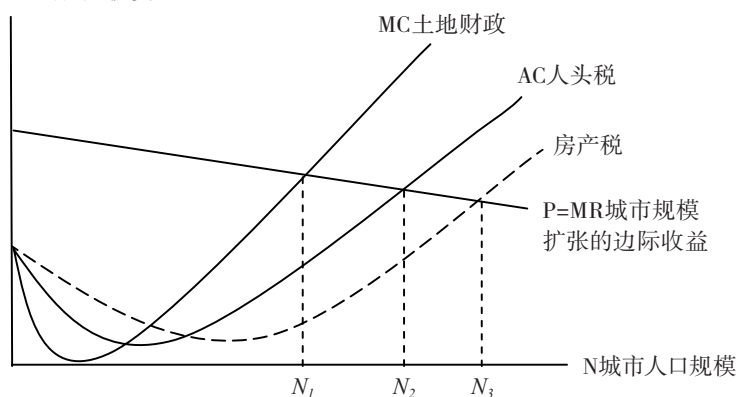
②当前，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对策是使用行政手段禁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举借土地抵押贷款。资料来源：财政部2016年2月下发《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③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④Tung Samuel, and Stella Cho,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hina: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ax Incentive Policy,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01(17).

⑤陶然、陆曦、苏福兵等：《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D基础设施投资



图：使用土地财政为城市建设融资与使用房产税为城市建设融资的差异

说明：图中横坐标N是表示城市人口规模，纵坐标D表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量。P是购房者愿意对基础设施支付的价格，MR曲线表示购房者对基础设施的边际收益。蒂伯特均衡（Tiebout, 1956）会让购房者实现 $P=MR$ 。 $P=MR$ 曲线向下倾斜向表示在给定基础设施水平下，购房者的边际收益与他所愿意支付的价格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少。MC曲线表示城市建设的边际成本，向右上倾斜是由于城市建设中的规模不经济（如高架桥的成本高于交叉路口），MC同时表示使用“土地财政”为城市建设融资模式。AC曲线表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均成本，同时表示使用人头税为城市建设融资模式。虚线表示以房产税为城建融资模式下新增住房承担的城建成本，它低于AC曲线的原因是新增住房往往在城郊，单位土地价格低于城区地价，因而，购房者通过缴纳房产税所承担的城市建设成本小于市民的平均成本。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提出中国之所以拥有更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因为实施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集聚水平，实现人均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获得农地转用增值，支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本文证明：当城市人均收入达到最大化时，农地转用增值收入等于基础设施投资，因此，政府实施土地财政将是城市化进程处于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由此，本文推论：土地财政明晰了产权，节省了交易成本，且没有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土地财政是使用者付费，它源于购房者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购买，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使购房者受益的事实。但是房产税不是使用者付费，在城市化进程尚未结束时使用房产税为城市建设融资将导致无谓损失。土地财政以要素集聚为前提，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效应都将资本化于商住用地的价值之中，因而，不会衍生出地方政府“竞次”。

当然，本文的结论“土地财政是保证城市化处于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其中两个关键假设的现实性需要引起特别关注。一是土地财政只能来自农地转用增值，农地的机会成本是农民长久生计来源，必须留给农民。二是政府和银行必须受到硬约束。软约束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和债务负担过重，从而产生债务风险。

作者简介：王智波，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006

【责任编辑 施洁】

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施 洁

[摘 要] 评价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和我国其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作用。本文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和内容解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深圳及我国其他五大城市近10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和分项指数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自2010年以来深圳高质量发展进入新的水平阶段,综合体现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协同统一;通过比较来看,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创新性是深圳最大的优势和特色,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状况优良,协调性还需提升,共享性是深圳最大的短板。文章建议要继续发挥深圳市场化领先优势、创新集群比较优势,更好发挥政府社会治理职能,助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关键词] 深圳 经济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 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70-0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迈向发达经济体的过程,通常都伴随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和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这种转变和提升,包括了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创新、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提升、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降低、民生福利和居民生活的改善等。深圳早在2010年便提出了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跨越,开始“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思路探索;“深圳质量”实现了城市迈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新阶段,成了更高水平和更可持续竞争力的发展保障。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的高水平状态(金碚;任保平,2018);是与一定高技术条件相适应的高质量要素投入、高质量要素配置、高质量产出供给,以及高质量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配套,是基于大道转换的能级跃升、基于培

育新增长点的结构性变革、基于经济系统的根本性改造（周振华，2018）。高质量发展最终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师博、张冰瑶，2018）。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体系、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是动态的、多维的和丰富的，高质量发展的测度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对经济发展质量做出科学的评判。现有文献对高质量发展的定量研究做出了一定努力，任保平、李禹墨（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和人民生活高质量；任保平（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应包括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等方面。金碚（2018）认为可以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因素进行科学量化和指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状况和成就的显示性指标。但文中都没有给出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具体方案。师博、张冰瑶（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发展的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层面和发展的生态成果层面；师博、任保平（2018）构建了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体系中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强度、稳定性、合理化、外向性以及人力资本、生态资本等六个维度指标。但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包括创新层面的指标，影响了科学评价的完备性。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该给予着重考虑。本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力求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和内在要求，突出时代特性，具体涵盖经济发展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五个维度，分别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驱动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和生态结果等五大方面，这样评价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完备；同时，在指标选取上力求简明扼要、避免指标间的高度相关性。

评价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和我国其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效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根据深圳的研究分析，对其他地区走符合自身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高质量道路具有借鉴意义。下文先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再对2006年~2017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和分析；为求评价全面客观科学，本文对2006年~2016年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重点城市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与比较分析，最后得到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体系设定

本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等5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下涵盖若干个三级指标，三级指标选择能反映高质量发展内涵、状况和成就的显示性指标。具体说明如下：

（1）有效性，反映经济资源利用的效率，包括人均GDP、地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该分项指数值高低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2）协调性，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的效果，包括总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该分项指标值高低反映了经济结构朝着更加平衡和合理方向优化的程度。（3）创新性，反映创新驱动发展的

水平,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多维指标。该分项指数值高低反映了创新的质量和水平,它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根本保障。(4)共享性,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包括分配状况、收入增长状况、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保障多维指标。该分项指数值高低反映了经济成果为社会所共享的水平。(5)可持续性,反映经济发展的生态结果,包括表征资源能源绿色高效利用,生态环保、环境友好的发展结果等多维指标。该分项指数值高低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成色。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编号	三级评价指标	单位	性质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	有效性	1	人均GDP	万元	+
		2	建成区单位产出	亿元/平方公里	+
		3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	+
	协调性	4	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	★(+)
		5	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	%	★(+)
		6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
		7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	+
		8	一般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	%	+
		9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	★(+)
	创新性	10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	+
		11	每万就业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万人	+
		12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件	+
		13	技术合同成交额/国内生产总值	%	+
		14	研发经费专利产出效率	件/亿元	+
		15	研发人员专利产出效率	件/千人年	+
	共享性	16	劳动者报酬占地区GDP比重	%	★(+)
		17	平均预期寿命	年	+
		18	(财政性)教育投入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	%	★(+)
		19	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	%	★(+)
		20	房价收入比	—	★(-)
	可持续性	21	万元GDP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
		22	万元GDP水耗**	立方米/万元	—
		23	单位产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吨/亿元	—
		24	单位产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亿元	—
		25	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值	mg/m ³	—

注:指标性质,“+”为正向指标;“-”为逆向指标;“★”为适度指标,因其最估值不易确定,目前暂按正(逆)向指标处理。带**指标,受限于数据可得,没有包括在城市比较指标体系中。

(二) 指数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1) 计算方法。本文采用Min-max标准化将数据标准化。对于正向指标,其公式为: $x' = (x - \min) / (\max - \min)$, 即新数据 = (原数据 - 极小值) / (极大值 - 极小值)。对于逆向指标,其公式为: $x' = (\max - x) / (\max - \min)$, 即新数据 = (极大值 - 原数据) / (极大值 - 极小值)。本体系二、三级指标权重,借鉴联合国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等权威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每一级指标采用相同权重。最后,采用加权加总的方法来形成总指数和各项二级指数。(2) 数据来源。主要数据来源于深圳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等六城市历年《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房价基础数据来自于《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建成区面积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与比较分析

(一) 2006年~2017年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与分析

2006年~2017年,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从48.9提升到87.0,年均增长达5%;总指数在2010年发生转折式上升、水平明显进步,由2009年的59.9提高到2010年的67.2。这主要得益于自2010年深圳提出并实施“深圳质量”发展战略以来,“深圳质量”战略逐渐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经济社会生态民生建设取得实质性转变。为了全面解析深圳经济这种阶段性转向,分别从高质量发展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等五个方面,阐释十余年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和基本趋势。

表2 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和各分项指数变化

年份 指数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高质量发展总指数	48.9	53.2	57.8	59.9	67.2	72.6	77.8	79.6	81.0	81.4	85.4	87.0
有效性指数	53.9	58.4	58.6	45.6	66.6	74.5	71.9	76.8	75.2	76.0	81.0	90.1
协调性指数	50.8	56.7	59.3	62.3	71.5	71.2	75.7	77.1	83.7	85.5	84.6	80.0
创新性指数	40.8	43.3	55.8	60.4	66.3	71.0	75.6	75.0	74.1	82.6	91.3	91.9
共享性指数	55.6	61.8	61.3	70.2	66.6	70.5	84.6	87.3	83.7	70.0	72.1	74.5
可持续性指数	43.2	45.6	54.1	61.0	65.0	75.6	81.3	81.8	88.3	92.8	98.1	98.2

1. 有效性指数分析 2006年~2017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有效性水平从53.9提高到了90.1,增长了67%;该分项指数从2010年前的50—70区间水平成功跃升至2010年后的70—90区间水平。在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自2011年达到峰值(0.85),此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深圳经济产出效率持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进步。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转向更加依赖技术进步、高质量要素投入以及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生增长道路上来。

2. 协调性指数分析 2006年~2017年深圳高质量发展协调性水平从50.8增长到了80.0,提升了58%;该分项指数呈现出“持续提高、近年来略有下降”的发展态势。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民营经济发达,快速增长的民间投资始终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支撑力量;深圳经济结构在破旧立新中经历了产业升级和主导产业重塑的过程,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好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断提高,外贸出口方式不断优化,总需求发生了结构性改善和质量提升,促进了协调性发展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多年来保持稳定,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这是协调性指数下行的的重要因素。这表明,深圳居民消费还有较大潜力可挖掘。

3. 创新性指数分析 2006年~2017年深圳高质量发展创新性水平从40.8跃升至91.9,提升了125%;该分项指数呈现出“持续飙升、间或回调”的变化特点,它是五个分项指数中变化最突出的一项。十多年间里,无论是创新投入,创新产出,还是创新效率都出现爆发式增长,这与深圳常年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主体地位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4. 共享性指数分析 2006年~2017年深圳高质量发展共享性水平从55.6增长至74.5,提升了34%;该分项指数呈现“上升—回调交替变化”的发展态势。作为新兴城市,公共事业和民生服务等共享供给曾经是深圳的短板。这十余年间,深圳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分配格局更加合理,人

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对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需求进一步满足。但同时也要看到，反映住房自给能力指标——房价收入比近年来呈现快速拉升态势，极大压缩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表明深圳在推动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作为空间。

5. 可持续性指数分析 2006年~2017年深圳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性水平从43.2增长至98.2，提升了127%；该分项指数呈现先快速提升，之后在高位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深圳曾经经历过粗放式增长阶段，也面临着发展的“四个难以为继”问题；深圳在2005年提出从“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转变，2010年提出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跨越，城市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工业污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这既反映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生态成果；同时也体现出政府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推动加速“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和淘汰，积极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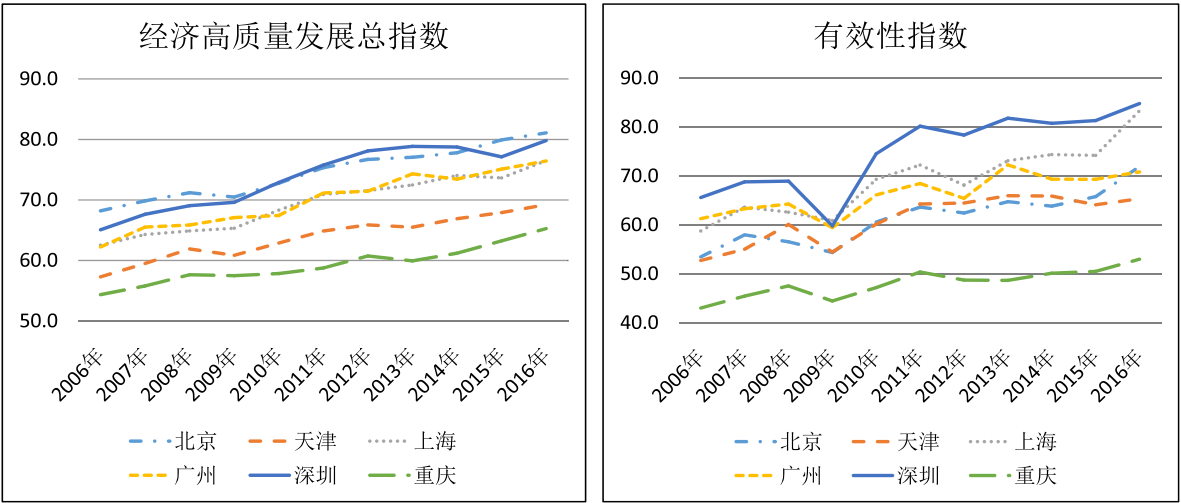
(二) 深圳与其他五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比较分析

利用上文相同方法，本文测算了深圳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六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结果发现，总指数整体上呈现出“北京和深圳领先，上海和广州持平，天津和重庆相对落后”的梯次分布格局。这里，分别从高质量发展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等五个方面，阐释十余年深圳等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和基本趋势。

表3 深圳与其他五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变化情况

年份 城市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北京	68.2	69.9	71.2	70.5	72.8	75.3	76.7	77.1	77.8	79.9	81.1
天津	57.3	59.5	61.9	60.9	62.9	64.9	65.9	65.5	66.9	67.9	69.2
上海	62.5	64.3	64.9	65.3	68.3	70.9	71.6	72.5	74.1	73.6	76.5
广州	62.2	65.5	65.9	67.1	67.4	71.2	71.4	74.3	73.5	75.1	76.4
深圳	65.1	67.6	69.1	69.6	72.9	75.8	78.1	78.9	78.7	77.1	79.8
重庆	54.4	55.8	57.6	57.5	57.9	58.8	60.7	59.9	61.2	63.2	65.3

注：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标，深圳的指数在横向比较时与纵向比较时数值并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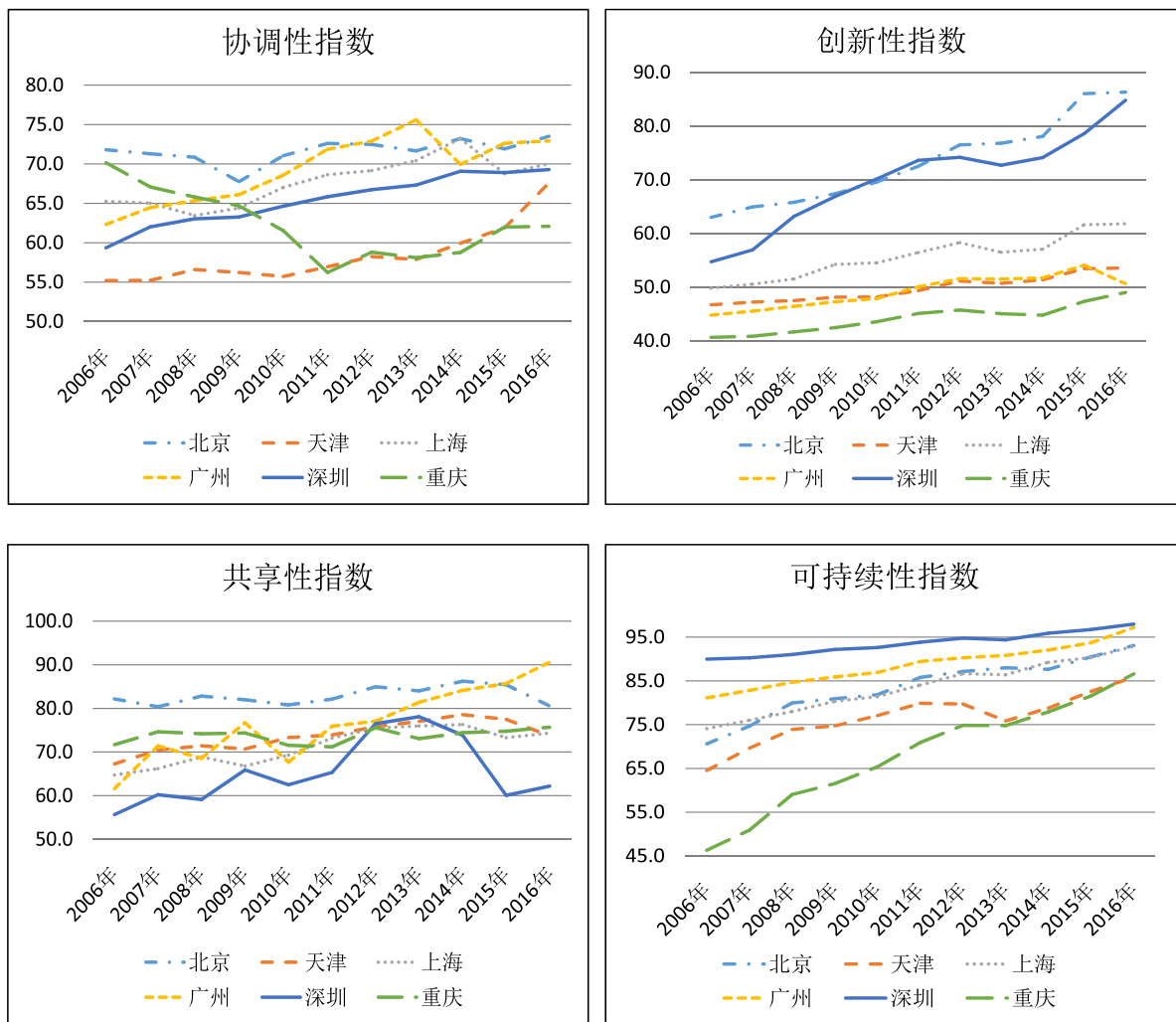


图1 深圳与其他五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及分项指数比较

1. 有效性指数比较 有效性指数，深圳水平领先（84.8），上海进步最快（83.3，年均增速达4%），北京广州较为接近（71.9和70.8），天津位居第五（65.3），重庆较为落后（53.0）。这种格局与六个城市的市场化进程程度是高度一致的（市场化水平，参见王小鲁等，2017）。通常情况，市场化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越趋向内涵和集约型，越有助于产出效率的提升。

2. 协调性指数比较 协调性指数，六城市发展差距相对较小，北京（73.5）、广州（72.9）和上海（70.0）以微弱优势领先深圳（69.3）、天津（67.6）和重庆（62.1）；但稳定性差异较大，增长态势相对稳定的是深圳和天津，广州、上海（重庆）都经历了上升（下降）之后的回调。从指数构成看，总需求方面，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上海是唯一在大多数年份超过40%的城市，深圳在大多数年份与北京、广州水平相当，但是近年来出现了明显下降，可能的原因是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空间造成了挤压。产业结构方面，代表高研发投入的高技术制造业，其比重深圳一直高于其他城市，反映出深圳现代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势；但服务业所占比重，深圳以较大差距落后于北京，略低于上海和广州。投资结构方面，天津民间投资占比以较大优势领先其他城市，深圳与北京、重庆水平接

近,均领先广州和上海。外贸结构方面,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深圳在大多数年份低于北京、上海和广州,只到2013年改善速度才明显加快,2016年追赶上广州,但仍然落后于北京、上海;这与深圳外贸出口体量远大于北京上海有很大关系。2016年,深圳出口总额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分别是北京的4.6倍和3.7倍,上海的1.3倍和1.2倍,导致深圳结构性比例并不占优势;而近年来深圳出口总额有所下降而一般贸易出口额保持上升态势,因此近年来外贸出口结构表现出明显的优化。消费结构方面,服务性消费占比六城市整体处于下降趋势,深圳水平相对落后,拉低了整体协调性发展水平。

3. 创新性指数比较 创新性指数,水平最高的是北京(86.3)和深圳(84.8);提升速度最快的是深圳(50%)和北京(40%),其次是上海和重庆(20%)。创新在六个城市中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对比高校科研院所集中、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深圳充分发挥了市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了产业技术创新及企业研发和新产品产业化上的发展优势。

4. 共享性指数比较 共享性指数,广州水平领先(90.6)、北京居中(80.6)、天津重庆上海基本相当(分别为77.5、75.7和73.3),深圳相对落后。在高质量发展五大分项指数中,深圳共享性指数排名末位,是深圳的短板所在。一方面,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虽然近年来做出诸多努力,但外来人口规模与城市本身相对薄弱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基础不匹配;另一方面,土地空间资源相对紧缺,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房价收入比也拖累了深圳经济发展的共享性水平。

5. 可持续性指数比较 可持续性指数,六城市发展水平快速收敛、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深圳(98.0)和广州(97.2)位居前两位、北京(93.1)和上海(92.9)居中,重庆(86.6)和天津(85.9)相对落后。按可持续性指数提升速度排序,依次是重庆、天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一方面,部分城市工业化起点较高、规避了走工业化发展老路,表现出环境友好的生态绩效和生态追赶上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将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作为全球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使城市环境质量总体稳步改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测算发现,自2010年以来深圳高质量发展进入新的水平阶段,综合体现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协同统一;通过比较来看,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创新性是深圳最大的优势和特色,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状况优良,协调性还需提升,共享性是深圳最大的短板。进入新时代,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以更加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1. 继续发挥市场化领先优势,以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制度创新,深圳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市场化水平相对领先,在投资领域形成了多元产权结构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动态格局,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效率提升、改革创新的重要支撑力量。要继续发挥市场化领先优势,推动改革开放向全领域、高层次、深水区推进,继续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公平,健全产权保护。一是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加强

资本投向引导,研究出台放宽市场准入、创新重点领域投资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发和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鼓励政企合作,尽快建立完善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工作推进机制。加快完善健全相关投融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鼓励企业通过债权、股权、资产支持等方式,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工程等领域的项目建设。二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围绕新经济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发展需求,探索打破制约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行政障碍,推进新经济领域的市场便利化政策;主动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加快完善以公平、平等为核心原则的产业政策体系,加快构建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隐性壁垒。

2. 继续发挥创新集群比较优势,以更高水平的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创新能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和根本动力。深圳历经40年产业调整和迭代,逐步转型为以高科技生产研发为主的创新型城市,深圳拥有“硬件硅谷”的称誉,与周边城市(香港)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特色创新集群。在一个开放式创新的时代,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企业的挑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发展自己的创新能力,同时获取和吸收其他人的创新。一是,强化布局重点基础性、源头性创新。完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技术创新及企业研发和新产品产业化整个创新链条和创新生态的建设,加大重点基础性、源头性创新投入,解决好企业的高新技术“源头活水”问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积极深化科技投入体制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二是,强化与全球领先科技的无缝对接,参与全球知识生产过程。依托深圳及时高效的制造业领先优势,抓住中美技术优势互补的机遇,迅速在专利、资本、制造和营销等层面构筑与美国科技成果对接的平台。加快建设多种类型的高端科技智库,系统、深入、实时地加强对全球领先科技资源动态的研究,并加强科技智库与制造业的联系,即时捕捉能将最新发明专利迅速转化的交易机会。三是,推动创新的产业基础电子信息制造业再工业化、再创新。以推进智慧化、智能化方向,推进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加快完善以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产业链。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将深圳打造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引领区和产业集聚区。四是,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发展具有当代领先、具有竞争优势又面向未来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的产业。围绕主导产业“补链”和“强链”,甄别深圳产业链中的关键或缺失环节,捕捉项目信息,锁定关键企业、重大项目、做强价值链。充分发挥对外投资,特别是科技投资在重塑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引擎作用,积极参股国际领先的初创型科技企业,将对外投资战略置于推动全球价值链优化重组的重要位置,通过“补链”和“强链”在价值链高端获得竞争力。

3. 更好发挥政府社会治理职能,以更优质的社会事业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和初心。深圳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和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健全社会经济保障和提升各项社会事业,加快补齐高等教育、优质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短板,加快推动实现特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从而在共享发展上拥有更多获得感和满意度。一是,构建与创新型全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现代教育体系,不断提高深圳教育质量。着力发展开放式、国际化、创新型现代城市教育体系,发展学前教育服务、提升义务教育水平、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创新职业教育发展,不断提高深圳市民教育服务和人力资源供给水平。二是,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市民健康需求相匹配

的医疗服务体系,不断提高深圳医疗水平。着力构建重点医院和优势学科,建议实施三甲医院“倍增计划”,将现有三级医院和各区人民(中心)医院创建成为三级甲等医院,力争每个区至少拥有1家三级甲等医院,提高各区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深入实施“三名工程”,大力引进国内外名医、名诊所、名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发展高水平医疗机构。三是,构建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相协调的住房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深圳居住条件。面对较高的居住成本和较大的住房需求,探索建立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制,要加快培育住房租赁市场,从增加供给、公共配套、市场监管等方面完善政策,促进住房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要通过新增用地、棚户区改造、城市更新等多种建设方式以及安居集团租购、城中村统租等多种租赁方式提升住房保障能力,缓解市民住房压力,努力实现“住有所居”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 [1] 董晓远,廖明中,张军超.深圳经济发展质量的监测与比较分析[R].深圳经济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2] 董晓远,廖明中.深圳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3,(4).
- [3]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
- [4] 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学术月刊,2018,(3).
- [5] 周振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结构[J].上海经济研究,2018,(9).
- [6] 任保平.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
- [7] 师博,张冰瑶.新时代、新动能、新经济——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解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8,(5).
- [8] 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9] 师博,任保平.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J].经济问题,2018,(4).
- [10]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11] 廖明中,胡雪涛,余红兵,董晓远.深圳经济实现并有望持续较快增长[R].深圳经济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12] 倪晓峰.深圳市社会发展质量与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研究[J].第十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

作者简介:施洁,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广东深圳 518028

【责任编辑 杨 中】

19世纪美国教育传教士粤港澳活动述略

何思兵

[摘要] 19世纪在广州、澳门和香港通过兴学传教的美国教育传教士,承传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的教育模式,相继开办了马礼逊学堂、宏艺书塾、真光书院和格致书院等教会学校,开启了美中教育交流之先河。他们开拓性的教育实验和理念,为此后美国教会学校在中国内地的拓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模式,对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何显理、鲍留云、哈巴安德和那夏理等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和办学报告等原始资料,可以追寻到他们在华办学传教的踪迹,探究他们的心路历程与教育实践。

[关键词] 教育传教士 美中教育交流 教会学校 女子教育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5;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79-12

一、前言

英美新教教会向中国传教始于19世纪初年。最早到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由于当时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传教士来华,马礼逊只好取道美国,在美国教会和美国对华贸易商人的资助下,带着美国国务卿致美国驻广州领事的介绍信,于1807年到达广州。马礼逊抵华后,一直呼吁向中国派出更多传教士。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简称美部会)于1810年成立后不久,就将中国列为其主要海外传教地。在广州设立商行的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 1789-1851)等美国对华贸易商人,在1827年也向美部会提议,请求派遣两名传教士协助马礼逊在广州开展传教活动。1829年,美部会终于决定派遣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及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到中国传教。他们在1830年2月到达澳门和广州,在奥立芬等商人的

协助下,开始了美国新教教会对华传教事业^①。

裨治文到达广州后不久,便向美部会提出为当地贫民子弟开设学校的建议,强调教育在传教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裨治文首先集中精力学习中文,为开展传教活动作准备。广州在当时的环境下,还不具备开办教会学校的必要条件。清政府不仅禁止传教,还严禁国人向洋人教习中文。尽管如此,裨治文在广州收3名男童为学生,开始他的教育实验,同时利用学生协助他翻译圣经。到1833年初,他的学生增加到6名^②。1836年9月,在华英美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裨治文是发起人之一,在这个协会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中国丛报》和翻译传教资料。1839年教育传教士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到达澳门后,裨治文为美部会开办学校的设想,才得以实现。而在此之前,由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部派遣的传教士何显理(Mrs. Henrietta Hall Shuck, 1817-1844)已经在澳门尝试开设女子学校^③。

二、何显理在港澳兴办女校的尝试

何显理原名赫利娥特·霍尔(Henrietta Hall),1817年出生于一个浸信会牧师家庭,在家乡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 Virginia)的女子学校受过良好教育。幼年的何显理好学敏思,深受其牧师父亲的影响,从关心家里黑人奴隶的灵魂救赎开始,逐渐立下了要到海外传教的志愿。1834年,年仅16岁的何显理便向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部(American Baptist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提出申请,要求到海外传教。由于当时还没有向海外派遣未婚女传教士的先例,而且她年纪尚小,她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次年,何显理到弗吉尼亚州首府列治文(Richmond)的一间女子学校继续学业。在列治文,她遇到了弗吉尼亚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生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 1814-1863)。其时,叔未士正准备赴华传教,何显理便嫁给了这位志同道合的传教士。叔未士夫妇随即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的派遣,于1835年9月22日启程前往中国^④。在此之前,美国浸信会已经在暹罗建立了传教据点,向当地华侨传教。叔未士夫妇原计划先到曼谷学习中文,但是他们在1836年3月31日到达新加坡后,决定留下来,向聚居在当地的华侨学习中文。5个月后,叔未士夫妇带着在新加坡降生的儿子,离开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于1836年9月到达澳门^⑤。

叔未士与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抵华后首先专注于学习中文,同时开展布道等活动,以期有朝

①Christopher Hancock,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London: T&T Clark, 2008, pp. 31-86; Michael C. Lazich, 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pp. 33-34, 49-59, 65.

②Murray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6, pp. 290-291; Lazich, E.C. Bridgman, pp. 75-76.

③鲍留云和何显理的事迹详见拙著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 Macao: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2015, pp. 72-77; 何思兵:《美国教育传教士何显理与鲍留云港澳活动述略》,《澳门研究》,2016年第1期。

④Louis B. Gimelli, " 'Borne Upon the Wings of Faith': The Chinese Odyssey of Henrietta Hall Shuck, 1835-1844",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Summer 1994, vol. 14, pp. 29-30.

⑤Thelma Wolfe Hall, *I Give Myself: The Story of J. Lewis Shuck and His Mission to the Chinese*, Richmond, 1983, pp. 8-42;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and Lincoln, 1849, p. 13, 64, 66, 70.

一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何显理则致力于办学。到澳门不久,她便收养了一名失去双亲的男孩和一名6岁女童。这名女童身世凄凉,曾被转卖并遭虐待。一位美国商人以10个银元买下这个女孩,交何显理收养。这位被何显理取名为Jane Maria的女孩,后来成为学校里的得力助手。获得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部批准后,何显理便在其住所开设学校,教育她所收养的贫民子女。学校开办之初,仅有8名学童。何显理仿效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①之双语教学模式,上午教授英文、地理、算术和教义等课程两小时,下午再将学生送到私塾学习中文两小时。到1839年2月,她的学生已经增加到15名。虽然其中只有5名女生,何显理仍然把她的小学塾称为女子学校^②。

何显理的小学塾并非澳门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在此之前,荷兰传道会派出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 A. Gutzlaff, 1803-1851)的英籍太太温诗黛(Warnstall Gutzlaff)已经在1835年9月开办了一所女校。这所主要由印度与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资助的女校,是澳门第一所由新教教会开办的学校。从1837年1月起,这所女校也得到马礼逊教育协会的资助,直到1839年秋该校因鸦片战争爆发而关闭。郭实猎夫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招不到足够的女生^③。

何显理的学校创办的早期,在校女生一度达到12人,男生2人。可是大多数女生读不到一年就退学,在校超过2年的女生只有五六人。到1838年,在全校21名学生中,只有5名女生。尽管她本来计划只招收女生,但是由于华人家长都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为了招到女童,她只好接受男生。起初,当地华人得知她开设学校的消息时,申请入学的男童多达一百多人,可是一个女孩也没有。后来她不再招收男童了,除非家长每送来一位男童,也同时送一名女童来上学。为了让他们的儿子接受教育,华人家长只好也让他们的女儿跟男孩子一块上学^④。

愿意到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念书的儿童绝大多数是贫民子弟。为了吸引当地儿童来上学,何显理的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学校的经费依靠美国朋友的捐助。由于经费不足,学校只能招收十多名学童。她呼吁家乡兰开斯特的教友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学童上学。她也向在广州和澳门从事对华贸易的外商募捐,一位美国商人曾经向她的学校捐了50元^⑤,这可能是较大的一笔捐款。不过,对于那些富商来说,这笔捐款实在微不足道。在1836年,年仅25岁的旗昌洋行商人福布斯(John M. Forbes)到广州不到两年就赚了15万元(约今400万元)^⑥。筹募办学经费是一项艰巨任务,她必须获得赞助人的同情和信任。尽管困难重重,何显理不折不挠,兴学传教的决心毫不动摇。

何显理在给父亲及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她对教育传教事业的满腔热忱。尽管她的教学和家务都相当繁重,不仅要训导众多的学生,还要照料她自己的几个子女,她仍然抽出时间,与一位美国

①关于英华书院的早期历史,参阅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Henrietta Shuck to Mrs. Keeling, Macao, Nov 29, 1836; 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Macao, Jan 17, 1837; Henrietta Shuck to Mrs. Keeling, Macao, May 17, 1837, all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 95-96, 97-98, 105-106.

③Mary R. 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Mobile, AL: Heiter-Startke Printing Co., 1943, p. 61.

④Henrietta Shuck to Her Step-Mother, Macao, Feb 22, 1839,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 138-139.

⑤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 139.

⑥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 123.

商人的太太一起,每周到附近的村落探访贫民妇女两三次,劝说她们把女儿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她呼吁家乡的教会派遣女传教士来华,与她一道救赎当地苦难深重的妇女。尽管染上肝病,健康状况堪忧,她仍然渴望将余生奉献给儿童教育和妇女启蒙事业。她认为女生都应该在校学习到21岁。何显理与刚刚抵达澳门的长老会传教士鲍留云夫妇志同道合,对他们即将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寄予厚望^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开辟为自由贸易港,逐渐取代广州和澳门,成为华南对外贸易中心,旅居澳门的英美商人及传教士纷纷迁往英国殖民者在港岛建立的维多利亚城^②。1842年3月,叔未士夫妇与另一名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 1802-1871)将美国浸信会的传教据点从澳门搬到香港。在此后5年间,他们在港岛建立了3座浸信会教堂,建筑用地由港英政府免费提供。在皇后大道的浸信会传道团住地,何显理开办了香港第一所女校宏艺书塾。到1844年,这所学校有学生30人,其中包括6名华人女童和3名英国女童。宏艺书塾与美国长老会建立的马礼逊学堂和从马六甲迁到香港的英华书院,同为当时香港最负盛名的教会学校^③。

但是,招不到足够女生,仍然是何显理最棘手的问题。虽然在校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华人女生始终只有五六名。入学时,学生家长都答应让其子女在学校学习到21岁。但是通常过了几个月,这些女童就被她们的父母从学校偷偷带走。何显理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位特别聪慧的女生的遭遇。为了留住这位女孩,何显理每月付给她贫困的母亲两块钱。这位女童学会了用英文读书、写字和作文,还修读过简单的历史和地理课程,并掌握了不少教义知识。可是好景不长,3年后,她的母亲还是把她带走了,强迫她与一个抽鸦片的文盲男人结婚。这位13岁的女童在给何显理的信中倾诉她被强行缠足,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奔跑和蹦跳的不幸遭遇。何显理到澳门看望这位女童时,发现她脸色惨白,异常痛苦。尽管如此,不管亲人怎么劝说,这位女童不肯拜神,因为她在学校受过反对偶像崇拜的教育。她还拒绝在安息日干活。为此,何显理被这位女孩的母亲当面斥责。尽管何显理对这位女孩的不幸处境深切同情,对她在信仰上的执着态度深为感动,却爱莫能助^④。

这则凄恻的日记,揭示了西方宗教传入中国时与民间信仰习俗难以调和的冲突。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的何显理,既缺乏世俗社会的人生阅历,对中国民俗文化亦不甚了解。她要求女生接受学校教育到21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难以推行。她似乎没有考虑过,在教会学校接受过长期西方文明教育的青年女子,如何在墨守成规的传统社会里安身立命的问题。她也没有意识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推行女子教育,只能循序渐进。赴华传教前,何显理在美国只教过几个月的书,教学经验不足。她到达中国后,其父在信中谆谆告诫她要继续学习,以便肩负起教育子女和学生的重任。在教务和家务的繁重压力下,何显理仍然广泛阅读,笔耕不辍,撰写了几十篇短文,向家乡的教友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这些文稿反映了她对中国问题的见解。例如,在一篇文章中,她以亲身的观察,揭示了走私进口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谴责进行这种不道德贸易的基督教

①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 140-143, 167-168.

②何思兵:《香港与十九世纪美国对华贸易》,《文化杂志》(澳门),第98期(2016年)。

③Henrietta Shuck to Her Sister Susan, Hong Kong, Mar 16, 1844; *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Apr 4,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 201, 209; J. Newton Brown, "Missions in China", in *Henrietta Shuck, Scenes in China*,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52, pp. 248-249; 李志刚:《基督教与香港早期社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5页。

④*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Mar 31,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 209-210.

国家商人^①。对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她尤为同情和关切，希望通过兴办女校、启迪民智来解救她们。为此，她一直孜孜以求，探索中国女子教育的途径，但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教育理念。

宏艺书塾在香港建校以后，校务欣欣向荣。1844年秋，美国浸信会医务传教士地凡医生(Thomas Devan, 1809–1890)夫妇刚到达香港，就到宏艺书塾任教。地凡太太协助何显理教授女童，地凡医生则与叔未士牧师一起，兼任男生的老师。中文课程雇用一名华人教师来讲授。学校的财务则由怜为仁牧师(William Dean, 1807–1895)管理。一座两层的新校舍在1844年9月落成。马礼逊学堂校长鲍留云和他的学生应邀参加了新校舍启用的庆典。同一年，宏艺书塾还获得一位纽约教友捐赠的90元(约今3万元)。何显理计划从英国聘请一位浸信会女信徒来当助教，将学校的女生增加到20人^②。

可是，何显理还未实现她雄心勃勃的扩校规划，便在生下第五个孩子后，于1844年11月27日因患急症而遽然去世，年仅27岁。在去世前，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已经流露出对人生无常之感慨。频繁的生育以及繁重的教务工作，摧残了她的健康。在产下第4个孩子后，她已经预感自己不久人世，在信中表达了她的意愿，希望她的事业后继有人。在10月28日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她写道：“再见了，我亲爱的爸爸！为了家人和上帝的事业，愿您健康长寿。您要为中国尽其所能。”^③何显理把短暂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传教事业，在为她举办的葬礼上，鲍留云致辞悼念志同道合的好友。

何显理去世的4个月后，叔未士牧师与地凡医生夫妇决定离开香港，取道广州，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宏艺书塾也因此停办。这所学校的学生可能转学到理雅各夫人(Mrs. Legge, 1816–1852)于1844年在香港开办的伦敦传道会女校^④。

三、鲍留云与美中教育交流的开端

马礼逊教育协会在1837年开始筹备开办学校，并委托协会的成员、热心赞助传教事业的商人奥立芬到美国招聘师资。经耶鲁学院院长及3名教授的推荐，该院毕业生鲍留云于1838年10月4日被选定为马礼逊学堂第一位教师^⑤。鲍留云1810年出生于康涅狄克州东温萨镇(East Windsor, Connecticut)，父母都是虔诚的新教信徒。从童年时代起，他就选定了人生道路：“接受人文教育，研习神圣的奥秘，以便日后向异教徒传教。”^⑥在中学学习了4年后，17岁的鲍留云已经达到大学入学水平。由于无力支付上大学的费用，他毕业后在附近的学校教了2年书，以微薄的收入帮助他的父亲养家糊口。在母亲朋友的资助下，他于1828年进入耶鲁学院。183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在纽约一所聋哑学校任教。1836年，他进入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at

①何显理去世后，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在1852年出版了她的文集《中国印象》，收录了她的52篇文章。见Henrietta Shuck, *Scenes in China, or, Sketches of the Country, Religion,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52.

②Henrietta Shuck to Her Sister Susan, Hong Kong, Sep 15, 1844; 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Mar 31, 1844; Henrietta Shuck to J. B. Jeter, Hong Kong, Nov 26,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 209, 212, 219.

③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Hong Kong, Oct 28,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 214–215.

④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pp. 64–65.

⑤"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vol. 10, pp. 567–568;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p. 61–64.

⑥Quoted in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 31.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学习。此后又回到纽约,在纽约聋哑和智障儿童学校任教,同时在刚成立的纽约市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New York City)深造,并担任位于曼哈顿的长老会教堂(Cedar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合唱团的音乐总监。从协和神学院毕业后,鲍留云牧师便向美部会提出赴华传教的申请。但是此时已经有50人申请到中国传教,由于缺乏经费,美部会无法派出新的传教士。鲍留云只好继续在纽约教书,直到1838年10月被马礼逊教育协会聘任^①。

鲍留云偕同新婚妻子于1839年2月18日到达澳门,住在由早于1833年到达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设立的传教据点。在卫三畏指导下,鲍留云集中精力学习中文,筹备开办学校。1839年秋,鲍留云租下贾梅士洞附近的一所葡式房子作为校址。这座有三层楼和地下室的房子原先是郭实猎夫人女校的所在地。此时她已经离开澳门,到马尼拉躲避战祸。不过中英交战对在鸦片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并未带来威胁^②。

马礼逊学堂在1839年11月4日开学时,仅有5名学生,一个星期后另一名学生入学。鲍留云在向教育协会董事会提交的第一份办学报告中指出,协会的宗旨不是要为众多的学生提供一般的教育,而是要提供全面的优良教育。由于资源有限,开始时最好把学生人数限为6人。由于马礼逊学堂以达到欧洲最佳学校的水平为办学目标,要求严格,两个月后,一名学童因为跟不上进度而退学。鲍留云要以这个班作为学校今后发展的楷模。在报告中,他还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教育协会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在体育、智育、德育各个方面全面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英文教育并重。学童半天学习英文,半天学习中文。每天在教室学习8小时,户外体育活动三到四小时。为了使学童感到他们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接受教育,学生全部在校住宿,他们的品行受到严格训导^③。鲍留云还注重美育,在办学报告中,他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他是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不但擅长声乐和器乐,还会作曲和指挥。在他的熏陶下,华人学童都热爱西洋音乐,特别喜欢跟他学唱圣歌^④。鲍留云在港澳地区的音乐教育活动,为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3月,学堂录取了第二批学生,在校学生增加到9人。其中4人的学费和食宿费用由教育协会提供,其余5人为自费生。第二班由鲍留云的太太和英国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 Milne, 1815-1863)教授。在向教育协会董事会提交的第二份办学报告中,鲍留云对中国的传统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让幼童死记硬背那些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的儒家经典的教学方法是荒谬的,这种教育导致国民不去思考。针对中国教育的弊端,他着重培养学生思考和理解的能力。尽管如此,他允许学生继续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⑤。在他的指导下,在校学童不仅在英文阅读、

①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 45-53.

②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1889, pp. 83, 111-112;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pp. 329-331;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 69, 71; Lazich, E. C. Bridgman, chapter 2.

③"Benevolent Societies", *Chinese Repository*, Jan 1841, vol. 10, p. 53;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vol. 10, pp. 569-570.

④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 76-77;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8, 1842,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2, vol. 11 p. 555;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Sep 24, 1845,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5, vol. 14, pp. 467, 476, 478-479.

⑤"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vol. 10, pp. 570-572;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8, 1842,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2, vol. 11, pp. 549-550.

书写和口语方面进步很快,而且在历史、地理、算术、几何、代数等科目的学习上,也取得显著的进展。鲍留云十分重视学生的品行,在校的学童在这方面亦有很大改善。由于学校的声誉日隆,入学申请大量增加,但只有少数幸运者被录取。到1841年,在校学生增加到18人,学生年龄从十到十八岁不等。其中一些学生可以把孟子的论述翻译成英文,他们的英文写作能力比中文要好^①。

1842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从澳门迁到香港,在港英政府提供的土地上重建学校,当地华人称之为马公书院。这座由马礼逊教育协会会长、英国宝顺洋行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 1799-1853)捐资三千元建成的新校舍,位于维多利亚城(华人把这一地区称之为“四环九约”)飞鹅岭的山坡上,可以容纳24名学生住宿。从澳门到香港继续学业的学生共11名。除了鲍留云夫妇外,先后在马公书院任教的还有美国传教士邦尼(Samuel W. Bonney, 1815-1864)、麦嘉缔(Davie B. McCartee, 1820-1900)、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 1818-1894)、麻西(William A. Macy, 1824-1859)以及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吉列斯皮夫人(Mrs. Gillespie)等^②。

1844年,在这所香港最大的教会学校注册的学生有30名,其中28名在校,两名在上海当见习翻译,全部为男生。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海关和洋行当翻译的实习生每半年轮换一次。五口通商后,需要大量翻译,该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相当好。马公书院的主要目标是传播新学,并不要求学生信奉基督教。该校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阅读写作、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生理、化学、几何、代数以及中文等^③。鲍留云用他自己编写的课本上英文课。他还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论著,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通俗读本,并翻译成中文,题为《致富新书》,由一位中国文人修订并作序,于1847年刊行^④。1846年9月30日,鲍留云在教育协会年会上详细汇报了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还提出了他对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构想。他强调,中国教育的发展应与西方一致,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⑤。

香港开埠初期治安不佳,经常遭到海盗袭击,马公书院也曾经被海盗劫掠,鲍留云腿部被刺伤。他的太太在容闳等学生帮助下,带着两个幼儿躲藏到学校旁边的鸡舍,才幸免于难。尽管如此,这些遭遇并没有动摇鲍留云继续在中国从事教育传教事业的决心。可是,他的太太生过3个孩子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迫使鲍留云做出暂时离开香港的决定,以便让太太回国疗养一段时间。

鲍留云将学校的教务交给他的耶鲁校友麻西接管后,于1847年1月5日带上家人和容闳、黄胜、黄宽3名学生回国^⑥。这3名跟随鲍留云从澳门到香港的学童,成为早期的中国赴美留学生,容闳和

①"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vol. 10, pp. 573-574, 587;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8, 1842,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2, vol. 11, pp. 546-547, 554.

②"The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Oct 1, 1843, *Chinese Repository*, Dec 1843, vol. 12, pp. 607-609, 620-621;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 85, 97;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33;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Facts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46.

③Brown to His Sister Fanny, Victoria, Hong Kong, Mar 29, 1844, quoted in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 96-97.

④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 87, 90; 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人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142页。

⑤"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Sep 30, 1846, *Chinese Repository*, Sep 1846, vol. 15, p. 612;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 90, 98.

⑥*Chinese Repository*, Jan 1847, vol. 16, p. 54.

黄宽分别成为第一位从美国和欧洲大学毕业的中国人。鲍留云夫妇于同年4月到达纽约,作短暂停留后,带着容闳等人回到故乡蒙森镇(Monson, Massachusetts)。这3位中国学童的言行举止,博得当地好奇居民的好感。鲍留云的家人对这几位学童关怀备至,让他们住在自己家的对面,由鲍留云的母亲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并安排他们在鲍留云的母校蒙森中学(Monson Academy)继续学业^①。鲍留云离开香港时,原本打算两年后返回中国,但由于太太的健康仍未恢复,故不能重返中国。马公书院的校舍在1848年被台风摧毁。由于学校招生不足,港英政府在1849年停止资助,书院最后在1850年因筹募不到足够的经费而停办,部分学生转到由英国圣公会开办的圣保罗书院就读。

鲍留云悉心栽培的弟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黄宽(1829-1878)在蒙森中学肄业后,于1850年转往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毕业后于1857年回到中国,先后服务于香港的伦敦传道会医院,以及广州的惠爱医局和博爱医院,被誉为东半球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他还在博爱医院附设医学校任教,致力于培养西医人才^②。黄胜(1827-1902)因病于1848年提前回国,在香港的伦敦传道会从事教会报刊的出版和儒家经典的英译工作。1853至1856年主持以时事政治为主题的杂志《遐迩贯珍》的出版工作;1857年出任《中外新报》编辑,还担任过创刊于1864年的《华字日报》主笔。1864至1867年在培养洋务外交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掌管英文教学。1873年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带领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③。容闳(1828-1912)于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1854年毕业后返回中国。在自强运动中,容闳向清廷提议派出幼童到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曾国藩等晚清重臣的支持下,容闳的建议被清廷采纳。他组织选拔了120名大部分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学童,从1872年开始分四批送到新英格兰地区学习。1876年,耶鲁学院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卓越成就。容闳一手策划的这个海外教育项目,尽管由于清廷中的保守官吏的反对而中途夭折,绝大多数学童还未完成学业,便在1881年被召回中国,但是这些归国留学生仍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大清现代海军中担任舰长等要职的二十多名归国留美学生中,有7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著名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也是这批归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把先进的科技文化介绍给国人,而且把西方的共和政体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

四、哈巴安德、那夏理与教会学校在广州的拓展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国不仅根据“一体均沾”原则,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取得的同样利权,而且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并获得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教堂、公墓,以及聘请中国士民教习中文和购买中文书籍等权利,为在广州办学传教提供了便利。到1868年,西方传教

①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 110-111.

②苏精:《黄宽与伦敦传道会》,《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2000年10月第3期,第21~30页。

③苏精:《黄胜:楚才晋用的洋务先驱》,氏著:《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第260~266页;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 141-143.

④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4-104.

士在广州已经建立了13所教会学校^①。

1845年春，裨治文分别以5000元和2050元出售了传教站在香港的两处房产，以所得款项在广州购置房舍。同一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将传教站迁回广州。裨治文在十三行的前丹麦商馆安家，设立印刷所，继续出版《中国丛报》。另一名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则开办了一所男童学校。他们还在附近的街巷布道^②。1847年，曾经在香港马公书院任教的哈巴安德，将其在澳门开设的学校迁到广州，开始在省城办学传教。

哈巴安德于1818年10月20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莫农嘎赫拉镇（Monongahela City, Pennsylvania），父母都是基督新教传教士，从小在浓烈的宗教氛围中成长。他1835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杰斐逊学院（Jefferson College）毕业后，到学校任教5年，1840年到1843年又在匹兹堡的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并在1844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一年，哈巴安德在费城被任命为牧师，受美北长老会的派遣前往中国传教。他在1844年10月23日到达澳门，次月即应邀到香港的马公书院任教，替代生病的鲍留云。1845年4月，哈巴安德回到澳门，开办男童寄宿学校。学校开办时，注册学生27人，家长必须承诺让其儿子在校学习8年。学校雇用两名中国教师讲授儒家经典并担任翻译。哈巴安德在办学的同时，努力学习中文，为进入内地传教作准备^③。

1847年初，哈巴安德与另一位美国传教士花莲治牧师（John B. French）将学校从澳门迁到广州，在十三行附近的故衣街租用民房作为校舍。跟随哈巴安德从澳门到广州的学生约26名。由于附近居民的反对，建立不久的学校被迫迁到十三行丹麦商行的房屋，作为临时校舍。1848年4月再迁至附近的靖海门，在那里设立寄宿学校，并开设走读班。1848年在校学生有18人，1850年又有九名男童入学。1853年，在澳门入学的11名学生完成了8年的课程，成为哈巴安德所创办的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其中两人从事传教工作。到1854年，学生增加到30人。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哈巴安德雇请一名毕业生做助手。这所由传教士在广州开设的第一所寄宿学校，到1856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而停办。在哈巴安德开设的走读班就读的学生在1855年8月有一百余名。在办学的同时，哈巴安德还先后在广州开设了两间诊所，每年诊治七千多名病人。1854年5月，美国海外传道会派出的嘉约翰医生（John G. Kerr, 1824–1902）到达广州后，接管了北美长老会的诊所，哈巴安德则全力投入他更感兴趣的教育事业^④。

1855年8月，哈巴安德因健康状况不佳而回国休养。1859年秋重返广州后，他继续开展教育传教事业。到1864年，他已经在广州建立了寄宿学校、日间学校和培训布道者和教师等神职人员的学校。到1884年，在他建立的学校里就读的学生达918人。然而，他的目标不仅仅限于为教会培训传

①Sibing He, "The Cushing Mission to Macao and US Imperial Expa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sia," in Macao —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City*, edited by George Wei,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130–131; Peter Tze Ming Ng, *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1950)*,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2, p. 2.

②Lazich, E. C. Bridgman, chapter 5.

③Loren W. Craftree, "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1844–1891",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1984, vol. 62, no. 1, p. 20.

④G. Thompson Brown, *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 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 1837–1952*,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7, p. 35; Craftree, "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pp. 21–22.

教人员。他更远大的理想,是要引进西方教育,培养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才。

1864年,设立在广州北门内朝天街的同文馆开馆,这是清政府继在北京和上海之后开设的第三所培养外语和外交人才的学校。广州同文馆聘用汉文教习和西洋教习各一名;招生名额为30人,其中正学20名,附学10名。首任西洋教习为美国人谭顺(T. Sampson),负责讲授英文和数学课程。从1865年6月至1867年5月,哈巴安德担任广州同文馆的第二任西洋教习,每隔一天讲授4小时的英文和数学课程,开始实施他为中国培养精英的设想^①。

美国传教士从港澳进入内地活动后,继续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1846年底,裨治文太太在广州开办了一个主日《圣经》班,并收养了一名7岁中国女童。她一直想办一所女子学校。1847年6月,裨治文夫妇离开广州,到上海建立传教站。1850年春,裨治文太太终于开设了上海第一所女校,收生30人。这所学校后来命名为裨治文女子学校。在广州,哈巴安德夫人相继于1852年和1853年开设女子日校及寄宿学校各一所。到1897年,美北长老会在广州地区开办的女子日校达到8间,历年来登记在校人数达538人。她们不懈的努力,对整个华南地区的女子教育事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

1872年6月16日,来自俄亥俄州的那夏理女士(Harriet N. Noyes, 1844-1924)在美国妇女传道会的资助下,在广州金利埠(今广州六二三路)再度开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暨圣经培训班,取名为真光书院(True Light Seminary)。招生对象除了未成年女子之外,还包括中老年家庭妇女。为吸引学生前来就读,书院实行免费教育,不仅学杂费全免,还提供食宿和日用品。到1880年代中后期,书院才酌情收取费用。学校先后开设的课程包括国文、汉语拉丁拼音、英文、数学、地理、天文、化学、自然、历史、音乐、美术、体育、哲学、心理、卫生、家政以及神学等。真光书院的多名女生,进入嘉约翰医生开办的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校,成为最早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女性。由美国医务传教士富玛利(Dr. Mary H. Fulton, 1854-1927)于1901年建立的广州夏葛女医学校(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的第一届毕业生共有11名,其中6名来自真光书院。1908年,真光书院还开办了两年制的师范学校。那夏理从1872年创办真光书院,到1917年退休回国,掌管校务近半个世纪。她把书院发展为现代科学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新式教会学校,培养了大批职业女性。据统计,从1872年建校至1917年,共培养了3724名学生,其中成为传道者的有310人,教员286人,医生114人,护士32人。那夏理认为,提高妇女的地位,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③。真光书院引进的西方女子教育体系和理念,对宣扬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击。教会女校传播的男女平等、尊重女权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广东社会思潮和妇女生活。

在粤传教的美国教育传教士不满足于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他们的长远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早在1846年,鲍留云就在马礼逊教育协会年会上,提出了他的中

①Craftree, "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pp. 22-23. 关于广州同文馆,可参阅Knitth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36-43; 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年,第404~461页。

②Lazich, E.C. Bridgman, chapter 5; Harriet N. Noyes,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7, pp. 10-12.

③Harriet N. Noyes, "Fifty Years in the Foreign Field", *The Continent*, May 13, 1920, pp. 650-665; Harriet N.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New York: Fleming Revell, 1919, p. 47, 65; P. S. Man, *To Save Life and Spread the True Light: 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in China (1899-1936)*, MA Thesi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8.

国教育发展蓝图。他强调,中国教育的发展应与西方一致,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1869年5月15日,那夏礼牧师(Henry V. Noyes, 1836–1914, 创办真光书院的那夏理女士之兄)致函北美长老会秘书长,提出了广州长老会传道团教务会议的建议:“希望在广州创立一所参照西方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大学,让中国人通过西方教育感受到上帝的恩赐。”^① 1884年和1885年,香便文牧师(Benjamin C. Henry, 1850–1901)和哈巴安德相继向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递交建校申请,最终获得长老会海外差会的批准,并授权哈巴安德实施这一计划。为了建立这所独立的非教派性基督教大学,哈巴安德在美国积极筹款。到1886年,共筹得11万美元(约今27万美元),其中1万美元是他的私人捐款。

哈巴安德长期在广州生活,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在评论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时,时常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从到达中国起,他一直谴责鸦片贸易,不赞同西方商人粗鲁无礼的行为和低劣的道德标准。在广州,尽管他与家人以及他所开设的学校和教堂,曾经多次被当地民众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些事件看作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反而认为,在很多事件中,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他对美国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特别感到不满,认为中国移民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严重的问题,而美国人对旅美华人施行的暴行却骇人听闻。因此,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在美的美国人进行报复。在中国生活了40年后,他对中国文化更为欣赏。1880至1884年间,哈巴安德担任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外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主编。他在发表于这份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中国人是出色的组织者和治理者。他们遵守法律、循规蹈矩……在各行各业和日常工作中勤勉和务实,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才智与节俭。在连绵不断的中国历史中的每一个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和治理者、卓越的学者、圣贤、哲学家和作家层出不穷。与所有邻近的国家比较,这个国家在文明、政府和国力等方面总是保持优越的地位,并获得邻邦由衷的认可。^②

尽管中国在科技和军事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强国,但是哈巴安德看到,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迫切性。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发展成为一个比过去更为富强的国家,攀升至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而教育,特别是由教会学校提供的教育,是中国发展为世界强国的关键。基于这种信念,哈巴安德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致力于在华南创建基督教大学。

1888年,由哈巴安德一手筹办的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在沙基金利埠开学,首届录取30名学生,由哈巴安德夫妇和一名华人教师任教,课程设置侧重于英文和科学教育。哈巴安德认为,英文是传授西方文明和启蒙学生的重要工具,他的学校要以英文作为教学语言来吸引学生。他力排众议,要建立一所培养“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的人文教育高等学府。这所大学将成为中国未来领导人才的摇篮,而不仅仅是培训传教助理的学校。他还积极推进女子教育和男女同校。此后的岭南大学一直坚持他的教育理念,以英文授课,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获得了瞩目的成就^③。1891年哈巴安德因病回国,格致书院一度停办。要把学校发展成为包括文理学院和医学院的综合型大学的创校设想,到哈巴安德189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家中去世时,仍然未能实

①Noyes,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p. 27.

②Andrew Happer, "A Review of Dr. S. W. Williams' Middle Kingdom", *Chinese Recorder*, vol. 15, no. 2, March–April 1844, p. 127.

③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p. 27, 108, 143.

现。格致书院的课程设置,原来设计为大学预科,但实际上只相当于中学程度。

1899年,尹士嘉牧师(Oscar F. Wisner)被任命为学校监督,从美国前往广州主持校务,格致书院在四牌楼的福音堂重新开学。由于当地官府和民众对西方教会的抵制,格致书院一直未能购得土地建校,只能租屋授课,校址几经变迁。1900年初,学校从四牌楼搬到花地萃香园^①。但是过了不久,在义和拳信众“扶清灭洋”的喧闹声中,格致书院在同一年被迫迁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堂(英文校名在1903年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动乱平息后,于1904年搬回广州,在河南康乐村设校。到1907年,岭南学堂才招到学生入读大学部。但直到1918年,才有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尽管如此,格致书院的早期发展,为日后岭南大学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②。

五、结语

以往有些学者认为,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会学校和医院,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侵略工具^③。帝国主义者通过这些文化侵略机构将西方文化和宗教强行灌输给国人。近年一些学者则从文化传播(cultural transmission)的角度,对教会设立的教育和医疗机构进行研究。他们指出,现代西方教育和科学文化,以双向交流的方式传入中国,在这个文化转移的合作过程中,中国人民通过对比、筛选和革新,选择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教育体系和文化价值观念^④。

19世纪来粤的美国教育传教士怀着传播福音的执着信念,孜孜不倦地传扬现代文明和博爱精神。这些通过教育传教的先驱者承传了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的教育模式。在粤港澳地区开拓性的教育实验和理念,为此后美国教会学校在中国内地的拓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模式,对现代中国教育产生直接影响。时至今日,美国教会学校遗留下来的建筑,仍然是中国校园中吸引游人的景点;美国教会学校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仍然会被教育界人士提起。而鲍留云等教育传教士开启的美中教育交流,如今已经发展为规模宏大的事业,在两国关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何思兵,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籍专家、华侨大学客座教授。Richmond, CA 94804, USA

【责任编辑 关万维】

①黄菊艳主编:《近代广东教育与岭南大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16页,24~25页。

②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63-373.

④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Michelle Renshaw, *Accommodating the Chinese: The American Hospital in China, 1880-1920*,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百年来“武训”形象之变迁与建构

郭 洋

[摘 要] 武训是清末一位热心教育的义丐，其人其事本是十分简单清楚的。然在武训过世后的百年里，不同的时空语境下，后人对武训形象的认知与宣传产生了不同文本内容，差异甚至一度到了颠倒黑白的地步。百年来武训形象变迁与建构的过程，说明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经过长时段的沉淀，不同时代建构与书写的内容，有可能会愈发模糊与复杂，真假难辨，需要后世治史者加以甄别。

[关键词] 武训 变迁 建构 历史形象

[中图分类号] K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91-06

武训，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原名武七，山东堂邑（今山东聊城）柳林镇人。“训”是清朝嘉奖他办学有功的赐名^①。武训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以行乞的方式，在山东创办了三所义学，开展免费教育。他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所重点书写的帝王将相类人物，而是典型的社会下层人物。然而吊诡的是：武训过世后的百年内，社会上流传的关于他的故事愈发丰富。武训的形象也前后发生巨大差异，一度沦落为“大流氓”“大地主”“大债主”。学界既有之研究，多将焦点聚合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训传》批判事件”，未能注意到长时段内武训历史形象的变迁与差异。本文着重考察清末到改革开放时期，百年间不同主体就武训其人其事而进行建构的文本之延续与差异，从而追问这小人、大历史背后，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历史人物的书写与形象建构。

一、“千古义丐”：晚清民国时期的“武训”

武训在生前就已经得到地方官员与士绅的表彰，逝后更是获誉无数。最早公开为武训请表的是柳林镇贡生杨树坊，他在光绪十四年（1886年）即向堂邑县署报告武训的事迹。此后由县令上报

^①陈旭麓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423页。武训所创办的“义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免费私塾，其经费来源主要靠捐赠的校产出租后所得的租金来维持。

州府,再由知州上报巡抚衙门,希望巡抚大人向朝廷奏明此事。当年,朝廷批准山东地方官员赐给武训一个“乐善好施”的牌匾,加以旌表。庚子之役后,清朝实施新政,学制有所改革,倡导新式学堂。在此背景下,1904年,山东临清州知州及所属几个知县,联名向巡抚衙门上报义丐武训的事迹。奏曰:“若得千百武训起,而辅之则学校只兴可翘首而待矣。”^①这是在办新学的大潮下,临清州地方官员大力旌表武训的重要原因。待到光绪皇帝驾崩,新君登基,前山东巡抚袁树勋则向朝廷奏请,将武训积资兴学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袁以为:“武训行乞办学的事迹,寻常旌表,不足以示来兹而风薄俗。”^②朝廷批示交学部议,后经学部审议,准许将武训宣付国史馆立传^③。消息传来,时有报道称:“武训以一乞人,兴学三州县,积资万余串,给予寻常。武训终一生之所获,惟以兴学为己任,实于今日世道,人心大有裨益。”^④

民国初年,新闻报刊上关于武训兴学的报道并不多^⑤。随着“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武训逐渐为世人所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许多民间人士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也纷纷倡导平民教育。这一时期,杨吟秋编纂的《行乞兴学义士武训事略》(1933年)、张道平编的《行乞兴学的武训先生》(民光印刷公司1935年)、申报馆编《行乞兴学的武训》(申报馆,1937年)等书写武训事迹的书籍问世。时人甚至还印制了《武训先生纪念册》(汶光印刷公司1934年)。这些作品逐渐勾勒出一个更加丰满的“武训”,加深了时人对“武训”的记忆与了解。

到了全满抗战时期,对塑造“武训”伟大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则首推段承泽的《武训先生画传》。此画传文字作者是段承泽,绘画作者是孙之儁。最早由生活教育社于1938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影响甚大。陶行知在看过此画传之后,公开呼吁“新武训”的出现,希望许许多多的“新武训”能够办抗战救国的义学,配合时代之需要^⑥。陶行知还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武训精神。在他看来主要有四点。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有进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⑦。孙瑜后来有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构想,也是受到这本画传的启发^⑧。

除陶行知外,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于武训人物评价道:“武训看出文盲的需要教育,与乞丐需要饮食一样。武训以历年乞讨所得足办三义学而有余,可见筹款不算很难。武先生似乎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再说教育经费困难了,只要你们刻苦而诚恳就好了。这是武先生提醒我们的。’”^⑨由上可见,“武训”已经成为当时号召社会发展教育的一个“标兵”,一种精神象征和感召。

时代呼唤着“新武训”的出现,也迫切需要人们学习武训精神。武训其人其事渐渐被广为传颂,同时“叙述版本”也五花八门。一些具体的细节,在层累叙述中出现了差异。如有人说武训“三

①《山东临清州堂邑、馆陶等县详情巡抚周奏旌义丐武训禀》,《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②《奏牍:前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将积资兴学之义丐武训:宣付史馆传折》,《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10期。

③欧家廉编:《大清宣统政纪》卷十四(影印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47~1148页。

④《武训为国史放异彩》,《新闻报》,1910年10月29日,第3版。

⑤沈树勋:《记武训兴学事》,《汇学课艺》1913年第2期。庆霖:《义丐武训传》,《民权素》1916年第15期。

⑥陶行知:《新武训》,《战时教育》1940年6月1日,第6卷第4~5期。

⑦陶行知:《谈武训精神》,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512页。

⑧孙瑜:《影片〈武训传〉的前前后后》,《文汇报》1986年12月23日,第2版。该画传在1943至1945年曾一度编印到第6版,部分内容曾翻译成英文出版。参见张明:《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92页。

⑨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57页。

岁而父亡”^①，有人说他5岁时父亲死了^②。再如多数版本都认为武训是1838年出生的，然而有人却写为1808年。还有武训到底办了多少所义学，也在流传中被夸大，有人甚至说是30所^③。称赞武训的儿歌，从无到有，最后竟达30余首^④。更加夸张的是，有人公开著文称武训是武松的后嗣^⑤。武训渐渐有被“神化”的迹象。诸如“丐王”“丐圣”“千古义丐”等称号不胜累举。人们已经不再去关注武训到底做了什么事，重要的是，时代需要传播武训这样的历史人物，借宣颂武训来号召富商大贾们捐资兴学、鼓励人们在战时要艰苦奋斗，告诫儿童们要努力学习，珍惜教育机会等。

1941年，国民党中宣部的“喉舌”——《中央周刊》为纪念武训诞辰，刊发了一篇关于武训的文章，“武训”被作者认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象征，是国魂所在。“一个人若想为国家做事情，总是有机会的。武训一个乞丐都能有这样的贡献，更何况其他人？”作者呼吁多一些武训的出现，为国家服务^⑥。武训不断被丰富和改造，以合乎时代需要。人们用诞辰纪念仪式、文章著作、石像等种种媒介，建构起了一个伟大的武训。这就是1949年以前，一个近乎“半神半人”的武训。

二、电影人物：武训走上银幕

1945年12月4日，武训诞辰107周年纪念会于重庆召开。会上有人向民国政府建议，把12月5日确定为国家兴学节^⑦。次年，武训诞辰108周年纪念大会，孔祥熙到会致辞^⑧。当时全国多地建有武训学校及武训教育会，武训犹如当代孔孟一般受人敬仰，特别是教育界人士，更是对其倍加推崇。

早在1944年，就有一部不出名的电影小说《义丐武训》^⑨，是否改编为电影，今人已不甚了解。抗战末期，孙瑜在重庆看到了陶行知送给他的《武训先生画传》，当时就有拍一部关于武训的传记电影的想法。战争结束，政府还都。孙瑜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准备完成《武训传》这部电影。1948年开始，孙瑜便紧锣密鼓筹备拍摄《武训传》，对此事当时的报纸多有报道。《武训传》的男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演员赵丹。饰演幼年武训的是孙瑜的儿子孙栋光^⑩。《武训传》在摄制的过程中，便得到舆论热议。一方面是因为导演孙瑜、主演赵丹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更是武训这个人物已有的光环。当时媒体对此部电影称之为“中制巨片”，一部理想的教育片。从当时的电影剧本来看，《武训传》所要向观众讲述的故事，基本与晚清民国以来已经被建构成型的武训其人其事无异^⑪。影片在1949年前只完成了约三分之一，此后因政治局势之巨变而耽搁。

战后短暂几年，除了电影《武训传》之外，金陵大学影音部曾制作了一部名为《武训》的静映卷

①李晋荣：《记武训事》，《崇善》1925年第17期。

②《武训静映卷片片上字幕及附加说明全文》，《影音月刊》1948年第2期。

③须武：《伟大的武训先生》，《时代儿童》1946年第1卷第8期。《武训年谱》，《师风》1946年第3期。

④《诗歌：武训先生的歌谣》，《生活教育》1934年第1卷第5期。

⑤武大郎：《武训为武松后嗣》，《京戏杂志》1936年第3卷第5期。

⑥吴鼎：《纪念武训诞辰》，《中央周刊》1941年第4卷第17期。

⑦《陪都明日举行，武训诞辰纪念》，《申报》1945年12月4日第2版。

⑧《武训一零八周年诞辰，昨开会追念，孔祥熙等致辞赞扬》，《申报》1946年12月6日第8版。

⑨岳枫、裴冲：《电影小说：义丐武训》，《上海影坛》1944年第1卷第12期。

⑩《一颗新小星的闪烁：诗人导演孙瑜的公子演幼年武训的孙小弟》，《青青电影》1948年第16卷第29期。《在诗情画意的笔触下，义丐史绩搬上银幕，武训之幼年》，《影剧天地》1948年第1卷第1期。

⑪《〈武训传〉中制摄制》，《电影故事》1949年第6期。

片(幻灯片)。拍摄电影成本太高,静映卷片成本低、耗时短^①。金大的孙明经对武训事迹的了解,如同孙瑜一样,也是通过段承泽的《武训先生画传》。据孙明经言,他当时便深感武训的伟大^②。战后在“建国初期、教育第一”的号召下,为了针对中国实际的需要,孙便组织人手选武训做一部静映卷片,以引起国人对教育的兴趣。孙等人还特意撰写了卷片的说明书,以便放映时候与字幕连起来向观众宣读。这部静映卷片,一以贯之地塑造了一个孝顺、渴望读书、能吃苦、乐于助人的武训。民国教育部购买了20份拷贝,向各省市教育厅局分发,以鼓励教育事业的发展^③。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总统府,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被终结了。已经加入私营昆仑电影公司的孙瑜,决定继续摄制《武训传》。但是原有的电影剧本肯定要修改。如何按照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来描写武训这个人呢?

1949年1月,昆仑电影公司买下了这部电影的版权。7月,孙瑜在北京参加文代会的时候,向周恩来请示继续拍摄电影《武训传》一事,周的指示有三点:1、要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加以利用,3、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④。除了周恩来之外,郭沫若当时身为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也支持此事。1950年,郭沫若为《武训画传》题词,“在吸吮着万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时一个奇迹。”^⑤他对武训仍然是高度肯定的。在中央文教委的支持下,《武训传》剧本在第一次大修改后,通过文化部的审查。这次修改,塑造的是一个站稳阶级立场,成名后被统治阶级利用,晚年对兴学提出质疑的悲剧“武训”。1950年初,上海市文艺主管单位召集文艺界人士讨论《武训传》剧本的摄制价值问题,多数与会者认为继续拍摄《武训传》有如下三点价值:1、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2、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政策;3、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⑥。但是按照要求,电影剧本进行了第二次修改,主要是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来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如影片末尾加入一个当代女教师,让她总结武训的一生,突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性,宣扬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等内容。终于,《武训传》经过1949年的停顿,1950年2月开始继续摄制,进入山东摄制外景,最终在当年10月完成摄制。12月还发生一次火灾,烧毁200多尺字幕和画面背景,所幸损失不大。

1950年底,《武训传》摄制完毕。据夏衍回忆,他请示了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来一起审查这部电影。当时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也来了,领导们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⑦。次年2月,孙瑜携带电影新拷贝进京给有关领导审查,周恩来、朱德等人均看过并表示赞同。1951年2月25日,命运坎坷的《武训传》终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上映了。

三、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 武训形象巨变

随着1951年2月以来《武训传》的上映,各方好评不断。5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的文章,认为“武训”没有革命思想,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要重新评估^⑧。几

①②《武训静映卷片即将完成》,《影音》1948年第7卷第1期,第2期。

③《金大影音部创制〈武训〉静映卷片》,《申报》1948年6月11日。

④孙瑜:《影片〈武训传〉的前前后后》,《文汇报》1986年12月23日,第2版。

⑤柏水:《千古奇巧》附录,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⑥孙瑜:《编导〈武训传〉记》,《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

⑦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文汇电影时报》1994年7月16日。

⑧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第3版。

天之后，5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正式掀起了对《武训传》的大批判。

在毛泽东看来，《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他认为此事折射出中国文化界思想的混乱。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审阅杨耳所写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时，批语道：“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根本问题了。”^①这段批语更加真实反映了他对《武训传》这部电影进行批判的原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武训”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人，也不在于《武训传》这部电影的艺术价值如何，而是在于后来人不能用电影、著作等形式，向民众宣扬“武训”这样的“坏人”。

很快，《人民日报》开始呼吁共产党员都应该参加对《武训传》的批判。各党政机关也纷纷传达文件，要求批判《武训传》。如教育部在1951年6月2日，向全国教育机关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切实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7月16日，要求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该即刻更换校名。教育部认为“武训一生以行乞方式剥削农民，兴学为地主服务是地主阶级最恭顺的奴才。”^②跟《武训传》以及《武训画传》等有牵扯的文艺界人士也陆续展开批判与自我批判^③。

在《武训传》的批判浪潮中，“武训”的历史形象已经被一再贬低。然而，真正让“武训”从“千古义丐”掉落谷底的，是武训历史调查团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分为五个部分发布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这个调查团的负责人是江青，在当时化名李进。经过一番考察，《武训历史调查记》最终对“武训”这个人的评价是：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

至此，“武训”连同《武训传》一起，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人称赞“武训”这个人物了，《武训传》也成了许多人的历史污点。批判运动的深远影响，在若干年后才逐渐显现^④。所幸的是，不同于后来激进的政治风波，受到《武训传》事件牵连的人，在当时没有被打倒，个人生活未有较大变化，只是做了些口头和书面的自我批判而已。如孙瑜、赵丹等人仍然在岗位上继续工作，夏衍后来还进入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文革爆发，这些人的命运才发生改变。

四、回归凡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武训

1980年，《齐鲁学刊》上发表了张经济的《希望给武训平反》一文，激起了层层波澜。此后《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诸多报刊纷纷转发此消息。1985年，胡乔木在纪念陶行知的研讨会上，为武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74~375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第125页。

③《武训传》的导演孙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5月26日。大力支持《武训传》摄制工作的夏衍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武训”的扮演者赵丹后来曾自我“检讨”说：“我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以反动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想，把武训的屈膝投降的种种丑恶的行径美美化为忍辱负重的斗争手段和所谓的伟大的武训精神。”——赵丹：《赵丹自述》。1949年之后，赵丹除了拍摄《乌鸦与麻雀》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武训传》上。赵丹是山东人。赵丹在黄宗英的告知下得知，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毛泽东。——倪振良：《命运交响曲——赵丹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359页。

④关于“《武训传》批判事件”的深远影响，参见杨俊《〈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一书的第7章，第183~200页。

训讲了几句客观的评价。他认为1951年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①。这段时期,积极呼吁为武训平反的,当属武训家乡的有关人士。1985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呈国务院《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报告》,次年得到国务院的《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批复指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好在彻底查清指责当时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处理。这与《武训传》之涉及陶行知、孙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②这个批复耐人寻味,令人费解。1989年,武训家乡筹建了武训纪念馆,召开了纪念武训逝世90周年的会议,出版了《纪念武训先生逝世九十三周年资料汇编》。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在当年的山东省陶行知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彻底为武训先生恢复名誉呼吁书》。该呼吁书对武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精神感人、业绩卓著。形象崇高,享誉海内,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影响,堪称千古奇丐”^③。武训纪念堂、武训先生故居、武训之墓等建筑陆续得到修缮。

20世纪90年代山东召开了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在学术上已经彻底为武训平反。当年受牵连的相关人物,还在世的也均恢复了工作,并且在不同场合对“武训”及《武训传》给予正面评价。《武训传》也不再是禁片,其价值重新得到了彰显。只不过,中央层面形式上并没有为“武训”事件发布相关平反文件。从一连串的事件来看,官方已经用一种比较微妙、恰当的方式为“《武训传》批判事件”平反。武训形象兜了一个大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五、结语

在民间,人们已经重新认识武训在当代的意义及《武训传》的艺术价值。特别是武训的家乡,诞生了孔孟的齐鲁大地,在用多种方式纪念着武训,宣扬着尊师重教的传统精神。百年来“武训”形象之变迁,与社会变动、政治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主体,各取所需地对武训其人其事进行想象和建构,并与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叙事内容渐行渐远。武训,从最初的一个兴义学的乞丐,慢慢成为一个孝顺、能吃苦、热爱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完人”,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然而,当社会主义时代到来后,在阶级斗争语境下,孙瑜等人试图营造一个受压迫剥削、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训,宣告失败。武训过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就是一个办义学的乞丐,是普通的小人物。后人依时代之需要,对过去的人与事进行适当想象与建构,本无可厚非。但政治权力若过度干涉这一过程,导致塑造了一些歪曲的记忆,甚至牵连到当事人的命运,则实属不当。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郭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 关万维】

①胡乔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

②袁晔:《〈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88~189页。

③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编:《纪念武训先生逝世九十三周年资料汇编》,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印发,1989年7月。

深圳模式：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40年深圳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理论阐释

谢志岚 李 卓

[摘 要] 深圳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政府引领、市场竞争与社会力量参与“三个引擎”共同驱动下，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成功的发展实践，被冠之以“深圳模式”。深圳的现代化发展，符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宏微观经济学所界定的经济发展规律，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同时蕴含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与拉美等后发现代化国家相比，深圳模式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又避免分利联盟左右公共利益，维持了社会总体稳定。这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是深圳模式对现代化发展的最大贡献。

[关键词] 深圳模式 客观经济规律 世界潮流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 D61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097-14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4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2%升至2015年的15%，创造了“中国奇迹”。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曾说“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①。中国的发展吸引了许多政客和学者的目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用以描述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因素和路径。而深圳，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198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特区，在不到40年时间里，深圳由东南边陲一个不到3万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人口和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城市前列，创新力和影响力卓越的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这既是对深圳的期望，也是对深圳发展成就的肯定。

^①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中国：龙的世纪》，《趋势》杂志网站。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1日。

深圳的发展,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得益于制度创新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是一代代深圳劳动者干事创业奋斗的结果。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路径和模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解读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如尤建新等考察了深圳的创新模式^①,Donnell则认为深圳是资本化手段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经济自由化实践远超出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发展模式^②。也有一些研究,对深圳及至中国模式存在偏见乃至歪曲的解释。

“模式”是各种要素的规范组合以及与外界的关系规范,它标志着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概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与演进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发展模式”,意味着深圳模式中蕴含着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独特的发展规律。然而,放眼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的大势,深圳乃至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中的一瞥,是世界经济繁荣和全球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的一个最具活力的典型。深圳乃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打破了哈耶克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而最终必然“通往奴役之路”的悲观论调,成为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要素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范例^③,成功避免了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在由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社会主义派认为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的观点。许明达认为,深圳的发展道路是一条西方市场国家从未走过的线路,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发展之路,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实践,“深圳发展模式”已经初具雏形^④。已有文献从深圳发展成就以及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刻画,但没有系统探究深圳模式何以成功的机制或者规律。笔者认为,讨论深圳模式,不仅要看到深圳的发展成就,分析深圳成就背后的经济、社会、治理原因,还要将深圳的现代化发展放在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长时段和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更好地理解深圳模式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本文将对深圳现代化成就的原因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讨论。在此基础上,从现代化的长时段和大背景下,对深圳模式进行探讨,并对一些关于深圳和中国模式的错误认识进行辨析。

一、开放、分工与产业聚变

深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尽占“天时、地利、人和”。中国适逢其时的开放,为深圳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国门重新开启,国家发展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改革开放的潮流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正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时代的潮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发展高附加值、低耗能的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国外转移。伴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成

①尤建新、卢超、郑海鳌、陈震:《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分析——以上海和深圳为例》,《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7期。

②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20.

③黄蓉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④许明达:《“深圳发展模式”初探——深圳产业结构20年演化的实证考察》,《特区经济》,2000年第10期。

本迅速上升, 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丧失, 并将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①,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 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和国家发展大势, 主动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 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

深圳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极大方便了香港、新加坡地区的产业转移, 容易接受香港等现代化大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1979年4月, 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 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汇报后, 做出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决定, 深圳也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成为改革的试验田。来自香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纺织、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投资深圳, 为深圳的发展注入了原始的动力。地理位置的优越、优惠的政策、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 在这一段对深圳吸引外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80年代的深圳由此纳入国际贸易分工体系,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等相对优势, 按照“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的方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出口创汇型经济。“三来一补”为深圳产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为深圳日后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金和先进管理经验。国内外投资者的集聚, 逐步形成规模效应, 随着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深化, 电子信息产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得以集聚,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 以加工装配为主的低附加值环节逐步向自主研发等高增值产业链环节延伸。时至今日, 深圳已经具备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电子产业为例, 目前, 深圳及其周边地区已形成全球产业链最完整的计算机、通讯、微电子等产业配套市场, “高新技术产品制造所必需的零部件和材料完全实现本地采购和周边采购, 基本实现电子产品部件的即时配套”^②。产业集聚带来的潜在影响是创新和溢出效应的产生, 目前, 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具备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乃至售后服务这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华为、中兴等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在深圳成长壮大, 大量的创意和创新在这里产生, 深圳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 与香港“前店后厂”的格局向更高层次的合作迈进, 深圳制造正向深圳智造转变, 曾在深圳现代产业发展初期起重要作用的“山寨文化”趋于式微^③, 产业发展生态日趋完善, 产业的集聚、溢出、裂变效应明显。

深圳通过加工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的同时, 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也在悄然调整, 深圳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也完成了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集群, 经济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渐趋成型。成为发展速度较快、发展质量较高、经济规模总量在全球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线城市。

二、产权、制度与科技创新

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让投入者有合理回报, 是一切产权制度的核心要义。如果说深圳的崛起源于独特的历史机遇、区位优势和宽松的政策环境, 那么, 让投入者得到合理的回报, 则为深圳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健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利益诱因和动力源泉。如今深圳依然保

①②乐正主编:《深圳之路》, 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116、146页。

③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持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十二五期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9.6%,2016年同比2015年增长11.4%^①,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这得益于深圳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和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也得益于深圳市委市政府积极作为,不断优化政府公共职能,对劳动、资本以及知识等产权的保护,通过制度保障投入者获得合理的回报,激发了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涌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动。

产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意指生产要素所有者对自身所有要素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等权益。合理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有效激发产权所有者的积极性。诺思等认为,“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否则,“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受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②。

产权保护一直是深圳市制定经济政策中的重要部分。目前,深圳各类要素市场的法规体系已比较健全,有效维护了各类要素市场的正常运行。无论是劳动、资本还是土地,凡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要素合法经营、诚信劳动都会获得与其投入相对应的收益。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例,当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地区还在吃“大锅饭”的时候,深圳已经开始鼓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实现致富。深圳从制度层面不断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1983年8月26日,颁布《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打破固定工制,实行劳资双方双向选择,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用工制度,首开劳动力商品化先河,激发劳动者活力;1986年,在全市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对企业干部职工实行合同化管理,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者择业自主权和企业的用人自主权;1994年8月,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劳动合同制成为深圳企业最主要的用工形式。一系列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不断优化了劳动者的收益结构,极大地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注重保障多数人利益,构建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由全国各地涌入深圳的原因之一,给予劳动者与其劳动投入成比例、远高于内地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在一定时间内为深圳创造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有利条件,这也促进了深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

深圳较早开展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在国内较早着手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产委员会—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运营新体制,实现了政企分离。同时,积极探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首创国有出资人制度,实现了资产所有者职能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③;同时,重视培育民营企业,对外来投资者的利益予以保护。近年来,深圳市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通过设立深圳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积极探索投资者权益救济新渠道;重点打击社会影响恶劣的非法证券活动;推动上市公司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维护投资者知情权、参与权与市场信心等措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深圳证监局大力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及时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对辖区上市公司的章程逐家进行审阅,对公司章程未明确

①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5页。

②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③乐正主编:《深圳之路》,第22页。

现金分红规定以及未按照章程实施分红的公司,逐家实施约谈,引导、督促有关公司制订股东回报规划、完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明确分红政策,并通过修改公司章程予以固化,通过公开披露增强透明度和约束力,切实让投资者得到公正合理的收益。

为保护劳动者的智力成果,近年来,深圳市严格贯彻落实《国家专利法》,2008年4月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培训、宣传和执法工作,促进自主创新,维护全市市场经济秩序。2017年,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目前,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近10.7万件,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PCT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3.1%^①;仅2016年,深圳全市共申请专利145294项,其中发明专利56336项,PCT国际专利申请19648项^②,在专利数量上深圳较国内其他城市具有较大优势。当然,深圳的创新孵化能力目前也得到了世界认可,到2016年,全市拥有不同级别的创新平台1493个;2017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题为《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的长篇报道指出,深圳通过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成本,采取开放式创新等策略,吸引了许多热衷于开发新制作方法的企业家,正在改写世界创新规则,形成创新型企业集群。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创新驱动是深圳在越过重工业发展阶段弯道超车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动力。罗斯托在解释欧洲“起飞”的问题时,将科学革命作为分水岭^③。乔尔·莫基尔认为,技术演变处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④。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⑤。从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史来看,科技进步的确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熊彼特指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最终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创新者能否得到金融上的支持,有效的资本市场背后,是一整套有效的金融制度^⑥。也就是说,使新想法、新理念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生产力,还需要一系列经济、金融制度的支持。与熊彼特不同,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对社会的影响,有赖于产权制度的界定,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提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其根本原因不是技术进步,而是能够激励技术进步的制度框架,尤其是关于产权的制度框架。西方社会崛起的真正动力是产权保护,特别是对企业产权、知识产权以及继承权的保护。

这些对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极具洞察力的分析,给深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20世纪80年代起,良好的市场环境建设和产权制度改革便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全过程。与内地一些地区“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同,深圳市政府部门一开始就扮演着“有限政府”的角色,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引导,而不过多的涉足企业经营问题,无论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还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府更多的时候是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运行搭建一个制度框架,而具体的表演则交给经济舞台上的主体,甚至有时会提供税收等政策方面的优惠。

①龚霏菲、王珩:《今年深圳继续实施最严知识产权保护》,《深圳商报》,2018年05月25日。

②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365页。

③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④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华夏出版社,2008年。

⑤Paul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⑥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3~74页。

深圳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等多种形式对劳动者的权益、科技人才智力成果以及民营企业的资本投入等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营造了一个鼓励创新行为、支持创新活动、保护创新成果的良好创新环境,有效吸引、集聚了全国甚至全球的创新资源,形成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和创新环境。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深圳不断推动金融创新,减少创新创业落地环节,减少从科技研发到生产力转化距离,尤其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尽可能激发各种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创新的积极性。

为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深圳积极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科技企业发展与科技人才利益以制度保障,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贡献率。1987年,深圳在国内率先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个人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投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获得对其智力产品的红利收益;1998年,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成为国内最早制定技术成果可以出资入股的城市之一;1993年5月,颁布《深圳市企业奖励技术开发人员暂行办法》,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当年6月,再次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1994年,专门涉及知识产权的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出台;2000年10月,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成立,主要交易对象为高新技术成果、项目以及成长型企业产权,为深圳及全国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提供了平台,实现以市场化机制为科技成果定价;2009年10月,深圳率先成立全国区域性非公开科技企业柜台交易市场—深柜市场,为中小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包括私募融资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在研究开发、投资担保、人才引进、技术入股等方面为科技创新和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尊重智力成果,发挥人才作用,提升了各类人才来深就业、创业的积极性,促进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深圳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为鼓励金融业发展,2003年颁布《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2007年又出台《深圳市金融产业布局规划》和《深圳市金融产业服务基地规划》,不断加大对金融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优化的环境和最优质的服务,目前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①。资本市场的形成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扩展了融资渠道、优化了资源配置,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创新产品从研发到上市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综观深圳发展模式的成功,最基本的经验在于尊重产权,尊重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为此,政府与市场环境和社会力量形成了良性互动,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下,成功实现推动经济发展由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等原始因素,逐渐转变为依靠创新力驱动。仅2016年,深圳市科技经费支出占当年GDP的6.3%,同年,深圳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7847.72亿元,比2015年同比增长10.6%,占GDP比重40.3%^②,由此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尊重产权、尊重市场,也塑造了深圳的企业家精神,给知识、资本和劳动以合理的价值回报,成为深圳企业家的重要经营理念和原则,以华为、万科等为代表的公司,在股份化过程中推行的员工持股计划(劳动雇佣资本),为公司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与活力,也为深圳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最佳的注脚。

①乐正主编:《深圳之路》,第522页。

②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5、369、46页。

三、移民文化、契约精神与交易成本

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契约精神。现代契约精神起源于16世纪至17世纪市场经济和商品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由于这些地区人口流动性较高,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扩大“社会信任”的范围,建立更稳定的交易关系,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交易实践中,逐渐建立了“契约关系”。契约精神是公民德行的一种表现,通过对彼此权利义务的尊重,逐步建立起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由此可以降低为达成交易而进行反复谈判的成本和交易产生后进行事后监督的成本。

交易成本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于信任关系和契约精神的培养。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通过比较美德意日韩以及中国文化中蕴含的特质及其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大企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经济繁荣是由该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即信任程度决定的^①。与福山对社会信任程度的重视相似,普特南提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②,具有相互信任关系的人倾向于相互合作,降低了违约的可能性,促进了市场交易的繁荣和发展。诚信是契约精神的一种体现,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

深圳由一个以熟人社会、宗族社会为基础的沿海小镇转化为一个移民占主体、人口快速流动为特征的生人社会,深圳移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对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十分有益。移民社会与其他本土人口占主体的社会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缺乏持久且浓厚的宗族、血缘和乡土地缘等纽带,缺乏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基础,也缺乏传统的聚落或社区舆论或团体压力机制,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多依靠陌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机制,而非熟人之间的裙带关系,这体现在深圳对契约和法治观念的重视,契约精神也因此深深的熔铸在深圳企业家的骨子里。万科创始人王石指出,深圳商人靠的是契约,契约精神是深圳商人内在的基因,而这种精神更多的是建立在平等、自由而非特权基础之上,这也是深商区别于传统的徽商、晋商、浙商和潮汕商人等四大商帮的重要特征,其结构构成上真正地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特征^③。

除了契约精神,移民文化因为其独特的人口结构与特殊的生存压力,还产生了其他一些特质,如移民文化更具开放包容、开拓创新精神等,这些特质与深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息息相关,这一点众多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④。深圳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形成了以创新、开放、包容、公共精神、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市场意识以及科技、效率和务实精神等为特质,与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⑤。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一种适合现代性精神的文化,对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深圳移民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具有很强的优势。深圳文化原属于岭南文化的一个分支,特区成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数量迅速超过了原住民,加之海外其他国家人口的流入,

①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②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③ 范京蓉、曾浩:《深商成功体现契约精神》,《深圳特区报》,2013年12月27日。

④ 王京生:《深圳十大观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

⑤ 谢志岩、李卓:《移民文化精神与新兴城市发展:基于深圳经验》,《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深圳人口逐渐多元化,形成了文化的色拉盘,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①,各种文化群体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因此“来了就是深圳人”,一句话道出了深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情怀,也降低了外来人口在深圳就业、创业的心理门槛,这对吸引资金、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深圳城市建设的主体是外来流动人口,而那些离开家乡到深圳创业和工作的移民,大都怀抱梦想,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不远千里,离开家乡来深圳打拼,陌生的地域、陌生的环境造就了这些人敢打敢拼、吃苦耐劳的精神,唯有如此,才可能生存下去。他们不满足于原生活地区的生活,具有追求新的生活的激情和梦想,也更愿意为了生存而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些流动到深圳的“淘金者”要比普通的劳动力更具开拓精神,这为他们在深圳干事创业塑造了优质的个人品质。创新精神是深圳移民文化的另一个特质,也是深圳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的精神和灵魂,上一节对此已经进行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包容、进取、重视诚信和契约精神的城市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降低营商成本、产权保护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力量共同为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由于没有垄断地位的社会圈子和地域文化,没有排外的社会气质,重产品、重能力、重契约而不是重社会关系,使得市场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这也是国内许多企业成立在外地但最终选择将公司总部设立在深圳的原因之一。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为深圳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市场、顾客与服务文化

率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进行探索,是深圳经济特区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使命和贡献^②。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地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深圳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赋予一定区域的国土实行“例外主义”,探索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③。市场和计划是配置资源的两种不同的手段,且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意志对资源的配置影响较大,因此,“找市长”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关系社会中,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宝。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当市场供需关系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时,企业的生存发展则更需“找市场”。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并通过这一机制配置资源,是深圳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制度基础。

企业赢得市场的两个基本手段即产品质量和价格,但是,随着科技创新的扩散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格逐步接近时,企业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服务——显得尤为重要,其内涵也更加丰富,不同企业间也难以完全复制和趋同。服务逐渐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关乎企

①马敏、谢志岩:《移民社会与深圳城市文化特质》,《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年第3期。

②方映灵:《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体制改革初探》,《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73~180页。

③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业的生存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服务文化是深圳城市文化特质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国营企业因为其经营模式僵化,对经济绩效重视程度不够,“铁饭碗”“大锅饭”对员工的有效激励不足,员工依然作风散漫,不仅效率低下,服务态度更是令人难以接受。深圳的经济结构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具有明显差别,国有经济、中外合资经济、股份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多种成分并存,不同的经济派生出多元的亚文化,服务文化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文化元素^①。

与传统的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市场、在顾客,对效率和市场的依赖性更强。作为内地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企业家和员工都具有浓厚的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形成了一种企业要生存、要发展,需要“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这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化生存竞争压力下形成的一种突出的思维观念。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体现在深圳的绝大多数企业文化之中,成为企业吸引和留住顾客、争取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著名通讯企业华为一直以来都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旨在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品质,推出了24℃服务理念,力争在任何一家华为专卖店,顾客都能享受购买无忧体验和产品享乐体验,以及热情、专业、高效的服务^②。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提高顾客对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当然,深圳企业的服务理念也体现在众多日常的细节之中,比如,如果一名顾客在就餐时手机临时需要充电,深圳几乎每一家餐馆,都可以满足顾客的这一需求,而相形之下,上海、北京等全国著名的商业中心城市,很多餐馆包括知名连锁餐饮企业都不为顾客提供这一服务。

这种以顾客导向的企业价值理念,是深圳众多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也是目前深圳城市竞争力的源泉。今天,国内众多的省份和城市,不惜出台较大力度的政策优惠加入人才争夺大战,据《2016 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当年深圳年轻人口净增率达22.53%,仍居全国城市首位,而同期北京、上海为7%左右,广州则为负10%^③。在深圳,尽管现状大学规模偏小,但是,全国其他地区重点大学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大会一部分会流向深圳,为深圳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智力支持。这一方面取决于深圳高端企业云集、个人职业发展前景广阔这一经济诱因,同时也得益于深圳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公共服务氛围,城市移民文化等软实力,正在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五、法治、共治与社会变迁的秩序供给

经济发展,离不开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关于变迁社会中的秩序形成,以往的学者曾经有过经典的论述。社会学鼻祖孔德和迪尔凯姆都曾对此进行了讨论。迪尔凯姆提出“失范”一词来刻画变迁社会中容易出现混乱问题的现象。他认为,当社会变迁时,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行为规范尚未形成,在这一空档期,社会容易出现混乱。著名政治学学家亨廷顿分析了变化社会中政治秩序形成的机制。通过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发展历程,发现国家间(政治稳定状况)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的有效程度。为此,他运用政治动员程度和社会组织程度两个概念来分析一个国家现代化历程

①马敏、谢志岩:《移民社会与深圳城市文化特质》,《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年第3期。

②《华为24℃服务理念 用脉脉温情感动用户》, http://tech.ifeng.com/a/20180410/44944076_0.shtml, 2018年4月10日。

③《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 <http://tech.qq.com/a/20160504/028122.htm#p=33>, 2016年5月4日。

中政治秩序稳定与否。在他看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不仅在于民主化程度的高低,而且也在于将民众有效组织起来,如此才能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混乱和无序^①。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走上现代化进程,但是却遇到了诸如军事政变、寡头政治等问题,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不能自拔,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简单地套用英、美等成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类似现代“民主”的制度下,民众要么被广泛动员起来,缺乏一个有效组织的政党;要么在某些政党夺取政权后,过分压制民众的政治参与,从而导致社会出现混乱、腐败和动荡。

那么,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良性的社会秩序呢?与孔德将社会秩序的建立寄托于神道教哲学的宣扬和迪尔凯姆将重建社会团结的纽带寄托于职业团体的发展不同,亨廷顿将政治秩序寄托在一个既能吸纳民众广泛参与,又能将民众有效组织起来的有效政府,因此一个强大的政党或者政府对于有效治理必不可少。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型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是一个独特的优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保持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和主动性,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深圳信奉“有限有为政府、有效有序市场”这一信条,尊重市场、重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尽量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注意通过法治来维持市场秩序,规范政商关系;又充当看得见的手,通过必要的规划、财政和金融干预手段,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深圳获得立法权之后,积极推进依法治市,在经济立法、社会立法和行政立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规范市场价格,应对价格失灵,1995年11月深圳制定特区第一部地方性价格管理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价格管理条例》;1999年1月,深圳市委做出《关于加强依法治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的决定》,提出从九个方面实现行政机构和行为法定化,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廉政建设,建立“高效、务实、廉洁”的服务型政府;2000年10月,发布《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对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各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审查、统一要求、统一公布,凡不按“三统一原则”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执行效力。深圳还建立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通过前移审查关口将政府行为导入法制轨道,为政府重大决策、行政行为及重大合同行为提供法律意见,有效避免了决策错误和行政违法。为规范行政审批权,完善商事登记制度,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放宽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推行注册资本登记改革,变“实缴”为“认缴”,企业注册程序更加便捷,注册成本大大降低。

在通过法律手段规范行政部门的审批手续的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及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商事制度改革。2001年上半年,深圳宣布推行“政府提速”运动,目标是进一步革除一些政府部门懒散和僵化的作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2003年,市政府颁布《关于为我市大企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的若干措施》,要求“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设立大企业‘直通车’服务窗口,为大企业提供业务申请、咨询、指导、督办及投诉受理等服务。近年来,深圳紧紧依托互联网给社会治理带来的便利和契机,大力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2015年7月,深圳即在全国率先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经过几年的实践,深圳商事改革不断走向完善,2018年7月3日,深圳出台《深圳市2018年推进“多证合一”信息共享改革工作方案》,逐步将包括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等在内的涉及40多个部门的30多个证照“合一”,通过行政审批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基本实现企业

①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3~86页。

“一表申请、一次登记、一码通行”^①。深圳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打造智慧城市新动力”、营造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改革任务。深圳市政府积极推动各行政部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重构审批业务规则,通过全程网上办理,实现申请人和审批窗口工作人员不需要见面就能审批办结的“不见面审批”模式,在市场监管、人力资源保障、公安、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等领域推出11类100个“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100%网上申报、100%网上审批”,极大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降低了各市场主体办事成本^②。政府的高效服务,降低了营商成本,极大地促进了营商便利化,政府对市场较少的直接干预,也使得深圳成为中国内地市场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地区。对产权的尊重保护以及一系列制度创新,也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业活动,截至2018年6月,全市商事主体达319.7万户,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是全国商事主体规模和密度最大的地区^③。

除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市场要素流动和法治手段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深圳还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完善收入分配,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积极动员和组织深圳市民和社会组织加入改革发展的洪流中去,不断转变执政理念,让权于民,让权于社会组织。率先在全国探索实行社区居民民主选举、推进业主委员会依法自治管理,建立起社会听证制度、民生民主、人大代表工作室制度以及社区居民自治等多种形式的民主机制,保证社情民意充分反映给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从而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政府在动员基层民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对民众的组织引导。深圳通过购买服务,实现“费随事转”,以项目性资助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式合作伙伴关系。为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社会组织发展规范实施方案(2010—2012年)》和《推进政府职能和工作事项转移委托工作实施方案》,从体制机制上拓展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凡是能够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积极移交社会组织承担;凡是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要切实履行好。深圳市民政局在2010年公共服务白皮书中,提出“加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能力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运营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将社会组织培育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深圳市实行行业协会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推动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探索行业协会及其他组织直接登记,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

通过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引导,将公民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和意愿表达纳入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使社会组织成为深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初步形成多元治理的新格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秩序提供者,也不再是惟一的社会治理者,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构建起了多层次、多主体的多种主体共治格局。

六、深圳模式: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发展缩影

本文回顾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成功的一些主要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深圳经济崛起的条件、从加工出口贸易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分析了一个有为但有

①李佳佳:《“三十证合一”,深圳商事制度改革继续领跑全国》,《深圳商报》,2018年7月13日,A02版。

②深圳市人民政府:《审批不见面,办事零跑腿》,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wdt/201806/t20180628_12295019.htm, 2018年6月28日。

③何泳:《深圳新登记外资企业大幅增长》,《深圳特区报》,2018年7月18日,A01版。

限的政府在深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深圳移民社会文化特质和服务文化理念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深圳政府部门如何在实现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发现,深圳的发展成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个引擎”共同驱动的结果。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深圳经济腾飞的核心机制,政府因势利导不断制度创新是实现这一成功的重要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禀赋艰苦创业的执着,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深圳无疑已经具备了道格拉斯·诺思所言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亨廷顿提出的“有效的统治”的特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界定产权,并为产权提供制度保障等激励机制,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形成民营经济比例较高的经济格局;通过市场杠杆和科学规划的引导,成功实现由加工出口贸易到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通过契约精神和城市文化的培育、制度法规的制定完善,为深圳经济社会营造了鼓励创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

回顾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离不开各项制度创新。从经济特区的创立,到各类产权保护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形成,到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都与改革开放的制度创制有关。这赋予了深圳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中央通过为深圳提供宽松政策环境的支持,使得深圳获得了内地其他省市发展所不具有的制度环境,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社会各种活力和创新动力竞相迸发,新的想法可以快速落地实践,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在这里得到了生动实践。有为但有限的政府管理,是深圳模式的一大特色。

深圳的崛起源于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国际贸易体系逐步建立,深圳积极主动切入国际分工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中国的发展符合世界的需要,一个发展的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远比一个落后的中国要大。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空间。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香港一水之隔的地理优势,为深圳承接劳动密集型以及部分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奠定了先天优势。深圳对于国际环境的判断与历史发展机遇的把握是其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发展动力和发展结果上来看,创新型驱动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深圳社会有意识引导的重要方向。目前,在适当的政策引导和创新驱动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与一些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不同,深圳在发展过程中,成功避开了奥尔森所描述的分利联盟^①。尽管深圳经济总量很大,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云集,但是这些企业并未形成利益联盟来对公众以及政府机构施加影响,从而谋求个人的私利,也由此避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政治格局为利益集团所左右而引发的乱象。由于有效的治理、充分的民众动员、共建共治共享体制的建立,也避免了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移民社会所具备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使得深圳人形成了较强的公共精神,深圳的志愿服务精神远近闻名,被称为“志愿者之城”;市民积极参与各项公共领域,成为深圳社会真正的主人,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主体作用。

从对深圳发展原因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成功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政府管理创新和社会文化创新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创新是深圳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圳经济上的成

^①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年。

功,符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现代宏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一座城市从落后的农业区域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的典型案例。因此,深圳的成功,并不是违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内在规律的“非典型”成功,而且她的成功具有世界范围的可学习性和可复制性。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还是从促使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关键因素来分析,均没有突破以往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发展理论所包含的因素,只是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影响最小化”主张进行否定的一个典型案例^①。首先,从发展经济学来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过一个从模仿学习到逐步创新的过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从“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模式,到成为国家创新创意之都的过程,走的就是一条后发现代化地区典型道路;其次,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强势政府的影响和推动,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同样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是政府到位而不越位的角色,恰恰为深圳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政策空间,无论从中央的政策优惠到深圳本土的社会治理都体现了这一点;第三,从交易成本经济学或者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交易费用的降低以及要素所有者的有效激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深圳在发展过程中,明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政商关系,以及移民社会缺乏传统惯性思维束缚,而具备强烈的契约精神、法治意识等条件,都对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积极意义。产权的保护和配套金融市场改革、融资渠道的拓宽,劳动力、原料和资金的配套能力,使得深圳成为全球创新的温室,并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创意、技术和大量资金的涌入,强大的创新能力与配套制度的完美结合,刺激了深圳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总之,深圳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符合经济学规律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发展实践,有为但有限的政府(干预)、对创新的宽容与鼓励、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对经济发展长远的规划,都是深圳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当然,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也有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不一样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发展资源的集中动员、产业规划和对诸如分利联盟的限制等。作为一种国家能力,这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防止出现发展陷阱。正是合规律性与合国情性,构成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发展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也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一些西方国家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低人权、低自由、大政府的发展模式,这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实践,体现了深圳社会、政策环境对人的要素的保护和重视,无论是人的劳动权、智力权以及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都得到了制度化保障;不断创新发展的,为市场经济要素的交易、流动创设平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精神理念,无不体现出整个社会对自由的尊重和热爱;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科学规划,更体现了一个大国政府在谋求治理的现代化与有效性的努力,到位而不越位的政府管理体制,更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特色之一。

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照搬西方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是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具有

^①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自身的特色。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中国成功地从世界欠发达地区变成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这种转变及其背后成功的原因，值得各国研究和借鉴。诚然，深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并非十全十美，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仍存在一些偏差和不足，但也并非如一些意识形态偏见者所歪曲的那样，是一种异端。恰恰相反，中国道路在目的、手段上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国情，在发展效果上也有益于世界现代化进程。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发展道路与世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基本规律的契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宜过分强调特殊，更不是异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可学习可复制的基础。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在一些核心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体制方面，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世界潮流的，符合现代化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一些学者片面以政治制度的差异解释中国发展，忽视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世界现代化发展在上述基本政治价值和基本经济理论、经济规律的契合性^①，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容易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世界发展潮流相对立。另一方面，我们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要坚持基于中国国情所发展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制度优势、理论优势。苏联、东欧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表明，单纯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稳定地获得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许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确保中国区别于东欧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繁荣稳定发展的X因素。

作者简介：谢志岚，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广东深圳 518028；李卓，河北省公安厅公务员，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河北石家庄 050051

【责任编辑 杨从从】

①文一：《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新制度经济学批判》，2018年9月10日清华大学国情讲坛演讲稿。

城市文化治理的深圳经验： 以“图书馆之城”建设为例^{*}

李丹舟

[摘 要] 深圳文化建设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区精神文明建设逐步进阶为“文化立市”（2003年）、“文化强市”（2010年）和“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2016年）。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有机构成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特区城市初期的文化基础设施兴建和文化活动展开，逐渐拓展为公共文化体系的政策完善和纵深覆盖。“图书馆之城”的案例深刻说明深圳从“经济深圳”转向“文化深圳”的文化自觉，在治理要素上体现为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在治理目标上则旨在通过公共阅读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来推动全民阅读的社会化参与，富有书香气息的城市人文精神彰显出这座移民城市所具备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城市文化治理 “图书馆之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深圳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111-10

一、问题的提出

从大拆大建到保留城市肌理的有机更新是新时代城市更新的新要求、新内容与新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文化进入中国城市更新的视域与房地产市场的适应性调整息息相关，不仅意味着从“拆除重建—开发销售—重资产运营”的传统做法转向“投资建设—运营项目—轻资产运营”的再开发链条，更说明以“投资美好生活方式”“消费升级”为诉求的发展逻辑正在逐步修正地方政府以土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学科共建项目“城市再生的文化嵌入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深圳市为例”（项目号：GD16XYS09）；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基于深圳市旧城改造的文化逻辑与内在机理研究”（项目号：2016WQNCX128）；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深圳市城市更新的文化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号：135C004）；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视觉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转向”（项目号：16QNFC13）的阶段性成果。

地财税开发项目的卖地招商模式。如果说以地产商为主导的土地增值是一门硬件设施更新的生意,那么将生意变成生产和生活则需要产业结构、文化积淀、公共服务和基层组织的全方位支撑,意即城市能够为就业人口和常住人口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来吸引“新移民”落脚,以此来焕发内在活力和外在吸引力。由此,文化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地文脉梳理、公共服务配套乃至城市精神塑造上的价值日益凸显。

西方的城市化走过类似的道路,从清拆重建的城市更新到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城市再生,观念的转变揭示出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才是让城市旧貌换新颜的内在要义。其中,城市更新主要由政府部门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多部门协同治理结构来改进社区环境和居民生活,在手段上以社区参与、PPP模式(又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和企业主义为显著特征。与西方相似,政府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发挥着主导者的作用:我国城市更新的主管部门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推进实施城市总体规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完善城市整体功能上起到了引导作用。而城市更新转向“文化”之后出现的工业遗产、“特色小镇”等新型空间,以及历史文化名胜名城名镇名村“四名一体”寻求未来空间转型升级,均需要文化主管部门的加持。事实上,2009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在《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提出推进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至2018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旅游、文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可以看到,文化部门在城市更新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现实需要,同时已经在管理机构的层面做出调整。

基于上述现象,深圳在城市文化治理上有哪些制度性的经验和启示?本文通过梳理深圳的城市创立沿革和总结创新型城市的制度优势,通过把握深圳文化建设的阶段性任务,认为深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治理结构现代化、治理要素专业化和治理方式数字化等特点,以“图书馆之城建设”为代表的案例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改革才能为城市描绘和谐灵动的肌理而避免成为只能用来入睡的空城。

二、深圳文化治理的制度性经验

(一)创新型城市的深圳特点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可谓城市文化的根基所在。早在西晋时期深圳便设置郡县,宝安县迄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因其三面临海的地理位置以及依山靠水的独特地貌,在本地人的基础上,数百年来陆续有广府人(一般认为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粤语民系)、客家人(多栖居在东部和北部的山区)、潮汕人来到深圳,构成一种将广府和潮汕的“咸水文化”与客家“淡水文化”相结合的“咸淡水文化”,这可以说是深圳文化的前身^①。立足于文脉传承的角度,深圳文化固然有其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轨迹,但现代城市文化的兴起则必须置于经济特区的成立及30余年来政策创新的现实

^①根据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志·风俗》记载:“邑在晋为郡,西晋永嘉(公元307-313年)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源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三拨移民潮给深圳带来多样化的方言构成、以“三鲜”“三咸”“三嗜”为特色的饮食习俗,融合砖瓦排屋、围屋等建筑在内的传统民居,以农业、渔业等为组成要素的生产方式,丰富多元的婚嫁寿诞习俗,以上也为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廖虹雷:《深圳风物志(风土人情卷)》,海天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语境下进行分析。已有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生产体系分工转移而推动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国际形势转向“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深圳经济特区创立的宏观背景^①。而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则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个历史事件相关^②:一是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联合组建的考察组对香港和澳门进行实地考察,向中央建议把毗邻港澳的宝安和珠海规划为出口基地以及面向港澳游客的游览区,这一考察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二是1979年1月,作为交通部驻港商业机构的香港招商局呈请国务院在位于深圳西部的蛇口兴建码头、船坞等一批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企业,提出利用国内相对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结合香港和国外的资金、技术等来推动工业化建设,这一主张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并于1979年夏天展开蛇口的工业区建设;三是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提出在广东试点开放、建设贸易合作区的思路,邓小平同志表示赞同:“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3月,国务院召开广东和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提出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至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由此诞生。

特区之“特”体现为在国家设立的特定经济区域内实现一套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以此来探索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扩大对外开放与构建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两个层面的实践方案。一方面,从体制改革创新来看,深圳经验突出表现为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经济体制改革与上层建筑改革四方面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③。自特区创立起,具体的改革方案涵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企业股份制改革、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及住房制度改革、基建管理体制、价格体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劳动工资保险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在30余年间,深圳不仅实现了从以市场为导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再到经济增长方式向“效益深圳”的转型,更在管理体制上多方推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和谐深圳”等政治与社会建设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从坚持对外开放来看,深圳经验体现为充分发挥邻近香港的区域特色,立足于国内与国际两种市场环境的优势下积极探索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三来一补”等模式,融合“引进来”与“走出去”,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部署和对外开放格局的确立起到了引领作用^④。肇始于蛇口工业区的对外开放,特区通过开放沙头角镇、引进外来技术和原材料、联合对内经济技术、开放罗湖等边检口岸等举措来提高开放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确立外向型经济为方针的发展纲要,实现城市从农业过渡至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在以加工贸易为特点的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抓住全球生产分工调整而推动产业结构趋于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历史机遇,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金

①陶一桃、鲁志国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要》,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31页。

②董建中主编:《深圳经济变革大事》,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③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④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融、物流、旅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来实践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新世纪以来,由“速度深圳”转向“效益深圳”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向型到开放型的转移,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企业自主创新来培育本土品牌和自有技术,推动产业结构从代加工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变,建成以“绿色经济”“知识经济”等为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

可以说,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构成深圳独具一格的城市化动能。其创新型城市建设之路说明,工业时代的农村城市化向城市现代化以及后工业时代国际化大都市的进阶式发展战略,能够综合浓缩在一座建市历史仅有40年不到的新兴城市之上,并不断地产出敢为人先的丰富经验。具体而言,始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深圳的城市建设与现代化逐渐产生内在关联,但彼时的城市现代化集中表现为广大农村的城市化、城市现代规划两条主线的交叉:一来,特区成立初期以农业经济和农村生活为主的社会结构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冲击。在特区成立的前20年,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迅速下降,但第一产业产值逐渐增长且出口创汇的比例上升,第二、三产业对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造成较大影响,促使农村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内在需要。自1992年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特区管辖范围内的68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以及沙河华侨农场改为100个居委会、66个城市集体股份有限公司和12家企业公司^①。这标志着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非农化进程的加速,不仅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而出现了大量“城中村”及其背后的管治问题,更意味着农民的市民化——意即人的城市化逐渐成为城市治理的关注对象。二来,城市现代规划指的是将特区作为空白的蓝图,植入现代化的发展理念、设计方案和管理体制来建设一座新兴的经济特区。特区创始阶段的《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年)相继对片区分布、基础设施、交通路桥、园林绿化等现代城市的土地使用进行初步设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深圳市城市发展策略》(1990年)、《深圳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1990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1996年)、《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1998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2001-2005)》(2001年)、《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2003-2005)》(2003年)进一步对城市的整体结构布局进行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是城市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比如《深圳市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十五”规划》《深圳经济特区供水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燃气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深圳市户籍制度改革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旨在构建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管理制度。而后工业时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定位,则是出于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新的城市现代化构想^②,主张发展高端服务业和外向型经济,推动深圳“依托华南、立足珠三角、加强深港合作,共同构建世界级都市经济,力争使深港国际大都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能够比肩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级大都市”^③。

(二) 深圳城市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特区城市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与特点直接决定了深圳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方向,使得深圳城市文化治理从总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初始阶段(20

^①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②③}这里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指的是深圳在经济发展二十年后面临“土地、能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同时全球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所致。因此,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端服务业成为大势所趋。董建中主编:《深圳经济变革大事》,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288~289、306页,第320页。

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必要保证,深圳应当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为指导方针来探索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路。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文件,市委、市政府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助推作用,相继颁布了包括《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纲》(1985年)、《深圳精神文明建设“八五”规划》(1991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来推进以城市、农村、企业和机关为主轴的特区精神文明建设^①。总的来看,敢闯敢干的特区精神为深圳文化奠定坚实基础,另外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移民城市具有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在这一阶段开始萌芽。第二,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随着经济特区市场化体制转型的基本建成和全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确立,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的深圳提出科教兴市战略和现代文化名城建设来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时期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成为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旨在建成包括关山月美术馆、深圳书城、深圳画院、何香凝美术馆、深圳特区报业大厦、深圳商报大厦、深圳有线电视台、华夏艺术中心在内的“新八大”,以及包括深圳图书馆(新)、深圳音乐厅、中心书城、现代艺术中心、深圳电视中心、深圳少年宫在内的“新六大”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此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以演艺市场、音像市场、艺术品销售市场、文化旅游市场等为构成要素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初具规模,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改革逐渐展开,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兴起为新世纪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打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名城”的战略部署非常重视深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窗口作用,尤其是要能够向世界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经验和美好未来。

第三,“文化立市”的确立可谓21世纪深圳城市文化治理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主张全方位地提升城市文化的发展水平,在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同时,更要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来积极融入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出于深圳的城市发展方式走向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外向型经济,这一理念在2003年深圳市委三届六次会议上得以正式提出,强调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建议将文化的力量融入特区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之中。在深圳发展模式的转变背景下,“文化立市”的战略部署意味着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来阐释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具体实施层面则通过“两城一都一基地”(指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动漫基地)的形象定位,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移民城市的市民文化权利,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来使深圳成为立足珠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城市和国家化现代文化名城。第四,201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文化强市”的发展目标^②,这意味着在“文化立市”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入推进特区文化建设,将文化与经济一并作

①城市的安全文明小区和文明社区创建、农村的股份合作经济管理机制、企业的文化建设、机关单位的文明窗口等方面合力构成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框架结构。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②已有研究认为,“文化强市”的提出原因有二:一是对2010年7月广东省委第十届七次全会颁布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的特区回应,二是对2003年“文化立市”的积极拓展,进一步明确“文化”在城市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目标。陈威:《建设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实现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转引自彭立勋主编:《文化强市建设与城市转型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为城市发展的支柱性力量,积极发挥文化的多方优势来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城市升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文化强市”的“文化”涵盖文化的精神价值、产业价值、公共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作为“十三五”期间深圳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2016年由深圳市政府颁布的《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可视作“文化强市”战略目标的拓展与深化,提出以国家文化创意先锋城市作为发展方向,建立建成与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的文化名城。

深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城市文化建设的演进轨迹可谓相辅相成,已有研究认为总体上可概括为三个阶段^①:一是特区成立至新世纪初期的“文化之城”建设,这一时期的公共文化事业主要强调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制定《深圳市1995-2010年文化发展规划》并确立“现代文化名城”为发展目标,显示出深圳对公共文化事业和市民文化权利的重视;二是“文化立市”战略部署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构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是提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相继出台《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2003年)、《深圳市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5-2010)》(2005年)、《深圳市文化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年)、《深圳市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方案》(2007年)等系列指导文件来构建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框架,进一步制定《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3-2005)三年实施方案》《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深圳市文化局重大公益文化活动实行社会化运作试行办法》等具体制度法规来说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施政举措;三是“文化强市”战略目标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纵深完善,着力缩小原关内关外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距,加原大关外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资金投入,深入落实包括城市文化品位提升、市民文化艺术素养提升、外来劳工文化服务等文化民生工程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子系统。

概括而言,公共文化服务对城市更新的启示在深圳的落实如下:第一,《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方案(2014-2016)》明确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三大方向,分别为“建立协调机制让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推动多元化供给实现公共文化供需对接、建立法人治理机制”^②。例如,深圳图书馆是最早一批试点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属公共文化机构,分别来自教育、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11名专家组建理事会,负责未来的发展规划和重大事项议事权及决策权,这也是从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典型案例。又如,政府推行公益文化社会化运作招标工程,主张向文化企业和文艺团体购买数百项文化活动,可视为公共文化多元化供给的集中体现。2015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颁布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组的成立,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体制和财政制度实现特区内外及基层单位的统筹协调,进而推进深圳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进程。第二,如毛少莹将公共文化服务的种类细化为16种^③,深圳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均涵盖了这些种类并形成具有自身特性的成效: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文化

①吴理财等:《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②付莹:《深圳重大改革创新史略(1979-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4页。

③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基本范围包括:1、公立博物馆、艺术馆及展馆展示;2、公共图书馆服务;3、文化馆、社区文化中心各类文化服务;4、公共文化信息服务(文化网站、艺讯、文化地图、公益性海报等);5、高雅艺术场馆(大剧院、音乐厅等);6、高雅艺术团体;7、重大艺术节庆;8、对外文化交流(演出、展览、互访、艺术家发展计划等);9、民族文化传统艺术团体;10、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工艺的传承与展示;11、民族传统节日等文化活动;12、艺术学校;13、中小学艺术课程;14、公共广播电台、电视台服务;15、新闻出版行业的公共服务;16、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等的服务。毛少莹等:《公共文化服务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202页。

活动品牌体系,文化精品供给体系,资金、技术和人才队伍保障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和绩效考评机制等^①。这其中,外务工者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深圳这座以移民为人口主体构成的城市的一大亮点。从现有成绩来看,围绕外来劳务工文化服务工程这一中心,深圳市文体旅游局相继策划以文化活动场所为重点的“网络系列”、以群众文化活动为诉求的“周末系列”、以文化节庆和品牌活动为特点的“节庆系列”和以流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基础的“流动文化系列”,旨在为农民工提供结构层次合理及产品服务完善的公共文化,更致力于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城镇化”——例如农民工图书馆、厂区文化活动中心、共享工程农民工服务点等外来务工人员文化供给与城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市民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相对接。第三,积极推动深圳公共数字文化发展规划,借鉴文化产业发展中凸显的“文化+科技”特色,将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的相关优势整合进入公共文化的数字化升级之中。近年来,已有学者针对这一发展方向呈请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市科创委、市经贸委,呼吁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定《深圳市公共数字文化发展规划》来发挥数字技术在公共文化事业中的画龙点睛效用^②。

三、“图书馆之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深圳实践

“图书馆之城”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项具体措施,从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精神两个层面说明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的深圳实践方案。如果说“图书馆之城”体现出以阅读作为核心IP来彰显城市转型的文化自觉,那么以公共图书馆建设、阅读品牌活动策划、民间阅读组织推广、数字化阅读等为代表的多样化模式进一步促进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如尹昌龙指出,“图书馆之城”的目标是“以全市已有、在建和将建的图书馆网点和数字网络为基础,联合各图书情报系统,建立覆盖全城、服务全民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实现图书馆网点星罗棋布、互通互联、资源共享,为市民提供功能完善、方便快捷的图书馆服务,达到提供丰富资讯、支持终身学习、丰富文化生活的目的”^③。简而言之,“图书馆之城”的目的在于兴建图书馆设施、推动图书馆建设的数字化以及建设一座学习型的书香城市。“图书馆之城”明确成为城市文化的战略部署与2010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相关:第一、2010年由深圳市委、市政府公布的《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全民阅读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构成要素之一,“图书馆之城”、国际一流书城群和全国数字阅读先进城市均是打造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手段。第二、深圳读书月组委会相继发布《深圳读书月发展规划(2011-2020)》,认为读书月要力争打造为城市公共文化的特色品牌,成为城市文明程度提升的动力引擎。第三、2011年深圳市政府颁布的《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规划(2011-2015)》和《深圳市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指标考核实施方案》,深入推进深圳图书馆总馆和分馆的建设,以遍布深圳的图书馆服务网络来实现全市馆藏资源共享。第四、2016年4月1日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针对深圳全民阅读活动的经验进行制度设计,为阅读资源供给、公民

①吴理财等:《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0~51页。

②毛少莹、杨立青:《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2014年度报告》,彭立勋主编:《文化治理现代化与文化发展新常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0页。

③尹昌龙主编:《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阅读权利、全民阅读财政投入等公共阅读服务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

从治理要素上看,深圳公共阅读基础设施的特点可理解为“阅读”的IP化,集中体现为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首先,“图书馆之城”可追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共图书馆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公共阅读设施的兴建和管理提供了政策指导,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1997年)、《深圳市社区(村)图书馆业务规范》(2001年)、《深圳市社区(村)图书馆达标评估标准》(2001年)、《深圳市社会文化工作考评标准》(2001年)等系列文件就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的具体业务、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2003年“图书馆之城”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一并构成“两城一都”的城市整体形象定位,纳入深圳“文化立市”的战略部署。由深圳市政府、市文化局筹建的“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推进办公室”明确“图书馆之城”的建设规划,出台《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3-2005)三年实施方案》(2003年),旨在对全市辖区图书馆设施兴建进行指标量化。迄今为止,有学者总结认为“图书馆之城”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三方面成效:一是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图书馆网络建设日趋完善,二是全市文献资源总量稳步增长并初步形成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三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稳步推进^①。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深圳的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以32820.12(千册)位居第三,2014年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以人均920.03本排名全国第一^②。位于市中心莲花山脚下的中心书城有别于其他的地产商业综合体,这座以体验式阅读和图书新业态为诉求的书城文化综合体通过“书城+电影院”“书城+文化旅游”“书城+文化公益活动”等模式的叠加效应,积极打造城市公共文化地标与传播全民阅读文化。

其次,以深圳读书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将公共文化活动有效地融入公共图书馆和书城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致力于公共阅读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深层对接。作为颇具代表性的全民阅读文化活动,深圳读书月早在2000年11月便由深圳市委、市政府创办,目的在于“让深圳成为一个因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城市”^③。诚如首届深圳读书月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定为活动主题,明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这座特区城市理应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通过每一位市民文明程度和文化素质的提升来实现城市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随着“营造书香社会,共创美好未来”向“新时代,新阅读”的主题轮换,深圳读书月已走过十八个年头,其内在机制鲜明地体现出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特点——“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④,逐渐探索出一条以“阅读”为IP的城市文化治理道路。每年一届的深圳读书月已发展为深圳的一项文化品牌,旗下的子品牌涵盖“读书论坛”“阅读与藏书推荐书目”“图书漂

①温诗步主编:《深圳文化变革大事》,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158~159页。

②深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总队编:《深圳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355页。

③陶一桃、鲁志国等著:《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④政府倡导指的是领导担任读书月组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市宣传文化基金划拨专项财政资金资助相关活动,市、区两级党委和政府投入行政力量推动读书月活动的开展;专家指导指的是专家指导委员会针对读书月活动策划及市民阅读活动进行辅导;社会参与指的是以“深入基层、深入社区、深入群众”为方针,充分调动全市民众的参与热情;企业运作指的是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确立为承办单位,统筹并发动相关企业参与读书活动的具体承办;媒体支持指的是中央到地方、平面媒体到数字媒体全方位报道和刊载读书月的信息。尹昌龙主编:《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流”“年度十大品牌好书评选”等阅读活动。例如,2005年推出的市民文化大讲堂,其宗旨是“弘扬人文精神、发展公共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品位”,通过邀请逾400位中外知名人文社科学家举办公开演讲和讲座论坛为市民普及历史、文学、艺术、民俗、财经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成为以市民参与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活动典范。又有深圳晚八点以公共对话为特色,自2008年在深圳书城推出晚八点的新阅读活动后,不少深圳人下班后过来席地而坐,聆听名家的声音,分享自身的感受,这也是文化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的典型案例分析之一。在深圳读书月的驱动下,以后院读书会、三叶草故事家族、小津概念书房、99人书库等为代表的一批民间阅读组织在深圳涌现,为推动公共阅读文化的社会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尹昌龙认为,以年轻、受教育程度高、三口之家为特点的移民城市较易催生民间阅读组织^①,而2004年行业协会服务署和2007年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成立促使过去零散的线下和线上读书会得以整合,这些民间阅读组织在“文化立市”的战略背景下日趋规范化,2012年深圳市阅读联合会的成立更标志着全民阅读的社会参与迈入专业化轨道。遍及企业、学校、书店甚至线上空间载体的民间阅读组织在深圳读书月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致力于向市民大众推广阅读习惯、阅读方法和阅读资源,也在实践过程中塑造出自身的阅读品牌^②。必须注意到,民间阅读组织不仅催动越来越多从各个省市来深打拼的移民因“阅读”而相识、相聚,这种基于陌生人的文化社群所特有的文化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也塑造出一种名为“深圳人”的文化气质,那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与充裕的物质生活之余回归宁静恬淡的精神世界。

从治理目标上看,公共阅读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不仅通过“互联网+”背景下阅读行为的全面普及领域细分在改写着全民阅读社会化参与的未来版图,更致力于推动整座城市的人文精神走向“善治”。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技术提升是全民数字阅读的第一步,通过2009至2013年间“深圳文献港”的开通及移动终端启动^③、“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机”项目的推广^④等技术升级的改造方式,助推深圳市、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平台在2012年统一合库,实现全市公共阅读资源的一体化和电子阅读资源的跨地域分享。又如,作为深圳读书月的官方网站,全民阅读网不仅对年度阅读活动进行集中展示,以阅读博客大赛、华语校园网络文学大赛、全国青工网络写作大赛、全国中小学生网络学科作文大赛、地铁阅读季、手机阅读季等为子项目的线上阅读文化活动也在推动市民的多样化参与。又有“真人图书馆”的自媒体阅读概念,强调每个人都是一本有故事的书,号召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市民在城市的一些公共空间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推陈出新的模式使得这个以趋于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因阅读而产生文化联结。更重要的是,阅读的数字化升级不仅将阅读界定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而且促使阅读领域更为碎片化——其群体涵盖外来劳工、一家三口、残障人群,其活动囊括读书会、讲座、论坛,其眼界从古典文化延伸至现代科技,其类型遍布小说、诗歌、音乐、电影、建筑等一切艺术形式,其载体从纸质书籍到电子媒介。正因为参与群体、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的丰富多元带来了阅读边界的纵深拓展,这些充满欢乐、梦想与共享的阅读行为恰恰印证了深圳文化的精神气质——“城市推崇阅读,阅读改变城市”。

①尹昌龙主编:《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0~101页。

②诸如后院读书会的“阅读接力——一本书能走多远”“城市萤火虫换书大会”“走读”,三叶草故事家族的“绘本剧大赛”“妈妈宝宝好书榜”等品牌已发展为深圳读书月的重点项目。

③彭立勋主编:《文化治理现代化与文化发展新常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2页。

④彭立勋主编:《城市文化自觉与文化深圳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四、结语

学者高小康在2018年“新时代与特色文化小镇”会议上谈及,当前城镇再开发过程中主要倚重于政府的行政规划和企业的投资经营,这一思路的弊端在过于强调规模扩张和资本效益,而空间生产的终极目的理应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文化的价值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解决城市快速更新导致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濒临重组、城市社区和新移民趋于碎片化、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缺位、城乡二元结构鸿沟突出等一系列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不仅着眼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更重要的是唤起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治理”这一理论命题是基于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和城市公共事务管理而提出,在中国则涉及政府与社会通过协商民主的治理结构来达到“善治”的治理目标。在具体的战略设计层面,除了构建文化治理的框架体系和广泛吸收中外经验之外,必须注意到文化治理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双向并轨的内在关联——正是因为城市更新面临的发展瓶颈是必须关注人居生活的空间正义和地方文脉传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共性”和“人民性”故而成为应对这一问题的良方。具体而言,以多中心治理为内核的“政府—社会”二元主体治理结构、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IP化与数字化,可视为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文化解决方案。

如何以文化的公共性来消弭城市更新导致的“城市病”?经历过快速工业化而使一座小渔村迅速发展为现代都市的深圳有其独特的制度性经验。早在经济特区创立初期,深圳的定位确立为在国家设立的经济区域内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构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随着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和物质文明的快速积累,深圳自新世纪以来出于“土地、能源、人口、环境”的难以为继而必须向高科技附加值的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型,城市发展也从“经济深圳”向“文化深圳”转型。在“文化”这一城市定位的驱动下,深圳市委、市政府将特区文化建设从创立伊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拓展为“文化立市”“文化强市”“深圳文化创新2020”战略目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随着大幅进行治理结构、治理对象和目标的全方位改革。“图书馆之城”建设恰恰是深圳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缩影:不仅以“阅读”作为核心IP来塑造城市的文化品牌,更透过大批覆盖全市(区)的公共图书馆兴建、丰富多元的阅读文化活动的开展、阅读文化的数字化提升等举措来打造深圳的城市人文精神。总的来说,深圳的经验在于向那些正在或即将进行大面积城市更新和空间改造的地方提供一套“政府如何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创新启示。

作者简介:李丹舟,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
研究员,博士。广东深圳 518060

【责任编辑 关万维】

社会膜：社会风险预防中的膜技术研究^{*}

阎耀军 田 慧

[摘 要] 膜分离与传统的网过滤不同。它作为一种具有选择性分离功能的技术,可以根据主体的需要,选择对分离对象进行不同组分的分离、纯化、浓缩等过程进行膜分离。膜的种类和膜分离的方式多种多样。膜科学与技术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气体分离、物料分离和水处理等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并发挥举足轻重作用。与此同时,膜科学与技术中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思路、新发现等也给予社会科学尤其是安全风险管理领域颇多重要启发。本文为膜科学技术的应用提出一个新交叉点,将其理论及方法与社会安全风险管理相结合,提出“社会膜”概念,希望能够借鉴自然科学中的膜科学与技术,构建完善的社会安全风险管理的膜系统,为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预防和规避提供新的思路、新的原理和新的方法。

[关键词] 膜技术 社会膜 社会安全 社会物理学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 C9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1-0121-10

一、对膜现象和膜技术的哲学思考

膜,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其主要含义是指生物体内像薄皮的组织,如耳膜、视网膜、胃粘膜、竹膜、苇膜等。总之,在大自然界的生物中存在着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膜。

人们很早就发现膜具有分离作用。膜分离是以膜作为分离介质,以外界能量或化学位差作为推动力,对双组分或多组分的流体进行分离、分级、纯化和浓缩的方法。例如,动物的消化系统就是自然界一种典型的膜分离现象^①。

由于“自然膜”在自然界中具有膜分离的功能,人类便很自然的对其进行“仿生”利用,如在生产生活中利用过滤布将豆汁和豆渣相分离,利用渔网将水和鱼相分离,等等;在社会生活中利用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政策模拟方法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项目号:13ASH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王学松、郑领英编:《膜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和围墙将外人和家人相分离；利用城防工事和安检设施将坏人和好人相分离，等等。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人类认识到膜的实质（功能）是分离以后，膜作为一种分离介质的形态和结构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外部形态已经不限于“薄膜”，以致有些膜要比城墙还厚；其内部结构也已经不限于“网状”，以致千奇百怪。

由于地球上天然纯而又纯的物质极其稀少，95%以上的物质都是与其他物质混合在一起的“混合物”。所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便与“膜分离”具有不解之缘并如影随形。

在自然领域，人们将海水加热蒸发，使水变成蒸汽，冷却蒸汽后，除去海水中的盐和有毒物质从而得到可饮用淡水的蒸馏技术，就是膜分离技术的典型代表；又如用活性炭吸附有机致癌物，活性炭便扮演了膜的角色，发挥了分离功能；再如将分子筛作为吸附剂，采用变压吸附方法，在改变压力的基础上，实现氧气与氮气分离；深冷分离技术将纯氧、纯氮和纯氢从混合气体中分离，从而得到高能燃料，等等^①。

在社会管理领域，昔日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及焚书坑儒的“膜分离技术”来对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进行“筛选”“浓缩”和“纯化”，还建造了万里长城这一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大的“分离膜”；而当代的互联网更是用“防火墙”和各种身份识别系统以及“网监机构”织就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庞大的“电子分离膜”。

综观上述，如果我们站在哲学的高度对这种司空见惯却熟视无睹的“膜现象”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膜和膜分离现象以及膜技术的发展，正是自然界演进和人类存续须臾不可或缺的一种普遍现象，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基本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通过他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事物都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统一。否定是对旧事物的质的根本否定，但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而是变革和继承相统一的扬弃。事物发展正是经过否定之否定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膜分离正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膜分离现象形象而具体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趋势，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生动体现。它是事物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反映了事物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将膜技术引入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的社会物理学思考

早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将占据主导地位，当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后，各种全球性风险将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简言之，他预言了风险社会的来临。现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和现实社会风险的频仍，不仅“风险社会”一词终于被广泛认同，更重要的是，寻求规避和破解社会风险之策，已然成为朝野热议的话题和学界研究的热点。那么，膜科学与技术能否为风险管理鼎助一臂之力？我们认为：膜科学与技术既然可以提升 to 哲学层面加以认知，就说明其必有普适性，将其引入社会风险管理也就顺理成章。因此我们大胆提出“社会膜”的概念，并尝试将其引入社会风险管理领域。

在将膜技术引入社会风险管理之前，我们需要大致了解现代膜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①王学松、郑领英编：《膜技术》，第58～63页。

虽然膜现象自古有之，但是对“膜”的科学发现却始于1748年对猪膀胱的半渗透性的发现。1927年第一张人工膜合成。20世纪60年代后膜技术获得飞速发展，尤其工业膜的种类多种多样，其详如图1：

这里需要通俗地解释一下什么是膜和膜分离。膜是一种起分子级分离过滤作用的核心介质。但“膜分离”与传统的“网过滤”不同。它作为一种具有选择性分离功能的技术，可以根据主体的需要，选择对分离对象进行不同组分的分离、纯化、浓缩等过程进行膜分离。膜分离的核心介质是分离膜，分离膜具有独有的选择透过性，分离原理分为两种，其一是根据混合物物理性质的不同，即质量、体积大小和几何形态的差异，使用过筛的办法分离。例如，反渗透（RO），超滤（UF）、微滤（MF）以及一般过滤（F）。其二是根据混合物的化学属性，包括从膜表面接触的混合物中进入膜内的速率（溶解速率）和进入膜内后从膜的表面扩散到另一表面的速率两部分，二者的加和为总速率，总速率与透过膜所需时间成反比。如经过反渗透膜实现的除盐淡化技术^①。膜的种类、结构、形态和膜分离的方式多种多样，已经远远突破了原始的单一的“薄膜”形态。例如常见的水处理膜的结构和形态见图2和图3：

总之，人类不断深入认识了解分离膜及性能，分离方法从简至繁，工艺从一种技术独领风骚到百花齐放，形形色色不同材料和不同结构制成的分离膜不断开发，目前已经广泛运用于气体分离、物料分离和水处理等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今分离科学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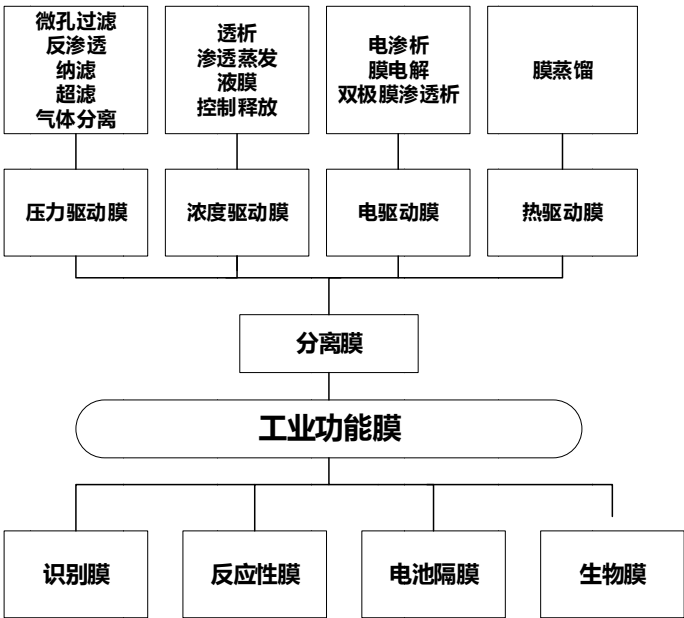


图1 工业功能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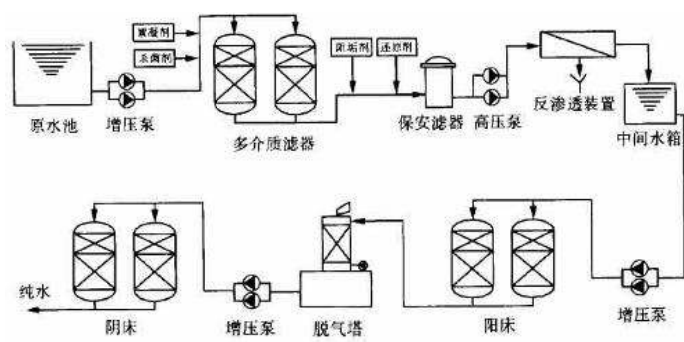


图2 一种水处理膜设备的内部结构（来源于百度图片）



图3 一种水处理膜设备的外部形态（来源于百度图片）

^①岳志新、马东祝、赵丽娜等：《膜分离技术的应用及发展趋势》，《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6年第5期。

在自然领域遥遥领先的膜分离技术面前,社会领域显然相形见绌,即使是比较先进的电子门禁和智能安检,也和原始的过关搜身没有多大实质性区别。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社会领域还没有膜的理念和理论,更没有膜分离的技术和技术体系。那么,我们能否在自然科学中的膜科学与技术的启发下,借鉴并移植膜分离技术于社会风险管理领域?这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

首先,膜分离作为一个物理学过程,我们将其引入社会管理就应当进行社会物理学方面的思考。社会物理学其实是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在创立社会学时首先想到的名称,他当初只是为了避免与人重复遂命名为社会学。孔德认为社会与自然并无本质的不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为的社会秩序通常可以看作“自然秩序”的简单延伸;而探讨人类社会生活规律的科学应是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的直接延续^①。所以,应该坚持统一的科学观,把研究自然界的方法贯彻到研究社会中去。当代秉承孔德这一理念的社会物理学派对于现实问题的探索,通常遵从一定的模式思考,并具较严格的逻辑推演,在寻求机制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下的基本认知框架:(1)承认无论自然系统还是人文系统,无一例外地随时(时间)随地(空间)都呈现出“差异”的绝对性;(2)只要存在各种“差异”或“差异集合”,必然产生广义的“梯度”;(3)只要存在广义的“梯度”,必然产生广义的“力”;(4)只要存在广义的“力”,必然产生广义的“流”;(5)社会物理学着重探索广义“流”的存在形式、演化方向、行进速率、表现强度、相互关系、响应程度、反馈特征及其敏感性、稳定性,从而刻画“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时空行为和运行轨迹,寻求其内在机制和调控要点,在计算机及网络工具的支持下,有效地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与管理^②。

由此看来,社会风险系统中的“差异”“梯度”“力”和“流”,均应是膜技术的用武之地,膜技术毫无疑问具有在社会风险管理领域大显身手的理论可能性。

三、膜技术由自然领域向社会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及其功能

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灵性”很大程度上在于人能够举一反三。当人类发现了自然界各种各样的膜效应之后,很快就在社会领域进行了诸多仿生学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例如前文列举的在社会生活、生产和管理领域中,自渔猎和农耕时代的“渔网”和筛滤各种食物的器具,直到现代精密的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设备;从最原始的门栓式门禁到现代的刷脸式门禁;从传统的搜身式搜查安检到现代的电子安检,等等。毋庸置疑,这些仿生学意义上的膜技术在社会领域中转化,不仅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出不言而喻的正向功能。例如,交通安全管理中的各种安全检查,卫生安全管理中的各种防疫检查,文化安全管理中的各种出版物审查,政治安全管理中的各种干部考核,企业安全管理中的各种质量检验,等等,其中也创造出不少可称之为“社会膜”的高科技设备和设施,如交通管理中的电子安检设备以及摄像头监控设施,在企业质量管理中的质检设备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由于本文主旨和篇幅所限,恕暂不对其进行分类研究。

对于物化现象的膜处理技术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在社会风险管理领域,历来存在

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会学),1991年,第137~138页。

②牛文元:《社会物理学与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年第1期。

着有形风险（亦称物化风险）和无形风险（亦称非物化风险）两个层面：对于前者，一道长城及其关隘可以经纬分明地使得国人与外敌（有形风险）处于“膜分离”状态；而对于后者，如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组织风险等等这些无形的风险，人类至今尚没有制造出一种科学有效的物化的膜处理设备。

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的“文字狱”，不仅未能实现统治者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所期望的“膜分离”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呈现出“禁锢思想，愚化民众”“激发风险”的负面功能。结果是秦二世而亡，汉被曹魏所灭，清亦最终走向覆亡。从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至今尚没有找到或制造出一种能够对无形的、非物化风险进行膜分离的科学工具。至于统治者所颁布的一系列为抵御非物化风险的律法禁令，仅仅是一种主观构建，对此只能戏称为“脑膜”而已，从科学技术角度讲，还不能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物化的膜分离工具。

由此可见，这种仅仅存在于统治者大脑中或法规禁令中的“隔离风险”的愿望，是不能确保“膜分离”的正向功能的，换言之就是不靠谱，即便“脑膜”发达如诸葛孔明者也概莫能外。例如史书记载孔明曾专为用人风险而制定了“识人七法”：“一曰，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以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①应该说这七项识人指标业已构成一个相当完备的“脑膜”，理应能够排除用人风险，但是最终为什么会错用马谡而貽笑大方呢？至于前苏共为纯洁布尔什维克而进行的“大清洗”，以及我党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肃反”，又使得多少好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们的社会在对待这些抽象的、非物化的社会风险上，绝不能够再停留在这种随意性极大、误差性极大，靠拍脑袋识别风险的“脑膜”基础上了。

然而，对于非物化风险的膜分离又不能像对待物化风险那样进行仿生性的、简单化的物理式移植，怎么办？规避无形社会风险的强烈需求，必然呼唤膜技术由自然领域向社会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应运而生一种可以科学严谨地进行规范操作的物化的膜技术工具，以应对非物化社会风险的侵袭。

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条件。例如，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大数据挖掘技术、系统动态分析技术等，尤其是虚拟仿真技术中的Agent仿真以及ABM仿真等技术，可以通过虚拟变量的输入，对在计算机中建立的人工社会进行虚拟推演，从中观察系统的各种涌现结果，并通过反复试验，矫正和优化政策，从而排除或降低社会风险。在此，为了使非专业读者对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了解，我们不妨以Agent仿真技术为例，对其支撑社会膜构建的作用做一简介。

在仿真系统中的Agent可以理解为“智能体”“代理人”“主体”等意思。Agent是指在一定环境下能够独立自主地运行，作用于自身环境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能不断从环境中获取知识以提高自身能力，且将推理和知识表示相结合的智能实体，具有自治性、反应性、自适应性、可通信性以及自学习性等特点。基于Agent的建模仿真利用Agent思想对复杂系统中各个仿真实体构建模型，通过对Agent及其相互之间（包括环境）的行为进行描述和刻画，以获得复杂系统的宏观涌现行为。Agent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对复杂系统的自然描述能力，通过各个Agent之间的互动演化而获

^①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集校注》卷3《将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得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得到的“涌现”行为。近年来Agent作为对复杂系统仿真建模的基本手段,其应用已经比较深入和广泛。据说美国建立的综合分析仿真环境(SEAS)已经能够支持成千上万个Agent运行,并允许现实世界中的用户分成多组扮演不同的参与方参加到仿真模拟中,扮演某一角色并与计算机生成的各种Agent进行交互,对事件作出反应,从而影响仿真模拟的运行结果。他们开发的虚拟国际系统(VIS)能对全球62个国家进行建模仿真。在我国,以国防大学胡晓峰为首的研究团队,基于Agent方法建立了危机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生态模型、某地区经济演化模型、民意模型、舆论模型、谣言模型、大规模群体事件模型等社会空间模型。胡晓峰认为,“Agent能够模仿人类的行为,具有智能型、社会性、适应性等特征,在基于Agent的建模过程中,可以很容易通过Agent的交互来描述系统的复杂性,非常适用于复杂性问题的建模仿真研究”^①。总之在这个虚拟的社会中,众多Agent利用规则支配其行为并相互博弈,在Agent的相互作用下使得可能的社会风险得到预先“涌现”,从而有利于人们实施有针对性的预控对策推演。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的“社会膜”,一定能够在规避无形的、非物化的社会风险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利用现代科技构建的社会膜技术至少应具有下列功能:

- (一)能够对非物化社会风险扰动因素进行精准的科学识别;
- (二)能够对可能进入系统的非物化社会风险因子,在进入系统之前就实施有效的前馈控制;
- (三)能够对经过膜分离后已经进入社会系统的所有因子,实施不间断的实时监控,并以二次以上再度膜处理的方式,对发生嬗变的致危因子进行及时剔除;
- (四)以人在回路的方式进行人机互动,以大数据仿真模拟平台的物化操作方式实现对非物化社会风险的科学规范管理,避免主观随意性的产生。

四、将膜技术引入社会风险管理领域的若干难点问题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膜”的功能和自然界的“天然膜”及工业生产中的“工业膜”的实质功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膜分离器而达到“分离、纯化、浓缩”的结果,简言之——去芜存菁。由此可见,在对于物化的、具象的风险方面,社会膜与自然膜及工业膜之间并无多大区别,仅仅是技术含量上的差异而已。但是在对付抽象的社会风险方面,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特殊性质的膜,我们称之为“社会风险管理膜”。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危机是显现的风险。所以风险具有虚拟性和抽象性,因此如何对非物化的社会风险管理设置一种分离膜,这就和自然膜与工业膜有很大不同了。

按照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笼统指出了可以在社会物理学认知框架下,解决膜技术在社会风险领域应用的理论可能性。但是这仅仅是个大前提,因为孔德的社会物理学把社会与自然完全不加区分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所以,如何具体落实膜技术在社会风险管理领域的应用,还需要从人文社会的具体特征出发来论证其可行性。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难题需要解决:

难题一:社会膜与工程膜的客体差异问题

工程膜(泛指在自然领域运用的人工膜)与社会膜的膜分离对象不同。前者分离的对象是没

^①胡晓峰:《社会仿真——信息化战争研究的新领域》,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有知觉或没有主观能动性的自然物；而后者分离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①。所以，在膜分离过程中，在特定情形下，作为膜客体的一些人会因某种目的而采取伪装、隐藏、干扰等反分离技术，与膜分离主体相对抗；而另一方面，膜主体又必须根据膜客体的前述变化而进行自身结构及性能的改进和调整。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种情景可用图4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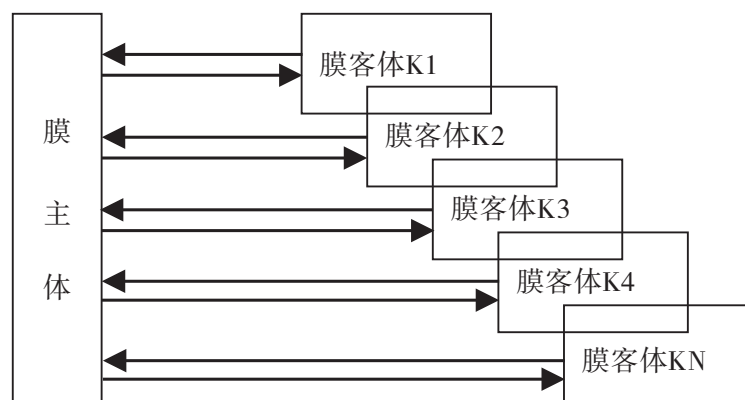


图4 膜过程中的主客体互动

上图说明社会膜在膜分离过程中的这种主客体矛盾将会给膜识别造成极大干扰，严重者可导致膜分离失效。

难题二：社会领域的膜客体通过膜分离后的后续演变问题

工程膜的膜客体在被膜介质分离后一般不会发生变化，而社会膜的膜客体在被膜介质分离后，往往会有一部分发生变化。例如，经过严格筛选考察提拔上来的干部后来腐败变质成为罪犯就是典型的例子。这说明社会膜的膜分离过程往往不是瞬间的或一次性完成的，这就要求社会膜应当具有与时俱进的追踪检查功能，使膜客体始终处于膜分离过程的监督或笼罩之下。显然，社会膜比工程膜具有更高级的要求。那么，作为具有这种不同于工程膜的分离介质（社会膜）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又应当是怎样的呢？它的技术载体和运行方式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难题三：社会风险的虚拟性与社会膜的抽象化问题

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因而具有非实在性或虚拟性。在社会膜的膜分离过程中，如何通过特定的分离介质分离风险因子，将虚拟的社会风险“实在化”（即可视化）？另一方面，人类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社会膜亦分为具象膜和抽象膜（或称有形膜和无形膜）：对于“自然人”进行风险因子分离的介质是具象的，如指纹识别、刷脸识别、步态识别以及各种门禁设备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具象物体；但是对于“社会人”进行风险因子分离的介质却往往是抽象的，如用于识别和排查意识形态、政治稳定、社会安全等领域风险的各种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既不具备物化形态，更不具备技术形态，而仅仅是一种主观抽象。那么，如何构建出一种能够将虚拟的社会风险可视化并可操控化；如何将抽象的分离介质变成一种具有物化载体的、具象的社会膜？这里面有太多的难题要解决。

难题四：社会膜的技术化和智能化问题

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膜分离与传统的网过滤不同。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高度的技术化和智能化。例如，海水淡化与豆浆过滤在技术化和智能化程度上天壤之别，就具有本质的不同。同理，现代意义的社会膜，与古代依靠城防关隘阻拦风险的物理膜，以及单纯依靠人脑思辨来识别风险的“脑膜”，在技术化和智能化程度上也应具有本质区别。事实证明，随着现当代社会复杂性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的与日俱增,传统物理膜和“脑膜”的社会风险防范功能与日衰减,说白了就是越来越不靠谱。所以,我们要构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膜,其技术化和智能化难题是无法回避的。

五、社会膜概念的界定和社会膜的技术结构设想

在阐述社会膜技术体系构想之前,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应当总结社会膜的特征并对社会膜这个概念给予界定。

根据前文的讨论,可以认为社会膜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社会膜是借鉴现代膜科学与技术中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思路和新技术,移植于社会管理领域的一种衍生形态;(2)社会膜是一种依赖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构建的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方法识别、排除社会风险或不利扰动因素的物化介质,而不仅仅是一种思辨产品;(3)社会膜作为一种具有可将社会风险因子分离出来功能的物化介质,应当能够具有可批量化生产和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属性。根据这些特征,我们赋予社会膜如下定义:

社会膜是将现代膜科学与技术的理论和方法,移植于社会管理领域,创造的一种对社会风险及不良扰动因素具有识别和分离功能的物化介质。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主要针对抽象意义上的社会风险,提出社会膜的技术结构体系如下:

(一)针对社会风险的具体险种,在特定风险逻辑模型的基础上,设置社会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并以智能化人机互动的计算机软件为载体,形成物化的风险识别的膜介质技术平台。

这里面有三个要点:其一是在解析风险对象逻辑结构基础上构建风险逻辑模型,并据此设置风险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例如图5^①:

其二是这种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应该是智能化的,一般需要以计算机软件的形式来实现。如图6:

其三是由人、机、工具软件三维结构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可持续运行的物化技术平台。由这个平台即社会风险膜来完成对社会风险系统中的“差异”“梯度”“力”和“流”的监测和识别,从中观测风险传导即“流”的存在形式和演化方向、行进速率和表现强度等动力学特征,发现风险系统的运行轨迹和调控节点。

(二)建立与现实社会平行的社会风险仿真推演系统,通过虚拟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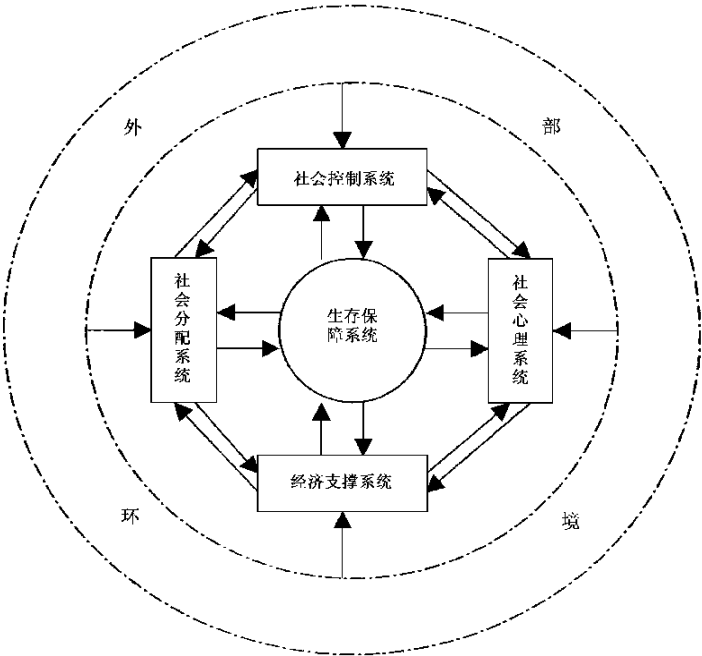


图5 风险逻辑模型

(提示:必须根据逻辑模型衍生指标体系,而不是随意罗列)

①阎耀军:《社会稳定的计量与预警预控系统的构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元的膜过程来观察社会风险的传导和演化路径,为社会风险的多方案防范提供依据。

社会领域的风险具有随机性、涌现性、多变性、不确定性。因而社会膜的膜过程对象是一个复杂系统,不可能像工程膜的膜过程那样只有一个给定的向度。为此必须在计算机上虚拟一个仿佛和现实社会孪生的“平行系统”,该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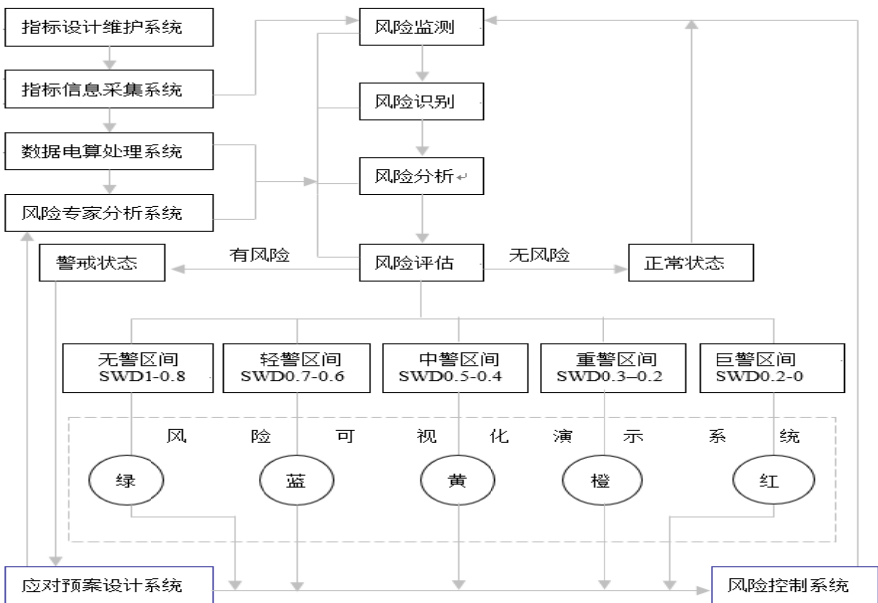


图6 计算机软件结构示意图

系统是具有多元演化功能的动态系统,它能够从现实世界中获取引发系统崩溃的初始扰动数据,通过多向度推演来反映风险膜过程中出现的随机性变化,使社会膜成为对风险扰动因子具有“即时感知能力”的虚拟世界系统,并具有多向度推演的功能^①,从而为研判初始风险涌现规律提供依据,进而使风险处置策略的制定成为可能。如图7:

(三) 设置官方的建制性机构或官方资助的非营利智库机构,形成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机互动的专业化组织系统,以最终实现对社会膜的操作、运行和管控。

鉴于社会膜与工程膜的诸多不同特征,在社会膜的技术结构中,权威性、专业化的组织机构不可或缺,因为舍此不能完成对膜对象原始数据的有效、真实的、完整的采集和输入;舍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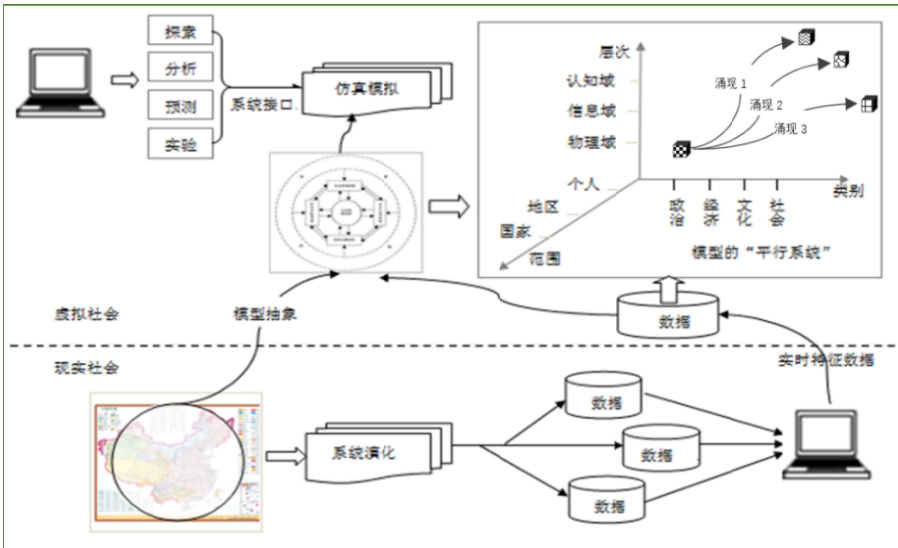


图7 社会风险仿真平行系统

^① 阎耀军、郭涛:《社会稳定风险仿真模拟与社会冲突的前馈控制——基于政策模拟方法的社会稳定风险系列研究之一》,《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能保证膜介质即社会膜本身的有效维护和与时俱进的完善；舍此不能达成充满灵性的人机互动和带有超理性的睿智互补。社会风险管控组织机构作为社会膜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社会膜的膜过程管控模式如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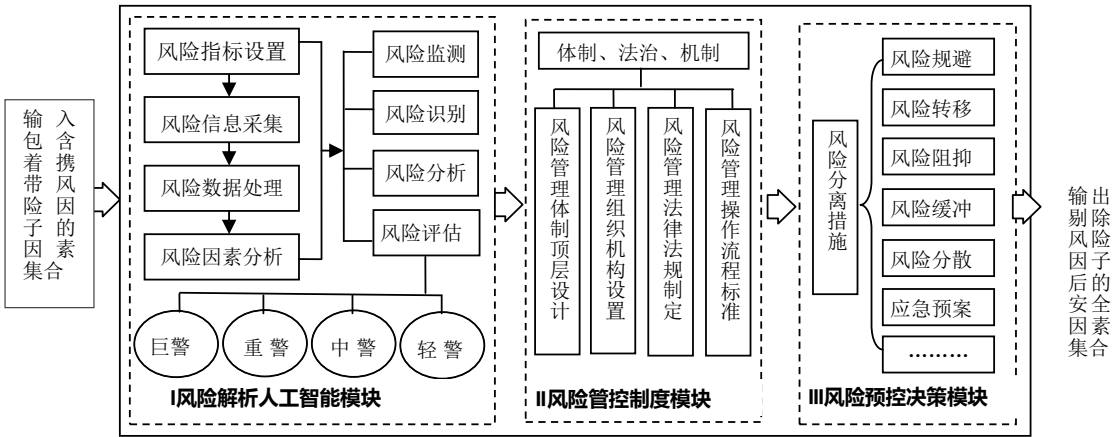


图8 社会膜对社会风险因子的分离过程

结论：膜分离作为一种利用特殊制造的、具有选择透过性能的隔膜，在外力作用下对混合物进行分离、提纯、浓缩的一种分离新方法，不但适用于自然领域，亦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对物理现象进行膜分离的“社会膜”其实古已有之，只是此前没有一个具有解释力和张力的概念对社会膜现象加以概括和科学抽象，从而导致社会膜的科学技术发展处于一种无意识和无组织状态。现在我们适时提出和创立社会膜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旨在唤醒人们“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社会风险防范的科技意识，聚焦并引导人们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来防范社会风险的科学技术力量。

社会作为一种复杂巨系统，其膜分离的介质、结构、形态、方式会与工程膜有诸多不同，但其实质（功能）都是为着去芜存菁。社会膜中对非物化风险进行膜分离的“社会风险膜”，由于其膜处理的对象具有动态性、感应性、博弈性和后期嬗变性，因而在膜的构造及膜处理方式上与自然膜和工程膜具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更具复杂性并对膜的功能和性能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社会膜概念的提出，必将会为社会风险管理开启一方极大的创造性空间，而社会膜的膜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形成也将指日可待。与此同时，社会膜在社会风险尤其在社会安全风险管理领域的应用，也将会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简介：阎耀军，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天津 300000；田慧，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天津 300000

【责任编辑 倪晓锋】

新时代我国社区矫正对象 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建

陈姝宏

[摘要] 2003年,我国将社区矫正制度移植过来后,将社区矫正对象规定为五类因社会危害性较小而在社区进行矫正的特殊人群,其范围包括管制、缓刑、暂于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因为犯罪而缺失了部分社会权利,使矫正对象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在接受强制性监管的同时,还要面对住房、工作、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减缓和摆脱压力仅仅依靠矫正对象自身能力是无法达到的。对他们而言,修复社会关系,建立社会关系网,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救赎。

[关键词] 社区矫正对象 再社会化 社会关系网

[中图分类号] C912.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131-07

一、问题的症结: 社会排斥

面对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矫正与复归理论的猛烈批判,社区矫正的机能观并未盲目锚定于矫治预防理念,而是随着社会观念、刑事政策和刑罚学理论的剧烈演化在制度反复和理论反思中辩证嬗变,逐渐向正义修复、规范矫治与分流监控的复合机能论方向发展,社区矫正逐渐进入关注多元功能的后矫治时代。而这一后矫治时代的谱系展开,与21世纪前后被害人保护与恢复性司法的兴起、自我与他者犯罪学的并立、风险社会观和标定管控技术的流行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本研究通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再社会化过程中最突出、最主要的矛盾是矫正对象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排斥。社会排斥一定程度上隔断了矫正对象的某些社会关系,阻隔了矫正对象的社会参与。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排斥导致贫困、劳动力市场排斥、服务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矫正对象的社会反排斥使他们内心孤僻,行为孤单,不良情绪无处发泄,在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的时候,易走向极端,存在对社会不满甚至是反抗现有体制冲动。社区矫正的目标是矫正罪犯的

心理和行为,使他们纠正错误的理念和行为,重新回归社会,完成再社会化。实际情况是,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面临重重困境,出狱之后种种问题接踵而来。

大多数社区矫正对象,不论假释犯、缓刑犯或是管制犯都不同程度地遇到社会关系断裂问题。根据他们犯罪前的社会关系紧密度和社区矫正期间的社会关系变动,或是遭遇家庭关系破裂,或是亲人远离,或是朋友绝交,或是邻居排斥,等等。社会支持网一旦断裂,便难以补救。尽管正式的制度安排竭尽全力,作用也十分微弱。非正式支持受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局限,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实际操作中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尽管正式的制度已经建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相关法律措施,采取了有效的监管办法,具备了专业的工作人员等配套设置。但是,这些仅仅体现了是刑罚措施的完善,而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过程是进行社区矫正后才开始的。进入矫正阶段后,矫正对象不但没有与社区及社区居民建立联系,反而回避社区活动,逃出居民的视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解矫之后,甚至更长的时期。也就是说,当社区矫正刑宣判执行,社区矫正对象就陷入了“与世隔绝”的“真空”情境,矫正对象的矫正效果可想而知。

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的构成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包括家庭支持、亲属支持、朋友支持、学校支持、社区支持、社会支持等。在这些支持中,按照格拉诺维特对关系强、弱的划分,那些与矫正对象互动频率高、情感强度较强、亲密程度较近和互惠交换较频繁的为强关系支持。反之,为弱关系支持。调查发现,强关系支持的断裂对矫正对象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矫正过程必须考虑到矫正对象与家庭的关系。而弱关系则相对容易获得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更容易进行关系之间的联接。

社会关系的断裂表现在三个关系的断裂:

一是强关系的断裂,主要表现是家庭关系。社会系统是一定范围内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个人能借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系统。社会支持主要关注个人之外的情感支持、工具性的援助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帮助^①。社会支持系统的好处是,人们通过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被认为有益于减缓生活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则会导致个人的身心疾病,使个人日常生活的维持出现困难。同时在社会层面上,社会支持系统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减轻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缓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②。社区矫正对象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属于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他们更需要社会支持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才能得到心理矫正和行为矫正。在社会支持系统中,与矫正对象关系最强,最能够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情感关怀的是家庭。

二是弱关系断裂,主要表现为与社区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网中,对应强关系下的社会支持,弱关系的社会支持也广泛存在于矫正对象的社会关系网中。如矫正对象与社区之间的合作,矫正对象自身的危险性与管理部门的监管、矫正对象与社区之间的冲突,等等。格拉诺维特在解释“弱关系”时指出,弱关系往往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形成的,由于这些个人间相似程度低,难以形成共同的志趣,因而关系强度是弱的(Granovetter, 1973)。与格拉诺维特观点不同,林南认为,弱关系联系的是不同的阶层,人们可以通过弱关系来汲取、共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Lin,

①张友琴:《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②贺赛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982, 1986)。

按照社会关系网的关系强度理论, 矫正对象在与社区的关系中, 因社会资源匮乏, 虽然渴望在社区关系网中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助”, 但除了公益劳动和心理咨询等活动外, 几乎没有交互的机会, 因而处于一种弱关系连结。在这种弱关系情境下, 矫正对象一方面受管理部门的监管, 定期学习和汇报, 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网中寻求“自助”。但在“互助”与“自助”的过程中, 矫正对象也面临着嵌入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影响。

三是社会支持网“结构类型”间的断裂, 主要表现为法律与公益等方面的支持关系。社区矫正的支持网, 是由维系社区矫正体系正常运转的各项必要条件组成的, 在社区矫正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社会支持理论指的是由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向特定对象提供的可以缓解个体心理压力, 并能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给予^①。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帮助的行为的总和。

社区支持网按照结构类型可分为正式社区支持和非正式社区支持。社区矫正的正式支持是官方机构和司法系统所提供的支持。而主观评价取向的社会支持理论认为, 社会支持是一种主观体验, 是个人的经验而非社会行为, “是一种个人对他(她)的社会环境及其所能够给予支持的认知性评估, 也是他(她)对可以得到的支持的有效性 & 可靠性评估”^②。这就意味着如果一种支持不被接受或者认可, 就不能构成支持。舒梅克尔和罗内尔也认为, 社会支持是“至少在两个人以上进行的社会资源交换过程, 这一过程被支持者或接受者理解为旨在增加接受一方的福祉”^③。社会的精神支持属于马斯洛所说的情感需求的高层次需求, 但来自于社会的正式支持更多的是物质支持, 对于矫正对象的情感世界显得力不从心。也就是说, 尽管社区矫正的正式支持系统通过建构机制、设置部门、提供资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等各种方法和手段, 矫正对象可能依然会感觉不到精神上的满足, 而对正式支持获得较低的认可和评价, 正式支持虽然极力健全正式的制度和政策, 但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 对于矫正对象感觉的评价就成为社区矫正支持系统的一个观察视角, 社区矫正的非正式支持成为研究的突破点。

二、再社会化理论的启示

矫正对象获得社会支持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再社会化的效果。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社区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的“土壤”十分贫瘠, 无力承载帮助矫正对象回归社会、达到“恢复性司法”的目的。社区矫正对象不仅难以获得支持, 反而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排斥。因社会排斥带来的矫正对象社会融入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们与其社会网络关系相互抵触、互相排斥、互不接纳。目前, 《社区矫正法》仍未出台, 矫正对象的正式支持渠道尚未“打通”。矫正对象是如何解构和重构其社会支持系统的? 其行动过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矫正对象生命历程中的社会支持系统情况怎

①汪明亮:《以一种积极的刑事政策预防弱势群体犯罪——基于西方社会支持理论的分析》,《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②Tracy,E.M."Identifying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of At-risk families". *Social Work*,1990,35(3).

③Shumaker,S.A. and Browenell,A.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Closing Conceptual Ga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84,40(4).

样? 犯罪的经历对于他们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如何? 文化制度背景对于矫正对象解构和重构其社会支持系统有怎样的影响? 为此, 我们需要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进做进一步的思考, 呼吁社区矫正支持系统的回归, 即罪犯的回归或重新与社会结合, 需要得到家庭的支持、社区的支持、社会的支持,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歧视。再社会化理论和经验或可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再社会化是相对于社会化而言的, 指对在早期社会化与继续社会化中未取得社会成员资格的人, 通过强制或补偿教育的方式进行再教化的过程。目的是改变这些人已形成的那种反文化的人格, 使他们接受社会规定的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与普通人的再社会化研究不同, 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研究首先是在犯罪学领域内的罪犯再社会化研究。然而, 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又不同于监狱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罪犯的再社会化, 就是使罪犯改掉恶习、修复价值观、重新回归社会的过程。马克思认为, 罪犯在侵害他人的同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 这种侵害自己的罪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使他脱离社会规范、文化规范和道德规范, 使他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 罪犯回归社会、重新获得自由所应当具备的前提条件, 就是能够完成再社会化。现代行刑领域的做法是, 将心理矫正、道德教育与劳动技能的培养等方面紧密结合, 以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

在犯罪学领域, 罪犯再社会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洲监狱政策改革时期。许多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断质疑监禁刑罚的有效性, 如德国的冯李斯特、比利时的普林茨、荷兰的兰卡奇, 开始关注社会对罪犯的影响, 认为罪犯在离开劳教所后, 社会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 心态的恢复和重新融入社会是刑事政策的头等要事。涂尔干认为, 犯罪是正常的, 犯罪是一种规则现象, 犯罪之于人类社会, 犹如疾病之于人体那样合乎规则地存在而难以避免。社会要进行新的变革, 就必然会出现违反社会规范的现象^①。在对犯罪理解的基础上, 涂尔干从社会变迁对刑罚影响的角度, 提出了刑罚发展的三个规则: 一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复原式或赔偿式惩罚, 逐渐替代传统的报复性或压制性惩罚; 二是社会的进步程度与政府的集权程度与刑罚科量的轻重成反比; 三是社会对于刑罚的观念逐渐人性化, 重视受刑人的教育和再社会化^②。19世纪下半期占统治地位的复归理论认为, 所有罪犯都是可复归的。但事实是, 并非所有的罪犯在出狱后都能复归。有学者深化了复归理论, 认为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罪犯和社区之间建立或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 使罪犯归入或重归社会中去, 恢复家庭关系, 获得职业教育。就广泛的意义而言, 即在于为罪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提供帮助。这不仅必须要求改变每一名罪犯, 而且需要发动和改造社会及各类机构^③。然而, 现代的刑事司法还无法解决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监禁刑使罪犯进行了部分心理和行为的矫正, 但对再犯罪的预防效果并不明显, 而刑罚的结果仅仅停留在惩罚的层面^④。社会防卫学派的前期代表人物菲利普·格拉马蒂卡主张, 应当用一系列预防性的、教育性的和感化性的措施来取代刑罚。对每一个犯罪人采取专门的、个别化的社会防卫措施^⑤。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 一般认为, 人们都要经过双重的社会教化: 初级教化和再社会化。初

①[法]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狄宇明译, 商务印书馆, 1995年, 第89~90页。

②[法]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汲喆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76页。

③[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22页。

④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01年, 第637~647页。

⑤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 第321页。

级教化是启蒙教化,是生物人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再社会化教化是指人在初级教化基础上为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改变而重新建立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是人按照新的社会文化要求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行为,得到新的认同的过程^①。戴维·波诺普认为,再社会化是有意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接受新的价值观与行为。可见,再社会化是改变和建立新的社会化,是与过去的社会化教化告别。社区矫正对象是社会教化失败而需要进行再社会化教化的特殊群体。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既不完全等同于正常人的再社会化,也不完全等同于监狱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再社会化不只是初级社会化的规范加上新的规范,而往往是要求人们放弃原来的规范,接受新的规范。再社会化教化就必然要求人们作出感情、心理和性格的牺牲,并认为,这种牺牲需要付出代价。但是,正常人的再社会化教化过程是在正常的心理、情感和行为的基础上的改变,虽然需要付出代价,但这种付出是在社会环境的帮助和教化下完成的。并且,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不断地接受再社会教化的。而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是在改变其原来错误的心理、行为基础上的教化。他们在再社会化之前已经受到了刑罚惩罚的代价。罗伯逊认为,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因素是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播工具^②。与正常人的再社会化不同,由于社会排斥和歧视,矫正对象会遭受社会成员的排挤和冷落,再社会化的过程较正常人更为艰难。

监狱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是在监狱的强制下进行的,并且,监狱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是在监狱中进行,而不是在社会环境中,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小。而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是在社会环境中实现的。这就一方面给矫正对象与家人、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大众传播工具互动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必须受司法部门的强制性监管。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是介于普通人的再社会化和监狱服刑人员再社会化之间的一种再社会化方式,其内容、方式、方法及参与的人员、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特殊性。

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经过十年的建设,似乎已经走到了瓶颈期。社区矫正正式的基本制度和框架已经建立,但从矫正对象获得社会支持的角度来看,来自各方的社会排斥使矫正对象孤立无援,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较弱。事实上,由于社会支持关系网络的断裂,我国的社区矫正并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社区矫正要件,而仅仅停留在司法矫正的层面。

三、修复与重建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经过2003年试点、2005年扩大试点和2009年全面试运行阶段后,2014年全面推进。2013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89.6万人,累计解除174.5万人,净增长15.1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突破70万人。社区矫正在我国试行后,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围绕社区矫正的机构建设、法律规定、执法队伍、社会支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社区矫正已见成效,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同和较高的社会评价。但是,矫正对象的社会关系网断裂、社会信任缺失、社会资本匮乏等问题,正式支持似乎“力不从心”,非正式支持却“有心无力”。虽然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率一直处于0.2%左右的较

①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84页。

②[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8页。

低水平,但研究发现,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的效果并不理想。矫正对象的社会资本匮乏,社会关系网断裂,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社会交往,也影响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为了实现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目的,必须修复和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修补他们的社会关系网,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完成再社会化终极目标。矫正对象的“罪犯”身份是屏蔽其与社会交往的屏障,因此,为了减少社会排斥,保护矫正对象的交往安全,最佳的方法是隐蔽他们的身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扩展矫正对象的社会关系,给予矫正对象所需的社会支持。为此,应该试图找到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结合点,整合社会资源,重建与再编织矫正对象的社会关系网。

在正式的社会支持方面,通过专门为矫正对象设置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加其社会融入感。比如,可以推荐矫正对象做社会公益活动的义工。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益活动需要大量的义工,可以充分利用义工身份,让矫正对象参与公益活动,在为他人作奉献的过程中完善自身的人格和品德。为避免社会排斥,可以隐蔽矫正对象的身份。很多矫正对象不愿意参与社交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担心“身份”暴露。打消矫正对象的顾虑是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最佳方案。目前来看,为矫正对象安排的活动除了公益劳动外,几乎没有与社区接触的机会。可以安排矫正对象隐去罪犯身份,在社工的帮助下,参与社区活动。比如,为社区低保户送温暖,为孤寡老人送爱心,为贫困儿童送生活品,等等。安排矫正对象参与正常的社区活动,会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隐去罪犯身份也给予矫正对象重新做人的心理暗示,有助于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

司法所或社区矫正管理局是矫正对象获得正式支持的主要主体,可以由司法所或社区矫正管理局组织矫正对象参与一些献爱心的活动。如让矫正对象参与到帮助弱势群体的活动中,为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献爱心、送温暖。在献爱心的过程中,矫正对象是隐蔽身份的。他们在为这些弱势群体送去爱心和温暖的同时,会增加生活的信心,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感受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且,在与这些弱势群体交流的过程中,也是对他们心灵的又一次洗礼,从而珍爱生命,增强社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交流的过程也是矫正对象增加人际交往、增进社会关系的过程。

社区矫正制度的目的是让矫正对象不脱离社会,让矫正对象在社会中“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矫正。因此,获得非正式支持对矫正对象至关重要。当前,网络是矫正对象非正式支持的重要来源。矫正对象常常为了躲避社会排斥而不愿意与人面对面地交流,网络的发达和便捷正好能够回避面对面的尴尬和冲突。通过网络,矫正对象可以抒发心中的郁结和不满,可以相对自由的与他人进行沟通。可以利用微信功能,向矫正对象传送正能量。微信的使用人群迅速扩大,微信功能越来越丰富。在微信中,通过建立微信群,建立矫正工作者、社工及志愿者与矫正对象之间的沟通,及时解答矫正对象的问题和困难。可以利用微信的信息功能和图片功能给矫正对象发送有关珍惜生命、关爱他人的励志信息和图片,激励矫正对象接受主流价值观,输送正能量。还可以利用网络,为矫正对象的就业、低保、医疗救助建立快速通道,在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司法所和矫正对象之间建立沟通的平台。如可以将矫正对象加入QQ好友,通过QQ聊天,随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及心理问题,掌握矫正对象矫正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不同状况,以便于继续推进和及时调整矫正工作方案。通过与矫正对象的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解除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通过网络对话进行教育的方式,可以避免呆板的说教,更容易让矫正对象接受。

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必须与社区矫正官保持联系,社区网站或可成为“桥梁”。社区网站为矫正对象建立留言板,方便矫正对象与社区矫正官的沟通。矫正对象的留言只有矫正官和其本人可

见。在留言里,矫正对象可以不用担心隐私被发现,有些难以启齿的问题也可以在正规的渠道得到解决,以免矫正对象做出因为无处倾诉而盲目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矫正官可以利用自己的法学知识、犯罪学知识和心理学知识为矫正对象进行解答和治疗。

矫正对象的家庭、邻里、朋友、社区志愿者和社区组织等能够给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支持帮助,这些非正式支持将为矫正对象建构一个关系紧密、连结有效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家庭支持是非正式支持中的主要支持力量。家庭支持贯穿于非正式支持的各个环节,是一种全方位的支持。而且,社区矫正这种方式也让矫正对象与常人一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家庭的支持就十分必要和重要。家庭支持首要的功能是为矫正对象带来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保障矫正对象在精神上保持积极乐观,在心理上健康向上。家庭支持还能够便于为矫正对象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物质方面的支持能够让矫正对象稳定情绪,良好过渡矫正期。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家庭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形成一种和谐的家庭文化传统。《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就家庭支持提出了四种观点:一是情感机制。二是荣誉机制。三是规范机制。四是利益机制。朋友、邻居等非家庭成员的支持,其动机也是多样化的。有学者总结了六个方面:一是天性。二是信念。三是宗教。四是价值观。五是环境。六是心理满足。尽管非正式支持主要依靠情感的道德的非利益机制维系,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依然不能不考虑利益方面的因素。矫正对象的家人大多不计回报地给予全力支持。但是,如果矫正对象的朋友或者邻居参与到矫正过程中,他们大多需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与自己家人团聚的时间,还要付出一定精力,甚至是金钱。如果社区矫正管理局或者司法所在矫正过程中借助矫正对象朋友和邻居的支持,可以减轻矫正工作的负担,矫正对象也更容易接受朋友和邻居的帮助,很容易被感化。可以根据矫正对象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适当考虑在建立矫正计划时将其朋友和邻居纳入计划之中,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社区志愿者既是社区矫正理念的贯彻者,又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者。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帮助弱势群体,实践专业理念。矫正对象呈多元性,但是以弱势群体为主。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较多,包括个人心理方面的、家庭关系方面的、劳动就业方面的,等等。而在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制度下,这些问题通常比较棘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合作才能解决。社区志愿者就是解决矫正对象这些问题的“中介”和“助手”。社区志愿者需要帮助矫正对象恢复其与家庭、朋友、邻居以及社区的关系,帮助矫正对象参与恢复各种关系的互动活动中。社区志愿者需要应对矫正对象可能遭受到的任何问题,如悲观失望、情绪暴躁、家庭抛弃、社区居民歧视等。在社区志愿者的帮助下,矫正对象逐渐适应社会,建立人际交往关系,获得社会支持。

作者简介:陈姝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博士。吉林长春 130031

【责任编辑 倪晓锋】

论行政法律关系的秉性与特质

李福林

[摘要] 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法的基本范畴的厘定和具体应用具有指引和规范的功能。厘定行政法律关系的秉性和特质可以更好实现规范与现实限制行政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目的,旨在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鉴此,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行政法律关系的秉性和特质,对其作科学的说明和分析,界定行政法与相关的其他部门法的边界,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和正确理解行政法律关系的具体意涵,进一步体会与理解行政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本质。

[关键词] 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的秉性 行政法律关系的特质

[中图分类号] D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1-0138-07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和行政法法学的基石和指南。法律关系调整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影响法律关系。从法理来看,社会关系接受部门法调整和规范之后必然形成相应的法关系或者说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类型的一种,一直备受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关注和重视。研究和分析作为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主要基石的行政法律关系,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厘清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其他相关的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帮助我们认识与理解各种各样的行政现象和行政活动,而且还能为行政诉讼活动提供适切合理的受案基准,促进行政争议的化解和行政任务的承担,更好实现规范行政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目的。行政法律关系制度有助于从“动态过程”揭示行政法现象、说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协调和平衡多重复杂的行政活动,并且推进行政法各项制度的完善^①。

^① 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88页。

二、行政法律关系之秉性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核心内容,行政法律关系必然也是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基本内容。对行政法律关系秉性的厘定和明确,不但能让我们清晰的界定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意涵和主要区别,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分析和把握各种行政法现象。

(一) 20世纪80年代行政法律关系之意涵

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主要内容,历来为行政法学界所关注和重视。早在1983年王岷灿先生在撰写《行政法概要》时就指出:“行政法调整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样社会关系称为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也称行政法律关系。”^①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我们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要意涵,从五个方面进行解析与定义:其一,皮纯协、张成福主编的《行政法学》提出了权利义务说。权利义务说以其调整和规范的法律规则来界定,“认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涵义就是指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各种行政法律规范与规定所构造的、承认的、相关的权利与义务相互关系”。其二,许崇德主编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提出了行政过程形成说。行政过程说以其的形成阶段或者说是形成过程来界定,“主要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的程序,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形成的,行政法规范所规制的各种关系”,简言之,行政主体依照行政法的规定程序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和形成的互联联系。其三,于安主编的《中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提出了内容法定说。内容法定说以其从法律关系的蕴含的内容来界定,“认为法律关系就是行政法规范所构造的与确认的就有法律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实关系的概括”。其四,陈安明主编的《中国行政法学》提出了职权界定说,职权界定说从行政主体具有的法定职权来界定,“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经行政法规范与调整的,为了实现权力的有效限制与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的行政目的而发生的行政主体的相互之间、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五,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提出了调整主体和对象法定说,主体和对象法定说以其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的主体身份和所具有的法律地位来界定,“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由行政法规范所确认和调整的,依职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主体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形成的具有行政法律意义上权利义务的关系。”^②

(二) 20世纪90年代行政法律关系之意涵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要意涵大致上形成一定的共识。行政法学理论一般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由行政法规范、承认、确立和调整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诚然,行政法律关系意涵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所指和确切意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抑或说存在着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来分析和理解。显然,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对行政法律关系的意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其一,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规范规制和调整的,因实施国家行政权力而发生的行政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行政工作人员之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

^①参见王岷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②参见许崇德:《新中国行政法学综述》,法律出版社,1991年,第54~56页。

权利义务关系。”^①这种观点认为,行政法律关系首先是因为实施行政权力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行政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行政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相、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二,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法规范调整,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行政关系。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行政监督关系。”^②这种定义体现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关系,包括行政关系、行政监督关系。其三,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法规范对行政主体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而形成的行政主体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其他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包括行政权配置法律关系、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③从这个角度分析,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要内涵由四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第一层面讲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规范对行政主体的作用;第二层面讲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是实现行政职权过程中产生的关系;第三层面讲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运用行政法规范加以调整而形成的关系;第四层面讲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之间和行政主体与行政它方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 作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之意涵

以上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和不同角度去理解行政法律关系的涵义,体现了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意涵的认识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的过程之中,也显示了行政法律关系内涵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显然,行政法学者们都倾向于,对行政法律关系的涵义作宽泛和广义的理解与分析。行政法律关系作广义的运用和界定,这表明行政法学的理论界对拓展与扩大行政法疆域和范围的考察。诚然,行政法有自己独特调整和规制对象,“行政法是围绕行政权而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即是行政法涉及行政权的配置、行政权运行过程之规制等。”^④通过行政法律关系的广义界定,伸展行政法的边疆、扩展行政法研究的路径、确立行政法发展的方向,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能量。综上,行政法律关系可以理解或者界定为,由行政法规范所确立的、承认的、调整的因行政权力的行使而形成的行政主体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关系。我们认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意涵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行政法律关系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行使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⑤权力是行使行政职权的前提条件,为了确保行政主体顺利的、合理的和有序的完成行政任务,实现行政目的,有必要将不同类型的行政权力分配到行政主体的手中。“行政权是指国家依据法律规定,赋予行政主体依法享有的执行法律、法规,组织和管理国家与社会行政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公共性、强制性、执行性等特征。”^⑥一般来说行政权,有几种典型学说:国家权力说、国家政权说、公共事务管理权说、行政事务管理权说。行政法律关系源于行政权实际行使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因为行政权的行使而形成。行政权在制度层面上分析,其是一种执行权;在操作层面

①参见胡建森:《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②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10页。

③参见袁曙宏:《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④参见江国华:《中国行政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⑤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⑥参见江国华:《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第71页。

上分析,其是一种从属的、被控制的权力;在司法审查的层面上分析,其是一种程序规制的权力。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主要目的在于防止行政的恣意与行政权力的滥用。由此,“无法律即无行政”的理念得以确立,正是这一理念将行政权置于法律之下,使行政权成为一个“法律问题”^①。从本质上看,行政法律关系因行政权的存在而形成法律关系,因此,离开了行政权的行使,就不可能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当然,行政权的行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行政法律关系产生于行政权的形成、使用、变化、救济、监督等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

其二,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在行政法的规范与行政法的规则、原则调整之前,各种社会关系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显然还没有涉及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当行政主体依据法定的程序,运用行政权实施和履行政职权和职责时,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规制和调整之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得以明确、固定和承认。“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其本质内核或者说起其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②行政法律关系首先必然是一种行政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运用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基本精神对这些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之后,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便进一步明确、肯定和承认。从实质内容上看,行政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具有行政法意义上或者说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义务关系。鉴此,我们觉得行政法律关系的一层重要内涵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

其三,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③我们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形成于行政管理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在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方式:一是由国家法律明确具体调整和规制权力的社会关系。按照法治行政的原则,行政主体形式任何行政权,都必须有法律明确的授权,行政主体才具备行政职权。因此,行政职权产生的社会关系就是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二是法律未经规定赋予行政职权的,不具备实施行政职权的主体资格,不应该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在现实的行政过程中大量存在着这类关系并非是法律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必须要有法律的追认、赋权、认可,才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随着公共行政发展和合作行政的涌现,越来越多的原来不受行政法规范的社会关系将渐渐的纳入到行政法调整与规制的范围,这类社会关系就蜕变成行政法律关系。

三、行政法律关系之特质

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主体上、内容上和程序上都与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等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研究和分析行政法律关系的特质,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和正确理解行政法律关系的秉性,乃至进一步体会行政法学与其他学科的本质的不同。行政法律关系与其他

①参见张树义:《现代行政权的概念及属性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75页。

②皮纯协、张成福:《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③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法律关系相比较具有如下特质:

(一) 主体的恒定性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法定的、固定的、不可转化的。如前所述,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必须要以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为基础条件。从学理来讲,国家的行政权的不存在和不运行,行政法律关系就必然不可能产生和发挥作用。而国家行政权的行使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才有资格,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权力行使国家行政权。显然,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和其他组织不能转化抑或互换位置,直接行使国家行政权。这一规定与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双方可以互换位置是不同的,具有明显的区别。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国家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的位置是不变的和恒定的,亦即是永远不能相互转换的。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一定是行政主体,原告也一定是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行政相对人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双方的位置是恒定的、不能转换的。对于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双方关系中,不以行政主体为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可能形成国家法律承认的行政法律关系。因此,在双方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行政主体。行政法学理论界将这种行政主体在法关系中的固定格局一般称之为,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恒定性。

(二) 内容的法定性

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内容是法定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不能私下约定权利与义务,也不能不受公法规制,私下自行选择权利和义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在行政法的规范中明确规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即是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法定性。在任何行政法律关系中,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行政机关只能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和法定的程序,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比如,在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中,按照法律规定授予公民某种资格必须基本的条件和程序,行政机关只能逐一审核申请公民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和遵守法定的程序进行行政许可,行政机关不能擅自改变申请某种资格的条件和程序或者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约定改变申请某种资格的条件和程序。在国家税收关系、国家检疫检验关系中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内容法定性就更为明显了。同时,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内容一个法定的整体,权利不能逃离义务,义务不能脱离权利。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相互重叠、相对交叉、相互渗透,不可分割与截然分开。在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主体的权利中,从权利向对方的行政相对人来说是权利,但是从相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讲是义务或者说是职责。例如,对行政主体来讲,公安机关维护治安,进行行政处罚,对相对人来说是权利与职权,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义务与职责;税务机关征收税收对纳税人来说是权利和职权,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是税务机关的义务和职责。又比如,对于公民个人来讲,受教育是权利也是义务;劳动是权利也是义务。所以,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内容具有法定性。

(三) 地位的不对等性

我国的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地位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处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法关系中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①这一主张的核心观点是:一是行政主体单方可以决定行政法

^①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卓越出版社,1990年,第45页;杨海坤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二是行政主体具有可以直接决定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力；三是行政主体在法关系中依法具有行政有益权。但是这种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观点从诞生时起就收到强烈的质疑。有学者认为，这一观念混淆了法律上权利义务不对等与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区别、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关系的区别等等。另一种观点是，我国多数行政法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双方的地位不能用“不平等”来解释和理解，而是用“不对等”来理解。^①然而，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不对等”的表达仅仅是转换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或者说是新瓶装旧药的行为。明显，是因为在行政主体总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而行政相对人则是始终处于从属的和附属的位置。这种“不对等”表述的本质与前述“不平等”表现的三个特质基本一致抑或说相同^②。因此，这两种观点与主张，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民主法治国家中，现代行政法究竟如何理解和分析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地位不对等性的本质呢？如果机械的、简单的分析与理解：行政主体的行政命令发动者，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命令的被动服从者；行政主体在法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与行政相对人在法关系中从属地位；行政主体对法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发动权与行政相对人的被动性质，显然是与现代社会民主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随着行政体制的深化改革、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大背景下，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对等性”至少包含着以下几层的涵义：一是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对等，不能一方只是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也不能一方仅仅履行义务，而不具备权利。法律关系双方对应地互相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二是法律关系双方在民主法治理念之下平等接受法律的规制、平等的遵守法律、平等的接受法律的调整。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虽然平等的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但是各方权利与义务的质量却不对等。”^③权利与义务的质量不对等主要表现在性质上和数量上两个方面。在性质上，行政主体的权利是行使行政的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而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不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因此，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的本质存在着差异。在数量上，在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中一些专属于行政主体的权利，而作为行政相对人是绝对不可能享有的。比如，行政相对人的提起行政复议的权利、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行政主体在形式行政职权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权、行政执行权、行政许可权以及行政处罚权等等。因为行政法学中存在权利义务在质量上的不对等，因此，行政法学的基本理念上、主要方向上、顶层的制度设计上，应该更加倾向和重视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权利和权利救济途径。从上述的分析可知，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的配制度，在质量上“不对等”，从深层次来理解为了实现双方在法律上的实质平等，是一种“平等下的不对等”^④。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和给付行政的大量涌现，行政与公民之间完全可以塑造一种平等框架之下的互相合作的契约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的命令关系或支配关系。随着行政法学的发展和变革，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裁决等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一种“平等下的对等”。

①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②罗豪才：《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6年，第15页；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③罗豪才、方世荣：《论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第35页。

④周佑勇：《行政法原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四、结语

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上规定的权利义务、运行方式、行政过程的观察与规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鉴此,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法性质的揭示和对行政法现象的理解,也对行政法的基本范畴和具体应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功能。在学科理论建构的意义上看,在现有的学理基础和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和界定行政法律关系的意涵和特质,对其作科学与系统的说明、分析和总结,以促进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以促使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加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进程,实属必要。

参考文献

- [1] 江国华:《中国行政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 [2] 石佑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 [2] 周佑勇:《行政法原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
- [4] 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
- [5]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6] 张文显:《法学的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 [7] 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
- [8]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 [9] 袁曙宏、方式荣、黎军:《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
- [10] 杨海坤、章志远:《行政法学基本问题论》,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 [11] 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 [12] 刘恒:《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
- [13]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李福林,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学者,地方立法基地/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420

【责任编辑 邓达奇】

国际视野下海关预裁定制度新探

曾 焱

[摘 要] 海关总署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于2018年2月1日正式实施。该办法是海关总署为与《贸易便利化协定》规定的国际标准接轨,而对现行海关行政裁定和商品预归类制度、原产地预确定、价格预审核制度进行的整合和优化。其颁布和实施符合贸易便利化的目标宗旨,满足日益变化的国际进出口贸易实际需要。但是,我国的海关预裁定制度在申请事项范围、申请人资格、预裁定地域效力、时间效力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差距,在新旧制度的衔接、预裁定决定的公开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贸易便利化协定 海关预裁定 海关行政裁定

[中图分类号] D9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 (2019) 01-0145-09

为了使世界贸易组织(下文简称WTO)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下文简称TFA)落到实处,履行协定的国际义务,2017年12月28日,海关总署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第236号令)(下文简称《暂行办法》)。2018年1月31日,海关总署又以《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有关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4号)(下文简称《2018年14号公告》)进一步细化海关预裁定的事实事项。次日,海关预裁定制度正式实施。预裁定制度是与国际海关接轨的,迎合WTO的TFA,整合和调整原先三预制度以及相关零散公告而出台的一项制度,同时也是履行我国贸易便利与安全的措施,帮助我们国内企业走出去,拓展企业活力。

一、《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预裁定制度及其意义

WTO自1995年正式成立以来的23年间,一直致力于促进世界贸易便利化,为达成各项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多边协定进行了协调与谈判。但是,近年来,WTO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久拖不决,本质上在于某些国家已经难以实现最大利益。TFA是WTO框

架下“巴厘一揽子协议”之一,是自WTO成立20年以来达成的首个多边贸易协定,适用于WTO所有成员。2015年9月4日我国正式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国内批准程序,并向世贸组织递交了有关TFA接受议定书,这意味着我国成为第16个递交议定书的成员^①。不同于此前WTO达成的1A附件下13个多边货物贸易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通过对GATT第五条(过境自由)、第八条(进出口规费和手续)和第十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的条款进行细化,主要规制WTO各成员方海关监管行为^②。作为言而有信、勇于担当的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必须切实履行《贸易便利化协定》下的各项义务。也正因如此,《贸易便利化协定》所设置的标准对海关监管制度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预裁定相关的规定被置于《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第三条,它是对GATT第八条关于进出口规费和手续的细化规定。其第三条第九款(a)项对预裁定进行定义:预裁定是指一成员在申请所涵盖的货物进口之前向申请人提供的书面决定,其中规定该成员在货物进出口时有关货物的税则归类、原产地事项的待遇^③。《贸易便利化协定》还鼓励成员提供有关完税价格确定的适当方法或标准及其适用、海关关税减免要求的适用性、包括关税配额在内的配额的适用情况以及成员认为适合作出预裁定的任何其他事项的预裁定^④。

预裁定的作用在于为企业办理进出口通关业务提供指向,有效评估进出口贸易成本,对相关的涉税要素有明确预期和准确把握;海关提前介入完税价格和关税征收,争取时间上的主动,便利执法,提升税收征管方式改革成效;有助于企业正确申报通关,充分发挥企业自报自缴制度优势,提高通关速度,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将某些事项的裁定前置,在货物实际通关时,海关只需进行简单核对,不再进行重复性审查^⑤。预裁定制度符合贸易便利化的根本需求,与TFA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二、我国新旧预裁定制度的演变历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第236号令)和《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有关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4号)颁布实施前,发挥“预裁定”功能的制度是《海关法》第四十三条提出、《海关行政裁定暂行管理办法》细化的海关行政裁定制度,以及《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进出口货物原产地预确定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分别规制的商品预归类、原产地预确定和价格预审核制度(下文简称“三预”制度)。但无论是海关行政裁定制度还是“三预”制度的规定与《贸易便利化协定》所确立的最低标准仍有不相适应的地方^⑥。

(一)新法实施前施行的制度

1. 海关行政裁定制度

海关行政裁定是指海关总署或其授权直属海关在货物拟作进口或出口的3个月前,根据在海

①李军、蔡春林:《“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贸易效应评述与展望》,《改革与战略》,2016年第7期。

②周跃雪:《“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海关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法制改革:国际法义务与参考》,《特区经济》,2017年第5期。

③罗嘉宾:《〈贸易便利化协定〉框架下建立中国海关预裁定制度的思考》,《海关与经贸研究》,2017年第5期。

④施正文、刘奇超:《关税立法架构的国际比较与结构分析》,《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年第4期。

⑤杨欣、王淑敏:《〈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预裁定制度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国际商务研究》,2017年第5期。

⑥李向阳:《跨境进口电子商务海关监管新政效能评估》,《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的申请,依据有关海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对进出口商品的归类、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禁止进出口措施和许可证件的适用以及海关总署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的其他海关事务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其具有海关规章的同等效力^①。

海关行政裁定具备一定的优势。从适用事项上看,海关行政裁定适用事项的范围涵盖了TFA所规定的必须实施预裁定的事项,此外还包括禁止进出口措施和许可证件的适用等事项,其范围宽于TFA的强制规定。从效力范围上看,海关行政裁定效力等同于海关规章,这意味着海关行政裁定在全国关境内通行并且适用于进出口的所有与行政裁定相同情形货物。从效力期限上看,行政裁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直到其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中的相关规定发生变化,行政裁定方才自动失效。无论从范围还是期限的角度考量,海关行政裁定的效力满足TFA的标准,并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做到了效力的最大化。

与此同时,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由于海关行政裁定效力等同于海关规章,从性质上看属于抽象行政行为^②。因此,若申请人对海关行政裁定的结果有异议,不能针对海关行政裁定本身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只能对依据该行政裁定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并申请对行政裁定进行附带性审查。这不符合TFA第四条规定的上诉或审查程序^③。其次,根据表1可以看出,在2002年《行政裁定管理办法》实施后的第13年方才出现第一例行政裁定。截止至2018年,海关总署仅制定颁布21例行政裁定,其中20例是商品归类,1例为原产地确定。无论更新速度还是更新数量都无法满足进出口贸易的实际需要,不符合我国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的地位。

表1 海关总署行政预裁定

编号	海关总署公告	事项	商品	商品税则号列
C0001	2015年第28号	商品归类	偏光片(偏光板)	9001.2000
C0002	2015年第41号	商品归类	园区观光车	8703.1019
C0003			全身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系统用扫描架	9022.1200
C0004			四溴双酚A	2908.1990
C0005	2016年第12号	商品归类	工业视频内窥镜	8525.8031
C0006			表壳及腕带连接件	8517.7090
C0007			现代风扣式卡扣(A面及B面)	8517.7090
C0008			经典扣式卡扣(卡针和带扣)	8517.7090
C0009	2016年第21号	商品归类	英伟达电视娱乐一体机	9504.5019
C0010			虚拟现实游戏头戴设备	9504.5011
C0011	2016年第31号	商品归类	雷诺嗉	2933.5990
C0012	2016年第33号	商品归类	医用带针合成可吸收性外科缝线	9018.3220
C0013			iPod nano 7	8527.1300
C0014			供料器	8428.9090
C0015	2016年第78号	商品归类	穿戴式电脑及其配件	8471.4140

①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第92号令)

②上海海关学院贸易便利化科研创新团队:《“〈贸易便利化协定〉(TFA)的实施:挑战与对策”海关智库论坛综述》,《海关与经贸研究》,2017年第3期。

③何晓睿:《中国海关行政裁定制度初探》,《海关与经贸研究》,2002年第2期。

续表

编号	海关总署公告	事项	商品	商品税则号列
C0016	2017年第21号	商品归类	电梯导轨	8431.3100
C0017			电梯导轨支架	8431.3100
C0018			电梯底坑底座	8431.3100
C0019	2017年第31号	商品归类	制动主缸	8708.3099
	2017年第35号	原产地	安佳脱脂奶粉	040210
C0020	2017年第63号	商品归类	进样器	8428.9090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

2. 三预制度

所谓“三预制度”指的是商品预归类制度、商品原产地预确定制度以及商品价格预审核制度。根据《归类管理规定》，商品预归类制度指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在货物实际进出口的45日前，向直属海关申请就其拟进出口的货物预先进行商品归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条例》，商品原产地预确定制度是指进口货物进口前，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与进口货物直接相关的其他当事人，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书面申请海关对将要进口的货物的原产地作出预确定决定，海关接受申报后，应当按照《原产地条例》的规定审核确定进口货物的原产地^①。根据《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管理暂行规定》，价格预审核（以下简称“预审价”）是指经企业申请，货物进口地海关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前对其完税价格进行审核，货物实际申报进口时，海关按照预审价确定的完税价格计征税款。

表2 三预制度对比

	商品预归类 ^②	原产地预确定 ^③	价格预审核 ^④
申请人	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经营单位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与进口货物直接相关的其他当事人	A类、AA类管理的企业
审查主体	直属海关		
申请范围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以及海关总署发布的关于商品归类的行政裁定、商品归类决定有明确规定的商品归类事项	具体由直属海关确定，除公式定价商品	各直属海关应该根据关区价格管理情况对本关区适用预审价的商品范围作出具体规定
申请时间	货物实际进出口的45日前	货物实际进口的3个月前	货物实际申报进口之前至少15个工作日
审查时间	15天	150天	无
货物范围	仅对申请人进出口的同类货物有效	与预确定所述货物相符的实际进口货物，且原产地确定标准未变化	申请企业本次申请的货物
效力范围	作出决定的直属海关境内		
效力时间	一直有效，直到被撤销或失效	3年	90天+30天

① 厉力：《论原产地规则及其在区域贸易安排中的适用》，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②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

③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

④ 详见：《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暂行规定》。

虽然“三预制度”审查时间较海关行政裁定更短,其灵活性和便捷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关行政裁定曲高和寡的缺陷,符合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日新月异现状,且其从性质上属于针对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申请人对三预决定有异议,可以对其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但它同样具备不足。首先,三类制度具体规定混乱不一致,具体表现为在申请人、可申请的货物范围、申请的时间、审查时间方面无法做到统一,这是由三项申请事项的复杂性确定的。如价格预确定制度是三项制度中最复杂的,因此在要求申请人具备一定的资质,货物范围一般为价格容易引发争议的货物,申请时间要求更接近实际进出口时间、审查时间不确定以及效力时间最短,这是因为商品的价格往往受市场波动影响大,而商品的归类和原产地的确定往往是相对不变的。其次,在效力范围层面,三项制度均只能在作出决定的直属海关境内有效,预归类决定仅对申请人进出口的同类货物有效,预审价更为严格,仅对申请企业申请的该批次货物有效,这与全国一体化通关改革的发展趋势不一致。最后,三预制度与海关行政裁定规则重复。预归类制度仅处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以及海关总署发布的关于商品归类的行政裁定、商品归类决定有明确规定的商品归类事项,对于上述文件未明确的货物,海关总署经过审核后告知申请人申请海关行政裁定。预归类申请人在经过预归类审查之后才知晓进出口货物属于现行规定和未明确类别的货物,须申请海关行政裁定,无疑造成申请的重复,降低海关工作效率,延长通关时间,增加进出口贸易成本。

综上所述,无论是海关行政裁定制度还是三预制度都有其优势以及不足之处,都无法契合《贸易便利化协定》对海关预裁定的规定,《海关预裁定暂行管理办法》规制的海关预裁定制度横空出世,是对此前的海关行政裁定制度和三预制度的整合。

（二）新法实施后施行的制度

2018年2月1日,《暂行办法》规定的海关预裁定制度正式实施。关于申请人,《暂行办法》规定有资格申请预裁定的是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在海关登记注册的对外贸易经营者。14号公告将其细化为,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出口货物发货人。受理主体为对外贸易经营者登记注册地的直属海关。受理申请的直属海关,通常交由其内部的关税部门负责具体工作。在适用的货物范围方面,《暂行办法》限制在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原产地或原产资格、完税价格相关要素和估价方法等事项,基本涵盖海关行政裁定与“三预”制度处理得事项。对于申请时间,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应当在货物拟进出口前3个月前提出预裁定的申请。但若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经过其登记注册地的直属海关批准,可以在货物拟进出口前3个月内提出预裁定申请。14号公告对“正当理由”的界定予以明确:其一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政策的调整致使预裁定的申请时间与进出口货物实际进出口时间之差小于3个月,其二是申请预裁定的企业在海关登记注册时间小于3个月。预裁定审查的对象是海关规章、海关总署公告等文件未对其税则归类、原产地或原产地资格、完税价格相关要素及估价方法作出明确规定的进出口货物。亦即,不是进出口的所有货物都必须经过预裁定,而是对上述报关事项规定不明时才需要进行预裁定。海关预裁定申请须通过“海关事务联系系统(QP系统)”或“互联网+海关”电子窗口完成,单据全部采用电子数据。这与单证电子化以及《贸易便利化协定》第一条“信息的公布与可获取”所规定的通过互联网提供信息的规定相呼应。

关于预裁定效力,《暂行办法》规定预裁定决定仅对申请人有效,从性质上看,其效力大小等价于“三预”制度,但低于海关行政裁定。但又因其可在全国关区适用,在效力的地域范围层面又与海关行政裁定相同,大于“三预”制度有效地域范围。除非预裁定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海

关规章以及海关总署公告相关规定发生变化影响预裁定决定的效力，预裁定决定被给予统一的三年有效期。为防止重复申请得到不一致的决定结果，《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还规定，申请人对于海关已经作出的预裁定决定所涉及的事项，在3年有效期内不得再次提出预裁定的申请。此外，预裁定决定对其生效前已经实际进出口的货物没有溯及力这一条款与海关行政裁定和“三预”制度别无二致，不影响此前关税的结算。

表3 海关行政裁定制度、“三预”制度与海关预裁定制度对比

		海关行政裁定	三预（以预归类为例）	我国海关预裁定
申请主体		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	在海关注册的进出口货物的经营单位或其代理人（包括报关企业）	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不包括报关企业）
申请时间		货物拟进出口的3个月前	在货物实际进出口的45日前	货物拟进出口前3个月内
行政主体		海关总署或其授权机构	直属海关	注册地直属海关
适用范围		进出口商品的归类、货物原产地确定、禁止进出口措施和许可证件的适用等	商品归类（三预还包括原产地预确定、预审价）	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原产地或原产资格、完税价格相关要素和估价方法等
出证时间		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	接受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
效力	地区	全国关境内	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	全国关境内
	相对人	进出口相同情形货物的经营单位（抽象行政行为）	仅对申请人	仅对申请人
	有效期	未明确	未明确	3年
救济措施		附带性审查	无	先复议后诉讼

三、当下我国《暂行规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

在国内层面，与此前既存的被束之高阁的海关行政裁定制度及规则纷繁复杂“三预”制度对比，《暂行办法》所规定的预裁定制度进行了整合，平衡了海关行政裁定和“三预”制度在效力和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然而放眼国际层面，我国的海关预裁定制度依然还未达到世界前列。将其置于国际层面，与TFA标准和发达国家海关预裁定制度的对比无法避免，从中亦能看到差距。

（一）我国预裁定制度与国际标准对比存在的不足

1. 申请预裁定的海关事务过于狭窄

TFA硬性规定预裁定必须包括货物的税则归类和货物的原产地确定两个事项。在满足硬性规定的前提下，鼓励根据特定事实用于确定完税价格的适当方法或标准及其适用，成员对申请海关关税减免要求的适用性，成员关于配额要求的适用情况，包括关税配额及成员认为适合作出预裁定的任何其他事项^①。我国预裁定无疑满足了TFA的硬性规定，还囊括了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确定方法及其适用。但是TFA的鼓励事项代表着预裁定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我国的预裁定制度还可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预裁定在美国应用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美国海关及边

①宋亚朋：《〈贸易便利化协定〉分析及中国进路选择》，《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年第6期。

境保护局机构内所有的执法事项,如商品归类、估价、原产地认定、入境程序、退税、延期缴税、关税配额申请资格认定、优惠政策资格认定、过境运输、引航及沿海运输法律等事项^①。日本则参照美国的预裁定制度,从商品归类开始,进而推广到海关估价与原产地领域。欧盟则以认定书的方式来实施,分为商品归类认定书和原产地认定书两类。澳大利亚海关的预裁定包括三类,分别是进口货物税则归类的约束性预裁定、决定是否可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原产地规则建议以及有关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估定有关事项的建议。

2. 预裁定申请人的范围有待放宽

TFA规定为“出口商、进口商或任何具有合理理由的人员或其代表”,这个范围已经明显大于目前很多国家立法规定的范围。但TFA又规定“一成员可要求申请人在其关境内拥有法人代表或进行注册”,赋予成员国一定的限制权力。同时又强调这些限制“尽可能避免对申请预裁定的人员类别构成限制,并应特别考虑中小企业具体需要。这些要求应明确、透明且不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这是因为改《协定》是WTO规则的组成部分,TFA必须照顾各成员方的需要,因此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既要尊重欧美发达国家的要求,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执行力。因此TFA条文处处可见博弈留下的痕迹。

美国海关规具备申请预裁定资格的是进出口商,对于该事项具有“直接和显著利益”之人,以及经上述各方授权的代理(如报关经纪人)。日本和澳大利亚对申请人的定义较为泛化,分别称之为进口商和贸易商。我国出于降低行政成本、避免企业滥用预裁定以及我国实际执行力等方面的考虑,我国对预裁定申请主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暂行办法》还是基本符合TFA的标准。且相较于海关行政裁定的申请人而言,预裁定的申请主体已经从经营单位扩大到实际收发货人。这不失为一种进步。

3. 关于预裁定决定的效力

TFA仅要求成员方在以合理时间内维持预裁定决定的合理性,除非预裁定决定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或情形发生变化。《暂行办法》则设置了3年的有效期,符合TFA的标准。美国海关对有效期不作设定,除非裁定被修订或撤销,为进口商的经营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日本海关与我国海关相同,设置3年有效期,澳大利亚海关预裁定有效期为5年。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各国法律制度和所属法系存在差异。美国和澳大利亚属于英美法系,拥有“判例法”和“遵循先例”的传统,其对本身立法和司法制度适应法律实践变化的能力十分自信,因此设置较长的有效期。而日本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我国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系,但根源上还是与大陆法系更为接近,为在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适应实际需要的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在设置有效期时更为保守。

4. 进一步细化预裁定决定的公开事宜

根据《暂行办法》第十七条,海关可以对外公开预裁定决定的内容,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规定的字面意思,预裁定决定是否公开是海关的选择权,海关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可以全文公开也可以部分公开,也没有涉及公开渠道。

美国海关的做法是,除了申请人按照美国有关保密的法律要求对其专门业务信息不予公布外,大部分的海关预裁定都在美国海关网站上公布,通过美国海关裁定在线搜索系统获取,不仅是美国贸易商,全球贸易商都可以获取。日本海关通过其官网公开预裁定决定,但是隐去申请人

^①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贸易便利化协定〉解读》,中国海关出版社,2017年,第95~96页。

的个人信息资料,对于一些含有机密信息的预裁定决定,设置一个静默期(一般为180天),静默期届满予以公布。但澳大利亚海关出于对申请人机密和商业敏感信息的保护,仅通过TAPIN系统公布预裁定决定,只有海关内部人员方可接触。

5. 对于预裁定决定的救济方式

TFA第三条关于预裁定的条款并未涉及救济问题,而是在第四条中对所有TFA实质条款的救济方式予以统一交代。TFA第四条是关于“贸易商获得申诉与审查权利”的规定。它规定了贸易商有权对海关所作行政决定进行申诉与审查,成员方应当在合理时间内作出上诉或审查决定并告知理由,以便其进一步寻求救济。除此之外还强调非歧视原则在申诉与审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诚如上节所述,我国的海关行政预裁定属于针对特定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救济法律体系中,可以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两种手段其一进行救济。

在美国,预裁定申请人不赞同预裁定决定结果,可向美国海关提出复议。若复议被否决,可向审查美国海关行政行为的专门性的司法审查机构——国际贸易法院申请审查。在澳大利亚,如果申请人对预裁定结果不满,可以请求澳大利亚海关复核,也可以向行政诉讼法庭提交申请审查该决定,但前提是先支付关税。如果对行政诉讼法庭的决定不满,还可以向联邦法院申诉。日本进口商仅能对以书面形式做出的预裁定决定向海关提出异议。

(二) 进一步完善我国预裁定制度的法律思考

1. 顺应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趋势,扩大可裁定的海关事务范围

美国的预裁定制度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下一步可将关税配额甚至更多的海关事项纳入该范围。其次,我国先于欧盟将海关估价纳入可裁定的海关事务范围,说明这一决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对于贸易事实变化对预裁定决定效力的影响,我们也应当警惕。最后,优化估价方法,另一方面适度放松《暂行办法》第13条的限制,允许对外贸易经营者在贸易事实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于有效期内再次申请预裁定。

2. 除了涉及商业秘密的预裁定决定书之外,所有的预裁定决定书应当通过指定渠道全文公开

一方面发挥社会对海关事务的监督,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依据公开的预裁定决定书进行提交预裁定前的手续准备,也可以对预裁定结果进行预测。也可以借鉴日本海关对于“静默期”的规定,给予申请人机密和敏感信息一个缓冲期和冷却期,待期限届满之后再行公布。

3. 明确规定可拒绝作出预裁定的情形

TFA列举了以下两种:一是该申请包含在申请人提请任何政府部门、上诉法庭或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二是所提问题已由任何上诉法庭或法院作出裁决。但是我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明确了针对已由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可以驳回预裁定的申请。这主要是因为,针对此类案件,若允许申请人同时提起预裁定申请,则属于同一案件重复处理,会降低效率且增加工作量。直接由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处理结果的效力等于或者大于预裁定,因此无需预裁定。

4. 对旧制度进行法条清理

关于《暂行办法》与现有“三预”规定条文效力关系,《14号公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至第二十条自2018年2月1日起停止实施。同日起,海关不再受理预归类、原产地预确定和价格预审核的申请。海关总署并未使用“废止”等措辞明文废止“三预”制度,以往散见于各行政法规、海关规整以及海关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三预”的条文效力如何,《暂行办法》并未涉及。从立法的协调性来说,这一做法委实不妥。虽然可以依据《立法法》

同一机关制定的规定,新法优于旧法,可以解决,但这也体现出我国法律的现状,存在大量重复性条文,新旧更替问题很突出,法律检索任务很重。

结束语

《贸易便利化协定》是“巴厘一揽子”协定中最务实、最具体的成果。而《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则是对《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预裁定制度的国内法转化,是海关总署为具体落实WTO成员义务,提升海关行政水平与世界标准接轨而制定的。其较好地处理立法稳定性和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在海关行政裁定和“三预”制度各自的优缺点之间进行平衡,极大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虽然我国的海关预裁定制度基本满足TFA的标准,但是TFA标准仅仅意味着“合格”,想要切实、显著地提升海关行政水平,使其能与发达国家的海关监管制度相平分秋色,符合我国货物贸易大国的国际地位,我国海关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进一步扩大海关预裁定事务的范围,为防止行政重复处理而明确可拒绝作出预裁定情形,细化和提升预裁定决定书的公开方式和公开程度,妥善处理海关预裁定制度与“三预”制度条文新旧衔接的问题等。

作者简介:曾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2017
级硕士研究生。上海 201600

【责任编辑 邓达奇】

状写深圳市人口变迁图景的力作

——读王世巍《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

石兴泽

《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①，顾名思义，是一部研究深圳市人口变迁的著作。深圳人口变迁是深圳改革发展中极其重要的问题。40年来，深圳奇迹般的发展繁荣，与人口变迁息息相关。但多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深入。《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是第一部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具有开拓性意义。作者视野多维，著作价值多重，在全面系统地厘定深圳市人口变迁的历史脉络的同时，运用科学理论在广阔的背景上审视和研究深圳人口变迁背后丰富的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资源学内涵，并对深圳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深刻独到的解读。《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的出版，对于认识深圳这个新兴的现代城市的崛起，促进未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助推中国城市化、经济现代化进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突出贡献在于对深圳人口变迁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这项工作庞杂艰辛，琐碎枯燥。深圳市人口变化是极其复杂的现象，而人口猛增剧变背后也涵盖着丰富厚重的信息，犹如深圳闹市区万头攒动的喧嚣纷繁，把握起来十分艰难。作者提纲挈领将其集中在3个方面：数量、结构和素质。这是影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生质量、城市实力的几项重要因素。由此切入，可谓抓住了把手，既符合人口学研究规律，也切合深圳社会发展的实际，显示出作者把握复杂现象、宏大事态的能力和理论水平。深圳人口发展是一个过程，作者将30年（1979—2010）分成3个时间段，符合深圳城市规划实际。作者抓住了这些关键环节，章节布局条块切割合理，逻辑层次递进井然，宏微结合适度有序，阶段性特点鲜明，整体发展脉络清晰。仅此而言，这是一部有理论水准更有现实意义、既彰显城市个案特点又有普适性意义的人口学著作。

与一般学术著作相比，《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的鲜明特点在于，作者结合详尽的叙述分析文字，还花费心血配以相应数据和图表。数据实实在在，丰富详实，具有钢铁般的逻辑力量 and 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作者说，借助于数据“不厌其烦地描述深圳市人口在各个时期，甚至各个年份的数量变化……数据是枯燥的，文字也很难生动活泼。”（《一本笨书——自序》，第2页）为强化表达效果，作者有意识地用图表说话，以图表的形式说明发展变迁脉络。图表清晰可视，直观醒目，

^①王世巍：《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海天出版社，2014年。文中所引只标注页码。

避免了数据过多造成的行文枯燥,故不能说该著作图文并茂,却增强了可读性和表现力。大量的图表插入,对于突出变化,说明问题,昭彰成就,展示规律,均起到很好的作用。

数据和图表背后,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全面了解和系统把握,是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所付出的大量心血。作者说这是一部“笨书”,因为下的是笨功夫和苦功夫。数据抽象冷酷,研究它需要坐实冷板凳,避免花架子,力戒浮躁,讲究学养;还要“接地气”,也就是紧密联系深圳实际。数据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要切合深圳历史和现实,立足于分析和解决深圳问题。该著作材料扎扎实实,数字凿凿有据,分析清晰透彻,把脉严谨准确,问题准确到位,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感和现实针对性。数据和图表以及数据、图表背后的巨大信息,关乎国计民生、方针政策、经济腾飞、科技进步,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得丝毫误差。故唯其“笨拙”,方显出扎实严谨的研究态度。

书之“笨拙”,还在于作者登高望远,追求厚重广博。“全书梳理了深圳变迁脉络,审视了深圳市人口现状,探究了深圳市人口变迁的背景动因,积极意义和问题,描述了深圳市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建设、资源使用的互动情况。”(《自序》,第2~3页)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作者自定的目标。而无论“梳理”“探究”还是“描述”,都是很费精力和心血的事情。因为深圳人口变迁脉络,本身就是复杂的课题。试想,40年来,深圳人口从30.14万人到1252.83万人,人类发展史上这如此神奇的人口聚集是怎么发生的?变迁脉络是什么?直线还是曲线,平稳还是上攀?这条延展线的趋势和动态是怎样的?同样复杂的还有“现状”:他们的来历和居住、教育背景和自身素质、家庭结构和生活需求、经济状况和从业能力……这一切的一切,是那样复杂多变,不是简单的数据所能说清楚的。而作为一部在宏观层面上研究人口变迁的著作,要对其做出符合人口学理论的探究,将千丝万缕的乱象凝结成数据和图像,做出清晰说明。焉能不笨?怎能不苦?

当然,作者不一定亲自深入市区调查,很多数字源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年鉴》、基层报表、统计数据等。但把这些数字汇总在一起,进行比较审视,分类归纳,探究思考,从而做出符合人口学的阐述也是相当艰巨的事情。我很理解作者所说的——“这些年,我的写字台上总是乱乱的,堆满了年鉴一类的书。写作时,目光穿梭于一本本摊开的大部头,看看这页,又看看那页,然后才敲击键盘,常常是个把小时过去,才形成两三百字甚至更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零打碎敲、日积月累,才形成了这20余万字。”(《自序》,第2页)这话多少道出了本书写作的诸多情景和甘苦。

披沙拣金,孜孜矻矻,拒绝浮躁,潜心思考,其动力源于对深圳和自己事业的挚爱。作者前来到深圳,亲眼目睹了深圳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口的增聚,对深圳社会变革、人口骤增有深刻的感受。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深圳人口问题研究,对深圳人口增长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问题做过深入思考,曾提出“人口均衡”发展理论,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说,“工作、生活在深圳这片热土,对社科工作者来说是幸运的。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发展建设伟大实践和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是社科研究的丰富矿藏。”(第400页)所以,明知枯燥,明知笨拙,却以坚强的意志啃下这块艰涩的硬骨头。这部“笨书”是他奉献给这片土地的心血和热诚。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作者所以给自己设置如此高远的目标,导致书之“笨拙”,要因在于作者多年的理论积淀、研究积累所形成的开阔视野和开放眼光。作者没有局限于深圳人口变迁研究自身,而是放开眼光,将深圳人口变迁这一原本就极其复杂的问题置于全国乃至世界人口变迁框架内进行审视,探究既切合深圳实际、又超出研究个体、符合城市人口长远发展规划的问题,而这也决定了这部“笨书”具有多重意义。从全国看深圳人口发展变化,多方面解读深圳所提供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建设成功个案;从世界看深圳,提供了中国社会主义特区的人口变迁

的个案。深圳建市40年,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短短40年时间,深圳由一个边陲小城一跃而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如今,人们提到城市经济往往会扳指细数北上广深,意味着其已跻身全国前“四强”——退一步说,深圳即便不是四强之一,在全国城市建设棋盘上和人们心目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深圳建设之迅速、成就之辉煌令天下人刮目相看。深圳为何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原因很多,人口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综合性因素。深圳人口发展是城市人口变迁历史上的奇迹。对40年来深圳市人口变迁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既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也具有填补城市人口研究空白的学术意义。

深圳人口变迁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深圳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数量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研究表明,深圳是人口密集最高的城市。按常住人口数量计算,2010年深圳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5000多人;按照实际管理人口的数量计算,深圳人口密集度更高;在全国土地面积0.02%的土地上,承载了全国0.77%的人口。深圳拥有多个值得骄傲的“最”:从业人口比重最高,我国人口城市化贡献最大,突破户籍障碍时间最早,非户籍人口比重最大……(第4~10页)40年来,她以恢弘的胸怀和极强的吸纳能力,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才,更以强健的调控和发掘能力使各类人才在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土地上生存发展,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实现人生理想;深圳将他们的智慧才干汇聚成巨大的建设和创造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40年来,深圳担当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角色,演绎着当代城市人口变迁的传奇。因此,深圳人口变迁研究,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些枯燥抽象的数字,而对于一个热爱深圳、从事这方面思考多年、视其为事业的人来说,那些抽象的数字是关乎使命和责任、激发热血沸腾的诗行!

开阔的研究视野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除了人口学、统计学理论外,作者还运用了社会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环境规划、文化学等理论。作者在“考察背景动因和积极意义时,着眼深圳,也着眼全国;着眼人口自身,也着眼经济、社会等方面。查找人口变迁问题时,看人口变迁自身问题,也看人口变迁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涉及经济方面,着重于人口发展与经济主要指标、产业结构与产业人口结构、产业区域分布与人口区域分布、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等发展的变化情况。涉及社会方面,主要针对人口与教育、人口与卫生等情况。涉及文化方面,主要以文化制度建设、文化现象流变、文化投入等情况为着力点。涉及自然资源方面,主要反映人口变迁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开发使用的情况。”(《自序》,第3页)其中所说,均系关乎宏观巨旨的问题,既涉及人口变迁数量,更关乎人口素质亦即变迁质量。也就是说,作者没有停留在数量的激增和城市人口膨胀的静态考察上,而是瞄准人口变迁质量,揭示人口变迁对深圳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人口区域分布和产业区域分布、人才能量开发和城市规划布局等关乎深圳综合实力和深圳人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对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也赋予该成果与之等同的意义。

该著作系《深圳学派建设丛书》之一种。深圳学派立足深圳现实,提出了“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的宏伟宗旨和切实举措。《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的撰写出版,正是在这一宗旨统领下完成的。她以翔实材料、海量的数据、缜密的思考、开阔的视野、细致的论析彰显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人口学理论、切合深圳实际的分析论证如现状概括、问题分析、趋势展望和规律阐释等,带有鲜明的“深圳学派”特色。

作者简介:石兴泽,聊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师。山东聊城 252000

【责任编辑 杨 中】

Abstract

The Style of Wri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Shengli & Ding Xiaoqiang

Political discourse represents a country's political ecology and values, and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country's ruling philosoph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instructed on many important occasions to "strengthe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current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such as alienation from academic discourse, stereotyped writing and single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e key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lies in the style of writing. A good style of writing must have people's character, nationality and time, an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arty conduct. We can construct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improving the style of writing.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Cultural Industry

Hu Xiao, Li Yating & Wang Ji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uangdong's cult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cept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 Bay Area" and "Belt and Road" along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in Guangdong, 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inadequate util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free trade area, and the lack of overall planning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e paper proposed three ways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Great Bay Area, mainl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evelop the urban linkage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Then, promote free trade area to provide motive forces for cult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st but not least, build entity platform for cultural industry in Great BayAre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ay area

Cao Jinya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ustri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rough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Hong Kong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use of location entropy and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focusing on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degree and the related influence factor is studied, discussed on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of positioning, build and reveal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value chain, focusing on promoting continuously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innovation integration, real play to the leading innovation, gather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radiation.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engthening capital support, increasing tax preference,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expanding cultural parks, promoting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and driving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gath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integrate innovation into the overall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rgument of Discourse" and "Regression of Being"—On the difference and combin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nd its possible reflection after modernization

Lin Anwu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mbination among the thre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ntributing after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deep reflection of "Being" and "discourse". First of all, rise from the level of discourse of "discriminately speaking" to the level of Being of "non-discriminately speaking" to discuss the healing effect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on modern civilization. After the neo-Confucianism rejected Buddhism and Tao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and contemporary argu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spired by Xiong Shili's New Consciousness-Only Doctrine and Mou Zongsan's Phenomenon and Thing-in-Self,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three status of Being", which contains "source of Being", "manifesting of Being", and "persistence of Being". Combination among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nee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text, and point out that the preciousness of Eastern civilization lies in returning to Being itself to "speak without words" and to return to "non-discriminate phase" from "discriminate phase", which emphasizes that human's participation in fostering cannot leave Being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comparing Western thinkers' thoughts about modernity, the author concludes with "Dao-yan Doctrine", which hopes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 engage in more conversations and dialogues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o give out a certain healing effect after modernization.

Determination and Absolute: A Reflection on Zhuxi's Understanding of Principle

Yang Lihua

The concept of Principle (tianli, 天理) in Zhuxi's philosophy has been critically examined in previous scholarship. However,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concept is not totally clear. By discussing and interpreting some related key notions in detail, like Determination (suoyi, 所以), Obligation (dangran, 当然), and Absolute (biran, 必然),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readers with a definite explanation of Principle in Zhuxi's philosophy, showing the exact meaning of two basic senses of it i.e., decider and controller.

Why Does China Enjoy Such Good Urban Infrastructur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Wang Zhibo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reason China enjoys such good urban infrastructure is "Land Finance". Under "Land Fina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obtains Land Value Appreciation (LVA) generated by the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commercial/residential land and uses LVA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LVA equal to the cost to government of infrastructure to accommodate greater dens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er capita income maximization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led by government. Therefore, in the Chinese-style decentralized system,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holds. "Land Finance" is a user charge and does not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LVA, but it sav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sure tha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Pareto optimal.

The Evaluation of Shenzhen'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i Jie

Evaluating Shenzhen'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research and the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ther regions of China. This paper provide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for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more generally. Thereafter it measured Shenzhen' and five other Chinese cit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es and found that: (1) Shenzh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tal index has entered a new level since 2010, especially reflected a synergy of speed, quality and efficiency; (2) Shenzhen' level is ahead of Shanghai, Guangzhou, Tianjin and Chongqing, just behind Beijing; and Shenzhen' five dimension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cessive innovativeness, effectiveness, sustain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sharing from strong to weak. It's suggested that Shenzhe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ll transform to a new level by means of its absolute advantage of marketiz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innovation cluster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governance.

Spreading the Gospel Through Mission Schools: American Missionaries' Educational Endeavo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ton, Hong Kong and Macao

He Sibing

The educational missionaries Henrietta Hall Shuck, Samuel Robbins Brown, Harriet N. Noyes and Andrew P. Happer were among the first Americans to establish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They adopted the pedagogical models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unded by the British missionary Robert Morrison in Malacca, and initiated the US-China education exchange. Their pioneering pedagogical experiments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rovided invaluable experience and models f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d China's modern education. Based on their correspondence, diaries, memoirs and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annual repor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these missionaries' educational endeavors in Macao, Hong Kong and Cant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xploring their inner experience in spreading the gospel through mission education.

Shenzhen Model: World Trend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henzhen's Modernization from 1978

Xie Zhikui & Li Zhuo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is a microcos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the "three engine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s leadership,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Shenzhen's astonishing development speed and successful development practice have been called "Shenzhen Model". The modernization of Shenzhen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time, geography, people" and so on. It conforms to the la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fined by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modern macro-and micro-economics, and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world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ains stro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isdom. Compared with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henzhen model takes innovation-drive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maintain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cessfully crosses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at the same time avoids profit-sharing alliances to influence public interests, and maintains overall social stability. This model provides a wealth of experience for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to learn from, which is the Shenzhen model'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Library" in Shenzhen

Li Danzhou

Urban renewal not only means the industrial-driven spatial renovation, but also point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human being" could come true. Thus, the value of culture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Shenzhen is stepping towards a cosmopolitan city in the era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alongside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trended towards the open economy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y. Meanwhile,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have advanced from socialist cultural progres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ty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Culture" (2003),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ly Strong City" (2010), and "Shenzhen Cultur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2020". As a vivid exampl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ty of Library" demonstrate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henzhen that is shifted from "Economic Shenzhen" to "Cultural Shenzhen". The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launch of cultural activities regarding to the topic of "reading", which show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is immigrant city.

Research on Membrane Technology in Prevention of Social Risk

Yan Yaojun & Tian Hui

The membrane sepa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net filter. As a technology with selective separation, it can choose to separate, purify, and concentrate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the proces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subject. The types of membranes and membrane separation method are various. Membra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has now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gas separation, material separ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and plays a decisive role. At the same time, new theories, concepts, new ideas, and new discoverie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embranes have given many important inspirations to the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new intersec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embra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bine its theory and method with social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and to propose the concept of "social membrane", hope to build a sound social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new principles and new metho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avoid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s in China by drawing lessons from membra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atural science .

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

Li Fulin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hip has the function of guiding and regulating the basic category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Determining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hip can better realize the administrative purpose of restrict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guaranteeing civil rights by norms and realities. The aim is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power and rights. In view of thi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ones, 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should be made of them.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al laws,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other disciplines.

本刊启事

《深圳社会科学》是深圳市人民政府主管、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双月刊,逢单月出版,大16开。本刊以“全球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神、深圳表达”为办刊宗旨,以开放性、时代性、前瞻性、创新性为刊物特色,努力反映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成果。欢迎投稿,欢迎订阅。现将有关来稿规范要求说明如下:

一、本刊的引文出处采用脚注,请作者投稿遵照以下标注格式:

1. 专著、论文集的标注顺序按责任者(作者或编者)、文献题名、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标示。例如: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2. 期刊文章的标注顺序按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期。例如崔卫平:《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一张访谈》,《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期。
3. 报纸文章的标注顺序按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号标示。例如程恩富、侯为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河北日报》,2012年11月7日,第11版。
4. 古籍标注顺序:整理本按责任者、书名、册次、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标示,如洪迈:《容斋随笔》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97页;刻本或钞本按责任者、篇名、卷次、版本标示,如陈宏谋:《弥盗议详》上,《培远堂偶存稿》卷十,光绪十年刻本。
5. 外文文献的标注顺序原则上应以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为准。征引西文文献,责任者、文献题名用正体,书刊名用斜体标示。例如Shaw Edwards, *Financial Deep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二、遵照新闻出版的有关规定,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律用人民出版社最新权威版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用1995年版,《列宁选集》用1995年版,《列宁全集》用1984年以后版本,《毛泽东选集》用1991年版,《邓小平文选》用1994年版。

三、文后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者论文的整体参考借鉴。参考文献请按其重要程序或参考的先后顺序排列,著录项目及次序与注释基本相同,但不注页码。如:

- [1] 奚静之. 俄罗斯美术16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2] 高火. 马列维奇与至上主义绘画[J]. 世界美术, 1997(1).
- [3] 胡鞍钢, 王洪川. 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论断[N]. 人民日报, 2017-10-27(3).

四、本刊邮箱为szshkx@szass.com, 欢迎作者与我们联系。本刊处理稿件以作者投寄的电子文件为准。邮件主题请按此格式输入: 作者姓名+文章题目。

五、本刊实行同行专家评议和匿名审稿制度。来稿需提供约300字的中英文摘要、3~5个关键词、论文英文标题,请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5版),注明本文所属类别,并另页附上作者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

六、本刊对采用稿件有删改权,不同意删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优稿优酬。来稿3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七、本刊发表的文章,已被有关数据库收录,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和稿费一次性付清。如作者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时声明。

八、本刊倡导良好学风,严守学术规范。来稿征引文献必须注明出处,杜绝抄袭剽窃和弄虚作假行为。如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作者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一切损失。

《深圳社会科学》编辑部